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陳冠至博士



明代河南藏書家研究

A Study of Book Collector in He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研究生：林采萱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私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林采萱 先生之碩士學位論文

明代河南藏書家研究
A study of Book Collector in He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經本委員會審議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口試委員

指導老師

鄭恒雄（召集人）

陳冠至

鄭恒雄

陳冠至

賴福順
賴福順

系主任

李正吉

李正吉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謝辭

在研究所的這段期間，我學到了非常多，不管是在課業、研究上，以及與其他研究生們的交流互動上皆收穫滿滿。由於大家都處在忙碌的階段，互相鼓勵成便為了我們的問候語。

首先，我想感謝家人給我的支持，在我遇到困難時激勵我，指引我未來的方向。在研究所期間，我很感謝所有教導過我的師長，以及負責研究所事務的秘書靜宜助教。當中，我想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冠至老師，因為有冠至老師的帶領下，我才有這個機會踏入這趟研究之旅。在研究的過程中，因為有老師一步一步地教導，讓我能夠更了解與學習到如何研究古籍，並使我論文當中的史料能夠更準確、更完整。同時，也非常感謝口試委員賴福順老師、鄭恒雄老師給予我研究方面的建議與指引。尤其是在賴老師的幫助下，使我的研究論文能更加豐富。

此外，我也要感謝在研究所時給我許多幫助的夥伴們，謝謝柏溢、弘傑、仕軒、帛勳、國華學長，以及怡秀、蕙文、宥喬、予澤、幸娟學姊的鼓勵與幫助。還要謝謝我的同學們奕霖、少綸、安琦、梓涵，特別是奕霖，在我需要幫助時，都會毫不猶豫地對我伸出雙手，在她的開導下，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正能量。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學妹們佩榆、韻安、彥菱、昀芯、安桓、佩庭，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仍然很高興能認識大家，我們在研究所的這段歡樂時光，我永遠不會忘記，同時祝福你們順利完成論文、開開心心的畢業。

回想當時自己剛進研究所時的徬徨模樣，如今終於要畢業了。這一路上真的是很煎熬，所有都是新的事物，也是不擅長的，當中要找尋研究的內容也非常龐雜，即便如此，我的內心有一句話：「只要你堅持下去就會是你的。」也因為有了這個信念，再加上夥伴們的相互激勵，讓我能夠堅持至今，並順利拿到學位。即將踏入職場的我，祝福自己未來的旅途也能平安、順利。在工作上，也要勇於學習、不怕挑戰，將每一件事情都視為上天給予的學習機會。再次，祝福大家未來都能順利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林采萱 謹誌於輔仁大學

2021年12月



摘要

明代歷經 276 年，中國藏書史上較發達的時期，相較宋元時期，明代時期更是進入了繁榮的階段。隨著印刷業與刻書業的快速發展，使得藏書家的藏書規模越來越大，藏書量也逐漸攀升。再加上朱元璋重視科舉制度，這使得民間的教育事業獲得更大的幫助，促使更多藏書家紛紛捐出自身的藏書，更設立了藏書樓，供儒學生員們借閱書籍。此外，明代擁有藏書樓的藏書家們，在他們的藏書樓中，會設置一些災害防範的設施，像是專門用來防火、防潮、防鼠、防霉、防盜和防曝曬等裝置，除此之外，也會安排管理人員進行圖書排架、書籍裝訂、修補。

在明代私人藏書的發展歷程方面，剛開始的藏書家大多以官員、士大夫為主，後來慢慢地下移至普通的庶民。晚明雖然朝政腐敗，但藏書事業仍然非常旺盛。在書籍流通上，往往因書籍難得，流傳稀少，而不易取得。因此，常常會需要多次的交換互借，輾轉傳抄。在藏書生活方面，除了進行抄書、刻書之外，許多藏書家也非常樂衷於「著述」，而這也是藏書家利用所藏的一種積極表現。

最後，在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會關係上，本文特別選用 UCINET 進行一個社會網絡分析，將社會關係或連結轉變為一張「網絡圖」，其中的「點」代表著個體、我與他人，而「線」則代表不同的關係、連結。將社會關係視為這種點與線交織的網絡，並加以分析，便是社會網絡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為 UCINET 中的網絡指標與分析法，包括：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仲介中心性（freeman centrality）、密度（density）、派系（clique）。

因此，本文在最後一章節透過科技的力量，傳達出歷史最真實的面貌。藉由數位人文的方法來剖析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群結構，深入認識古代中國的區域傳統文化，相信對於今後的目錄版本學、圖書館史建設和發展，都具有一定的貢獻與參考意義。

關鍵詞：明代；河南；藏書家；數位人文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had a history of 276 years, which was not only more advanced period of Chinese library than Song and Yuan Dynasty but come into the phase of prosperi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rinting and the book-engraving industry, the scale of bibliophiles' book collection had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And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rivate education got more help coupled with Zhu Yuan Zhang's highly concern abou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is prompted more bibliophiles to donate their own collections and a library was set up for Confucian students to borrow books. In addition, the bibliophiles who owned a library in the Ming Dynasty will set up some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in their library, such as special devices for fire prevention, moisture prevention, rodent prevention, mildew prevention, theft prevention, and sun exposure prevention. They also arranged management staff for book shelving, sheet-work and restoration.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most of the collectors were mainly officials,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t gradually moved to plebeians later.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was corrup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book collection business was still very prosperous.

In the circulation of books, it's difficult to obtain books because they are rare and few circulated. Therefore,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exchange and borrow multiple times for toss and copy. In terms of book collection, apart from copying and engraving books, many bibliophiles were also very eager to "Write". This is also a positive manifestation for bibliophiles to get use of their collections.

In the end, regard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Henan bibliophiles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specially selects UCINET to conduct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t transforms social relations or connections into a "Network Diagram" and the "Dots" inside represent individuals, myself and others. The "Lines" represent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Viewing social relations as a network of points and

lines, and analyzing them. That 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tool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network indicators and analysis methods in UCINET, including degree centrality, closeness centrality, freeman centrality, density, clique.

In conclusion, in the last chapter of this article. It uses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convey the most realistic face of history. Via using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Henan bibliophile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 believe that it will hav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bibliography, library histor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 Ming Dynasty ; Henan ; Book Collector ; Digital Humanities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
第二章 文獻分析.....	11
第一節 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綜述.....	12
第二節 明代河南的經濟與社會.....	17
第三節 明代河南的文化與教育.....	20
第四節 明代私家藏書活動的興盛.....	34
第五節 明代河南文人的風尚.....	4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1
第一節 研究步驟.....	51
第二節 研究架構.....	5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5
第四章 明代河南的藏書家.....	57
第一節 元末至天順時期（元末-1464）.....	58
第二節 成化至正德時期（1465-1521）.....	62
第三節 嘉靖至萬曆時期（1522-1620）.....	67
第四節 天啟至清初時期（1620-清初）.....	71
第五節 生卒年無考者.....	74
第五章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藏書生活.....	79
第一節 藏書的維護.....	80
第二節 藏書的利用.....	85
第三節 藏書的流通.....	87
第四節 藏書的生活.....	95
第六章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會關係.....	101

第一節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家庭關係	101
第二節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朋友關係	103
第三節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群網絡分析	110
第七章	結論	123
附錄	139
附錄一	：明代河南藏書家知見表	139
附錄二	：明代河南藏書家家庭科舉仕籍簡表	143
附錄三	：明代河南藏書家藏書樓（處）簡表	146
附錄四	：明代河南藏書家著作簡表	148
附錄五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關係表	150
參考文獻	153



圖目次

圖一 明代河南布政司轄境圖。.....	9
圖二 大明一統之圖。.....	40
圖三 研究架構流程圖。.....	54
圖四 〈河南周亮工〉朱文長方印。.....	102
圖五 〈賴古堂〉朱文方印。.....	102
圖六 李濂、左國璣交友示意圖。.....	104
圖七 張民表、周亮工、王損仲、朱睦㮮交友示意圖。.....	106
圖八 朱安淵、朱睦㮮交友示意圖。.....	108
圖九 戴冠交友示意圖。.....	109
圖十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圖。.....	121



表目次

表一 河南各府的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57
表二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分析.....	113
表三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仲介中心性分析.....	115
表四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接近中心性分析.....	117
表五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路密度分析.....	119
表六 明代河南藏書家派系	120



第一章 緒論

中國自古以來歷史悠久，文化昌明，人類文化發展與歷史記載，有賴於文字。而文字的經過、整理及記錄，便形成了書籍。¹文字發明甚早，典籍文獻的產生源遠流長，藏書事業也隨之興起，且十分發達。²

從藏書史方面來看，唐宋時期私家藏書的興盛，奠定了後世的藏書基礎，使得中國古代的私家藏書事業在經歷了元末動亂之後，能夠迅速恢復元氣，並快速發展，使明代進入了中國古代私家藏書事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由於明代進入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成熟期，文化教育事業也備受重視；再加上，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的普及，以及圖書編纂與出版事業發達，這都為明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創造了許多有利的條件。³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國藏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時期，到現在已經有四千多年的歷史。⁴最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官府藏書，而當時官府藏書只限於帝王與少數權貴使用。而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之學遍地開花，各學派為了宣傳各家學說，急需蒐集已有的文獻。直到西漢時期，官府藏書方面有了開創性的作為，像是建立國家藏書處、向全國廣泛徵書，以及派遣專人對中央政府

¹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7月初版），頁1。

²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頁16。

³ 牛紅亮、張小玲，〈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當代圖書館》，2009年第1期），頁33。

⁴ 劉嬌嬌、何朝暉，〈2000年以來中國藏書史研究的新進展〉（《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頁22。

的藏書進行校刊並編製成藏書目錄。⁵在這種氛圍下，藏書活動逐漸興起。此後，又歷經數個朝代、千年的發展與蘊積，中國的四大藏書系統逐漸奠基與成熟，其中包括：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及寺觀藏書等四大類型。⁶宋代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日益提高，以及印刷術的快速發展下，圖書的數量大幅增加，也促使私家藏書事業益發興盛，並在明朝時期達到顛峰。⁷

明代是中國印刷術普遍發展的時期，除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之外，套版印刷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應用。⁸尤其是起源於北宋畢昇（990-1051）所發明的活字印刷，⁹這發明改變了圖書生產的條件以及圖書物質的型態，同時改變了閱讀環境。¹⁰到了明代時期，活字印刷蓬勃發展，由於印書成本低廉，於是廣為私家印書採用。在書籍能夠大量印製下，便為私人藏書活動提供了物質條件，甚至許多刻書家本身也是藏書家。¹¹例如明末河南周亮工（1612-1672）與其子周在浚，當時周在浚與晉江「千頃堂」藏書樓主人黃虞稷（1629-1691）合作專刻唐宋秘本，由於他們刻書量之龐大，對往後的中國古籍流傳有著極大的貢獻。¹²由此可知，明代私人印書與刻書事業的發達，對於私人藏書可謂提供了豐富的來源；而官刻、坊刻的盛行，也為私人藏書的積累提供了保障。

明代歷經 276 年，相較以往，中國藏書史在這個時期可謂蒸蒸日上。不但公家藏書數量極為可觀，私人藏書的發展也有很大的突破。而在官府藏書的規模上，也為最輝煌的時期，其藏書主要集中分布於南京及北京地區，更以中央政府的藏

⁵ 蕭東發、袁逸，〈略論中國古代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館情報知識》，1999 年第 1 期），頁 2。

⁶ 張萍、吳效華，〈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上）〉（《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 年第 1 期），頁 79。

⁷ 韓梅花、羅軍明，〈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沿岸私家藏書的流變〉（《山東圖書館學刊》，2012 年第 1 期），頁 103。

⁸ 李致忠，《中國古代藏書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12 月第 1 版），頁 60。

⁹ 吳哲夫，《書的歷史》（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5 年 9 月第 3 版），頁 32。

¹⁰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初版），頁 130。

¹¹ 王美英，〈試論明代的私人藏書〉（《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4 期），頁 118。

¹² 范鳳書，〈略論河南典藏在中國藏書史上的地位〉（《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 年第 6 期），頁 80。

書最具規模。另外，在私人藏書方面，則偏聚於東南的江浙一帶。據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的考證，歷來江浙一帶的藏書家，就有近千人之多，而且主要都出現在明、清兩個朝代裡頭。¹³

例如明代中葉知名的大藏書家范欽（1506-1585），也是寧波「天一閣」的創建者，他偏好蒐藏當時坊間通行的明版圖書，特別是地方志，他的藏書多達 7 萬餘卷，存放藏書的「天一閣」更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至今仍流傳著，這可為保存明代史料做出極大的貢獻。¹⁴范欽之所以如此喜愛藏書，誠因受其父祖的影響。他的祖父與父親嗜書更甚，對范欽有著深遠的影響，也使得藏書成了范欽的終身嗜好。¹⁵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當時世俗普遍崇尚宋元刊本，范欽收藏的圖書則多為當代文獻，可見范欽的慧眼獨具，在當時已經意識到這些時下通行的圖書，仍然具備著傳世的價值。¹⁶

在另一方面，明代喜好藏書的藩王也非常多，例如明太祖之子周王朱橚（1361-1425）和寧王朱權（1378-1448），均藏有大量的珍籍秘本。¹⁷尤其在嘉靖、萬曆年間，周王的六孫朱睦㮮（1518-1587）更是明代河南宗藩中傑出的文人之一，同時也是一位享譽盛名的藏書家及作家。朱睦㮮雖出身自宗室天潢，卻未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反而自幼即勤奮好學。在他二十歲時，便已精通五經，尤其其他對《周易》和《春秋》十分有研究。此外，還遍訪國內許多知名學者，求學問道，並積極蒐集各種書籍加以整理保存，保存完整的傳統文化。綜上所舉，朱睦㮮可為明代北方屈指可數的大藏書家。¹⁸

¹³ 吳曉明，〈明代的上海藏書家〉（《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1 期），頁 102-105。

¹⁴ 邱曉輝，〈古代藏書文化漫談〉（《圖書情報論壇》，2009 年第 4 期），頁 67。

¹⁵ 蔡佩玲，《范氏天一閣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年 7 月初版），頁 12。

¹⁶ 柯亞莉，《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9 月），頁 169。

¹⁷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 版），頁 19。

¹⁸ 司恆斌，《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專門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5 月），頁 59。

綜觀上述，明代的私家藏書規模大、數量多、種類齊全，從藏書規模、數量、質量、價值等方面來看，明代的私家藏書均大大超過了當時的官府藏書。相較於元朝時期，明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已進入到空前繁榮的階段，在圖書的收藏、整理、保護、書目編製等方面，均呈現了特有的時代風貌，且在藏書方面，更有卓越的展現。¹⁹再加上，河南書院藏書風氣興盛，這對於藏書的發展有著諸多的密切關係。以及，明代河南藩府著名的藏書家朱睦㮮，有著積極藏書的態度，對於當地也有佔有一定的影響力。再來是有關明代河南進士方面，河南地區為產生進士較多的地區，大多集中於河南府，以明代來看當時的進士總人數一共有 258 人。相較於其他地區，可以算是人數較多之區域。綜觀上述，可以看出明代河南在各方面的發展，對於當時的藏書風氣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為此，近人吳晗曾經盛讚中國古代的藏書家「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徵獻，士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鉅」。²⁰

基於上述原因，使筆者對於河南的藏書事業產生好奇心，再加上目前的研究尚未出現將明代河南藏書家予以完整收集與分析。因此筆者決定研究此題目，期望能將所有有關明代河南藏書家找出，並呈現出明代河南完整的藏書風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發掘出尚未被其他研究者所開發的地方與區域，並找出所有有關明代河南的藏書家。此外，也會將現有研究中有關明代河南藏書家者經史料確認之後，將其一同列入在文章當中，以保持研究的完整性。

¹⁹ 牛紅亮、張小玲，〈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 33。

²⁰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 年 1 月第 1 版），〈兩浙藏書家史略·序言〉，頁 1-2。

藉由史料探索明代河南私人藏書事業的發展狀況和文化特色，以及藏書家的生活內涵，及藏書家對於本地的學術文化、古籍保存與流通傳播等方面的貢獻與影響。透過現存的明人文集、明清地方志、筆記小說、藏書專著等相關歷史文獻進行檢索和彙整，進而分析出明代河南地區私人藏書的歷史軌跡，並探討明代河南地域文化與藏書家之間的關聯性。

為了瞭解明代河南私人藏書風氣的真實樣貌，筆者擬透過相關史籍文獻對於明代河南地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交通、教育等記載，先行瞭解當時河南地區私人藏書文化生成與發展的歷史動因與時空背景，進而再深入探索明代河南私人藏書生活的內容與特色，以及藏書家與藏書社群的關係，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最終探討明代河南私人藏書事業的歷史貢獻。有鑑於此，本研究的方向重點在於：

- 一、 瞭解明代河南地區私人藏書文化生成與發展的歷史動因及時空背景。
- 二、 在現存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透過對歷史文獻的仔細蒐檢，發掘出更多明代河南地區的藏書家，以期瞭解明代河南地區藏書的風氣與狀況。
- 三、 掌握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生活內涵與特色，以及他們的區域社會關係。
- 四、 探討明代河南藏書家在區域學術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貢獻與影響。

為了完成上列的研究旨要，目前仍待釐清的一些問題，約略如以下數則：

- 一、 在現存的史料當中，具有明確藏書事實記載之明代河南藏書家人數，以及他們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部狀況為何？
- 二、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收藏內容，以及藏書類型、偏好與特色為何？
- 三、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生活文化的內涵為何？
- 四、 明代河南藏書家透過親族、姻婭、師徒與賓朋等社會關係，所連結而成的社群及特徵為何？同時，他們之間交往過從的情形又如何？

- 五、 明代河南私人藏書事業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為何？且對於區域生活文化成形的影響又如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明代河南私人藏書的相關議題所涵蓋的範圍甚廣，故其研究領域也將會比較複雜，若要深入探究，往往必須涉及文學、史學、社會學、圖書資訊學等方面。因此，在研究過程中，針對主題的範圍與限制，必須事先加以釐清，以利後續研究的進行。茲說明如下：

- 一、 在時間的斷限上，本文所指的明代主要係指自洪武元年（1368）開始，至崇禎 17 年（1644）為止，共計 276 年的這一段時間裡。
- 二、 由於私人藏書文化的成形往往具有時代的連續性，為求完整地觀察，本文所指的藏書家，原則上將以收錄前述明代期間內，於河南地區確有藏書事實記載之藏書家為主。然而，對於部份生於元末，卒於明初，或是生於明末，卒於清初的河南藏書家，只要具有明顯藏書事實紀錄者，均包含在本文的收錄範圍內。
- 三、 由於明人對「藏書家」一詞的定義較不受限制，是故舉凡著述家及其後代收錄祖父遺書、書畫收藏者、碑刻古帖收藏者，以及古代典籍（包含軸、卷、冊、抄本等非今日所認定為書籍的載體形式）的收藏者，不論其藏書數量是否達到萬卷，有無專門的藏書目錄，只要其人癖好藏書、熱愛圖書，均可按照史料上的記載，²¹列入藏書家之林。

²¹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8 卷第 1 期，2010 年秋），頁 119-120。

四、 至於明代河南的區域界定，本文是以《明史·地理志》的記載為準。元朝設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江北行中書省），為中央政府的一級行政區，簡稱「河南江北」或「河南江北省」，而民間則簡稱為「河南省」或「江北行省」，當時的首府為汴梁路。明朝建立以後，洪武元年（1368），將汴梁路改為開封府，並設置中書分省。2年（1369），改分省為河南等處行中書省。9年（1376），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轄下一共領有8府，1個直隸州，11個屬州，96個縣，分別說明如下：

- (一)、 開封府：轄下包含祥符縣、陳留縣、杞縣、通許縣、太康縣、尉氏縣、洧川縣、鄆陵縣、扶溝縣、中牟縣、陽武縣、原武縣、封丘縣、延津縣、蘭陽縣、儀封縣、新鄭縣、陳州、商水縣、西華縣、項城縣、沈丘縣、許州縣、臨潁縣、襄城縣、鄆城縣、長葛縣、禹州、密州縣、鄭州、滎陽縣、滎澤縣、河陰縣、汜水縣等，共計4州，30縣。
- (二)、 河南府：轄下包含洛陽縣、偃師縣、鞏縣、孟津縣、宜陽縣、永寧縣、新安縣、澠池縣、登封縣、嵩縣、盧氏縣、陝州、靈寶縣、閿鄉縣等，共計1州，13縣。
- (三)、 歸德府：轄下包含商丘縣、寧陵縣、鹿邑縣、夏邑縣、永城縣、虞城縣、睢州、考城縣、柘城縣等，共計1州，8縣。
- (四)、 汝寧府：轄下包含汝陽縣、真陽縣、上蔡縣、新蔡縣、西平縣、確山縣、遂平縣、信陽州、羅山縣、光州、光山縣、固始縣、息縣、商城縣等，共計2州，12縣。
- (五)、 南陽府：轄下包含南陽縣、鎮平縣、唐縣、泌陽縣、桐柏縣、南召縣、鄧州、內鄉縣、新野縣、淅川縣、裕州、舞陽縣、葉縣等，共計2州，11縣。

(六)、 懷慶府：轄下包含河內縣、濟源縣、修武縣、武陟縣、孟縣、溫縣等，共計 6 縣。

(七)、 衛輝府：轄下包含汲縣、胙城縣、新鄉縣、獲嘉縣、淇縣、輝縣等，共計 6 縣。

(八)、 彰德府：轄下包含安陽縣、臨漳縣、湯陰縣、林縣、磁州、武安縣、涉縣、汝州、魯山縣、邺縣、寶豐縣、伊陽縣等，共計 1 州，6 縣。²²

五、 本文收錄之明代河南藏書家，是指在明代河南地區進行藏書活動的人士，包括：本籍人士（設籍於明代河南布政使司轄下之各府州縣者）、外省籍人士僑寓或宦遊河南者。此外，少數籍貫河南，卻藏書於他省者，本文亦將視為河南藏書家。總之，以上三類明代人士，只要史料記載確實有藏書事實可考者，本文都將予以收錄，屬於本文探討的對象。

六、 本研究所謂的史籍記載，是指中國古代的正史、明人文集、清人文集、傳記資料、明清地方志、明清筆記小說、明清藏書理論或專著、專論等，其中若有明顯藏書紀錄者，將會加以收錄整理，並延伸發掘其藏書事業、藏書生活，以及藏書社群等相關資料。

²²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國學基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4年9月初版），卷46，〈河南方輿紀要序〉，頁1914-1917。



圖一 明代河南布政司轄境圖。²³

²³ 明·李賢，《大明一統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順5年（1461）內府刊本），卷26，〈河南布政司〉，無頁數。



第二章 文獻分析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使得人們更加渴望對精神與文化的追求。不僅學術界，普通百姓也日益關注起中國文化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人們對於古代藏書這一文化寶藏也越來越重視，開始從不同的角度挖掘古代藏書的精神內涵。²⁴

明代是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繁盛的一段時期，尤以私人藏書事業最為顯著。另一方面，較諸以往，明代中後期私人藏書思想出現許多藏書家傾向藏書流通共享、對外開放，而得以更加完整的發展。當時開明的藏書家不僅延續少數前人主張的化私為公、資源共享、公益開放的理念，還進一步的實現了開放思想的昇華，形成了具有哲學基礎的理論。所以，明代藏書家的開放思想是中國古代私人藏書思想的代表，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²⁵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國歷史藏書文化的發展，其實與城市的發展密不可分，這對全面瞭解古代社會生活和認識文化學術史面貌等研究領域，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此，本研究聚焦於明代河南私家藏書，除了對明代私家藏書事業與生活做整體的探討外，也會從明代河南的地理、經濟、教育談起，從各方面探討因果關聯，找出與區域私人藏書文化之間的發展關係。

²⁴ 劉長清，〈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研究〉（《黑龍江史志》，2013 年第 19 期），頁 160。

²⁵ 董文強，〈論明代藏書家的開放思想及其對私人圖書館的啟示〉（《圖書館研究出版社》，2015 年第 6 期），頁 6。

第一節 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綜述

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發展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文化積累豐厚。對於古代藏書學研究者而言，藏書文化研究擁有非常廣闊的前景。藏書本是指典籍圖書的收藏活動，也是作為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重要的象徵，為遍及歷代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之間一種雅俗共賞的常見行為。²⁶

古代藏書的文化地位，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古代藏書肯定了古代文獻的價值，人們之所以藏書，就是因為意識到藏書的價值。但藏書也需要一定的先決條件，也就是必須要有大量文獻的存在，因為沒有文獻，便沒有收藏。其次，古代藏書彰顯了封建社會的文化理念。第三，私人藏書表現出獨特的個人文化品味。相較於中國古代各種藏書類型，私人藏書是個人文化品味最直接的反映。此外，一個地區擁有豐富的藏書活動，也代表著此地區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才有餘力從事藏書活動。以及，人文教育發達之處，因辦學校、著書的人多，其藏書活動也相較發達。²⁷

遍考文獻記載，中國古代的藏書事業可分為四大類型。首先，官府藏書起源於殷商時代；稍後，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私家藏書萌芽、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²⁸至於書院藏書則始於唐代，有書院就有藏書，因為早期的書院是屬於私人的讀書與藏書之所。隋唐時期，自唐麗正書院藏書以來，其開放思想也隨之產生。²⁹宋朝以後，大量的書院興建，慢慢形成了藏書家與藏書世家的群體。³⁰另外，寺廟、道觀、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機構，為了保存其文化經典，以傳承教義，也陸

²⁶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6年10月初版），頁24。

²⁷ 康芬、胡長春，〈明代道教藏書考略〉（《江西圖書館學刊》，2003年第4期），頁83。

²⁸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山東圖書館季刊》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39。

²⁹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頁408。

³⁰ 陳宏宙，〈試論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對現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和影響〉（《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7年第7期），頁98。

陸續開始收藏圖書。而中國也逐漸形成了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觀藏書、書院藏書等四大藏書體系。³¹

中國古代的四大藏書類型並非各自發展，而是互為影響，相輔相成的。例如唐代最初建立書院的目的，本來是為了藏書以待學者閱讀，³²只是在當時保守的封閉思想下，限縮了圖書的開放、流通與利用。³³因為如此，反倒讓這時的私人藏書發揮出極大的貢獻。至於官府藏書基於其特定的政治標準，有些圖書不得入藏，而私人藏書則是隨著藏書家的喜好而蒐羅，藏書顯得更加多樣化，彌補了官府藏書的不足。³⁴

到了明代，私人藏書活動已經十分繁盛，藏書開放流通的思想也漸漸流行。不過，此時因為諸多的主客觀原因，絕大多數的藏書家仍秉持傳統的保守態度，藏書堅決不外借，僅供自己或族人使用而已。³⁵例如前述明代寧波的范氏「天一閣」，累傳數代，甚至有「代不分書」的管理概念，再加上後人遵循此家訓，做出艱持和努力，才有了現存的「天一閣」。³⁶相反地，明代也有許多藏書家的思想十分開明，主動將個人的藏書對外開放，並且允許借閱，或互抄互刊、流通於眾。³⁷當然，中國古代私家藏書開放私藏的思想並非始於明代，前代已有一些藏書家為明代開明的藏書思想提供了榜樣。就是在這些實踐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代藏書家將私藏開放的思想更加發揚光大，成為明代中後期私家藏書的一項特徵。

如前所述，明代私人藏書家多半抱持秘不示人的藏書封閉心態，但即便如此，仍有許多情形，這些藏書家會將藏書開放給一些外人觀賞。一般而言，他們開放

³¹ 樓向英，〈中國寺院藏書研究述評〉（《圖書館》，2014年第1期），頁53。

³² 劉長清，〈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研究〉，頁160。

³³ 徐壽芝，〈中國古代的藏書開放思想〉（《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頁154。

³⁴ 劉兆佑，《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年6月初版），頁168。

³⁵ 劉水養，〈天一閣藏書及社會貢獻史考略〉（《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7年第5期），頁56。

³⁶ 徐良雄，《中國藏書文化研究》（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頁173。

³⁷ 逢麗東，〈古代私家藏書的文化意蘊〉（《河南圖書館學刊》，2013年第3期），頁130。

的對象主要族人、親戚、師友等，大致體現了封建社會的倫理化傾向，由親近到疏遠的社會關係漸層。族人借閱自然是私藏私用，而其他人或可算為對外開放，但這種情形較少。對親戚開放者，例如明末二位常熟藏書家趙琦美（1563-1624）與何大成（？-1643）即屬姻親關係，他們兩家的藏書互相開放觀賞借閱，彼此交流。³⁸至於保守秘惜者，例如明末山陰藏書家祁承燦（1562-1628），他花費了十餘年的時間，至各地購書，合先世所遺，聚書達萬餘卷，可惜因為家丁不慎，以致失火盡焚。他在痛心之餘，只好重新蒐聚，再得數萬卷，建立「澹生堂」以藏之。他撰寫《澹生堂藏書約》作為藏書家規，其中除了敘述有關家藏書籍的來歷與蒐訪過程，以及自身的典藏經驗之外，最重要的是告誡子孫如何妥善地守護藏書而不至散亡，成為明末藏書家訓勉子孫繼志述事的一部代表作。³⁹誠如文中所云：

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眾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齧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

40

歷來藏書家，莫不希望自己畢生的辛苦所藏可以澤被後世，代代相傳，受到妥善的保存、使用而不會散亡。其中能夠明白訂定藏書規約，訓示子孫如何購書、如何讀書、如何藏書，則是始於明末浙江的藏書家祁承燦。⁴¹

³⁸ 賴明德等，《華人社會與文化》（臺北：文鶴出版社，2009年2月初版），頁336。

³⁹ 陳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書家考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頁12。

⁴⁰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11月第一版），頁5。

⁴¹ 賴明德等，《華人社會與文化》，頁336。

相反的，許多明代中後期的藏書家卻認為圖書是聖賢思想文化傳承的載體，唯有無私地將圖書借給他人閱讀，才可為之提供學習參考，精進學術，造福學林。例如福建閩縣藏書家徐燊（1570-1645）便主張藏書家應當要將圖書借與同好，徐燊曰：

賢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書來，是與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也，何可不借？⁴²

江陰藏書家李如一（1556-1630）亦以傳播遺書秘冊為己任，強調慷慨借書誠為藏書家美德，李如一曰：

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每得一遺書秘冊，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假，則朝發而夕至。⁴³

李如一對於借閱書籍者細心接待，甚至有些人無須親自到李家，只要來信即可借得，為明末抱持開明共享觀念的藏書家當中的代表人物。

其實，明代藏書家之間進行藏書交流者不乏其例，往往彼此開放私藏，互通藏書聲息。其實，每一個明代藏書家表面上雖是一個藏書者，而實質上則是一座「準私人圖書館」，他們之間圖書開放流通的行為，亦可謂具有現代圖書館「館際互借」的意味，甚至產生了具體的操作方法和理論。例如明末浙江秀水藏書家曹溶（1613-1685）所提倡的《流通古書約》，便是其中的典型。《流通古書約》完成於明末崇禎年間，主張藏書家們各自先編訂家藏書目，然後再彼此進行交換，比對書目之有無，然後約定抄寫時間，抄完後交換所抄副本，如書中所述：「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齎所鈔互換。」⁴⁴當時，

⁴² 明·徐燊，《徐氏筆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6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6，〈藏書〉，頁26上。

⁴³ 元·陶宗儀，《草莽私乘》（《叢書集成續編》257，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初版），卷首，錢謙益〈草莽私乘目錄〉，頁1下。

⁴⁴ 清·曹溶，《流通古書約》（《知不足齋叢書》2，臺北：興中書局，不注出版年），頁2上。

許多藏書家雖未提出如此完整的理論，但一些人已經有意識地進行著互借、互抄之舉了。

另外，刊刻出版，或贈或售，也是古代藏書家公開私藏的方式之一。許多明代藏書家只要稍有能力，大多會刊刻自己喜愛的藏書，一部分用作饋贈，一部分流通市場，貼補刊印成本或牟利，但不論目的為何，都達到流通典籍的作用。明末常熟藏書家毛晉（1599-1659）便是明代藏書家當中，具備此類透過刻書以廣藏書流通思想的代表人物。據統計，毛晉一生總共刻印了 600 多種書，因其底本精良，刻工上乘，且價格較低，故其所刻圖書的流通範圍非常廣泛，呈現「毛氏之書走天下」的現象，這也是一種向社會公開私藏的良方。他對於圖書有著深厚的情感，常為了收藏一種圖書，甚至數十年如一日地念念不忘，恍若寒之思衣，飢之思食，夢寐求之；也因為這樣，使得他一旦得到，則欣喜若狂。⁴⁵

總之，明代藏書家對外開放借閱，實屬公益善行。事實上，除了上述的藏書思想類型外，明代還有很多思想更為進步的藏書家，像是願意將藏書奉獻同人公用，或是透過捐贈，奉獻自身書籍作為當地的儒學或書院等學校的藏書，以嘉惠鄉黨。⁴⁶以上可以看出，這些藏書家不吝鉅資購求、不分晝夜而抄錄，傾畢生精力，只為藏書，將藏書作為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甚至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在中國歷史上稱他們為「書迷」、「書癡」，且人數不在少數。

此外，古代藏書家更把書做為一個精神上的享受與樂趣，視圖書為朋友。⁴⁷同時，隨著科舉制度的興盛，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是為了「學而優則仕」，意即為了「金榜題名」而買書、讀書，成為普遍現象，久而久之，聚少成多，達到一定規模以後，這些讀書人也就成了藏書家。⁴⁸可見，藏書的興盛不僅能夠陶冶區域

⁴⁵ 蔡煜、曹培根，《常熟藏書家與藏書樓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頁114。

⁴⁶ 董文強，〈論明代藏書家的開放思想及其對私人圖書館的啟示〉，頁7。

⁴⁷ 柳申林，〈古代藏書家在承傳民族文化典籍上的貢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頁131。

⁴⁸ 趙長林，〈中國當代私人藏書研究〉（《四川圖書館學報》，1999年第6期），頁69-70。

性的治學風氣，也可以影響地域文化特徵的形塑，促進學術思想的活躍，同時又進一步地引導更多地區的文化與學風，為研究與著述活動提供津梁。⁴⁹

第二節 明代河南的經濟與社會

就地理位置而言，河南歷來是「天下之中」，位處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介於陝西以東，山東以西，北直隸以南，湖廣以北，而大部分地區位於黃河以南，故稱河南。河南地區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天氣狀態為夏季炎熱多雨、冬季寒冷但雨雪少，溫度高且雨量亦高，有利於農業的發展。除了良好的地理位置之外，再加上極佳的氣候條件，豐富的文化歷史，使得河南成為中國歷代以來人口稠密、經濟發展水平優越的區域。⁵⁰

元代首創行省制度，置河南地區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明朝建國後，最初沿襲元制，後來改河南江北行中書省為河南承宣布政使司，下轄 8 府、1 個直隸州、11 個屬州、96 個縣，幅員十分遼闊。河南大致可分為東南西北 4 個區域，其中開封府、歸德府位於東區，懷慶府、衛輝府、彰德府位於北區，河南府、汝州位於西區，南陽府、汝寧府位於南區。就城市的發展規模來看，東邊的區域在明代是最為密集的。⁵¹行政區的設置變化，與人口和土地是密切相連的。明代行政區劃分的變化，能夠明顯反映出人口與經濟的增減變動情況。元朝末年，鼎革戰爭導致明初河南大量人口損失和耕地廢棄，因此，出現了大量的州縣裁撤的現象；

⁴⁹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明代研究》，第 30 期，2018 年 6 月），頁 131。

⁵⁰ 閔繼昕，〈明代河南賦役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5 月），頁 15-16。

⁵¹ 徐春燕，〈明清河南城市規模及相關性研究〉（《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6 年第 6 期），頁 84。

而中期以後大量州縣的復設，則又體現了當時人口數量的增加，同時也出現經濟慢慢恢復的景象。⁵²

明中期以後，在全國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帶動下，中原地區農業經濟逐漸獲得提升。河南在明初時已開始種植棉花，棉花很快地成為河南最主要的經濟作物。到了明代中後期，河南棉花種植業的商品化程度已經很高，農民除了滿足自身需要及供給本地棉紡織業外，還將大批棉花輸往江南，供應松江、蘇州等地的棉紡織業，河南進而成為了全國主要的棉花原料產地。⁵³

其中，傅衣凌所著的〈明代經濟史上的山東與河南〉⁵⁴是中國學者研究明清河南經濟史的開山之作。他考察了明代河南的區域經濟發展歷程，說明了明代河南在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市鎮經濟等各方面，較諸前代，都有一定的進步。⁵⁵同時，在中國的文化史上，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更曾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和孕育中華文明的主要發祥地。⁵⁶關於明代河南地區具有發展經濟、促進南北商品交流的優越地理位置，明人張瀚（1511-1593）曾經指出：

京師以南，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彰，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漢，車馬之交，達於四方，商賈樂聚。地饒漆枲紵織續錫蠟皮張。昔周建都於此，土地平廣，人民富庶。其俗纖儉習事，故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皆周人也。彰德控趙、魏，走晉、冀，亦當河、洛之分。

⁵² 陳娜，《明代河南人口問題探析》（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4月），頁9。

⁵³ 張民服、王新田，〈明代中後期中原商品經濟發展探析〉（《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6-7。

⁵⁴ 傅衣凌，〈明代經濟史上的山東與河南〉（《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3期），頁119。

⁵⁵ 吳志遠，〈明清河南經濟史研究綜述〉（《中國城市經濟》，2011年第9期），頁204。

⁵⁶ 劉士嶺，《大河南北，斯民厥土：歷史時期的河南人口與土地（1368-1953）》（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4月），頁2-3。

而南陽下蕪、黃，入襄、鄖，又與淮、泗相表里。若民物殷阜，汝寧為優，而水陸道里為便矣。⁵⁷

位於中原地區的河南，還具備了便捷的水陸交通條件，為境內外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之運輸與交換，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進而帶動了商業都市的繁盛和城鎮集市貿易的興起，也為南來北往的商賈從事經貿活動，創造更多的機會。

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明代物質生產的目的已不再只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而已，而是為了進行交換，提供他人所需，或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河南基於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環境、較好的經濟社會條件，促使本地商人或外地商人紛紛前來交易，使其成為理想的商貿場域。⁵⁸清初著名的學者顧祖禹（1631-1692）也指出：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⁵⁹

在另一方面，河南自古為中州之地，人傑地靈，物產富足，教化聲威遠播至其他區域，古聖遺風，至今猶存。當地社會注重法治，農業經濟發展迅速，風氣良好，民風淳樸的榮景，以及傳統文化古蹟、先賢事蹟、倫理道德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持續獲得發揚光大，呈現十分優良的社會局面。⁶⁰就如同顧祖禹所述：

河南閩域中夏，道里幅輳。……夫據洛陽之險固，資大樑之沃饒，表裏河山，提封萬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揮燕、趙；南陽、汝寧，足以控扼秦、

⁵⁷ 明·張瀚，《松窗夢語》（《叢書集成續編》21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卷4，〈商賈紀〉，頁18下。

⁵⁸ 張民服、王新田，〈明代中後期中原商品經濟發展探析〉，頁6-8。

⁵⁹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46，〈河南方輿紀要序〉，頁1909。

⁶⁰ 馬銀行、王現平，〈明代河南風俗的傳承與轉變初探〉（《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51。

楚；歸德足以鞭弭齊、魯。遮蔽東南，中天下而立以經營四方，此其選矣。

61

明代藏書活動與文化之所以如此興盛，實際上是因為深遠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背景條件的成熟。尤其是文化教育的發展，以及刻書業、圖書流通業的興盛，皆為明代的藏書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⁶²在圖書出版後，必須藉助一定的傳播管道，使讀者得以接觸並接受。傳播管道包括書籍直接於書肆販售，如圖書集散地的商店街模式；或是行商販運，是一種間接的傳播管道，如批發經營、運銷推廣，藉此拓展圖書貿易；還有海外貿易。明代時期，中國為世界上發達的國家之一，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而海外地區也把中國書籍的輸入，作為學習中國文化的主要途徑；同時，明朝也藉由輸出圖書，來擴大中國的影響力。當時圖書外銷的市場，主要限於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其貿易方式為外國使臣藉由朝貢的名義到中國受賜或購買，而這些外國使臣都會大量地購書，如朝鮮、日本等地區便是；或是，透過海上貿易、跨界貿易、走私貿易等方式，將中國印製的圖書送往世界各地。這些透過貿易管道所外銷的書籍，規模往往更為可觀。

63

第三節 明代河南的文化與教育

由於中國古代的私家藏書活動，包含了中國古代圖書的傳承、典藏、整理和研究，故與古代學術文化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⁶⁴此外，藏書家將自己藏書為珍寶，在戰亂之時搶救古籍使之免遭損毀，具有保存學術文化之功，因為其保存的

⁶¹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 46，〈河南一〉，頁 1936。

⁶²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7 月），頁 40。

⁶³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年 1 月第 1 版），頁 150-155。

⁶⁴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 8 月初版），頁 1。

圖書，正是推動文化與教育、學術研究的基礎。⁶⁵與此同時，明代的統治者朱元璋非常重視文化與教育的發展，在建國之初，明太祖即進行了許多利於文化發展的教育政策，也進而促進圖書事業的發展。⁶⁶

一、 明代河南的科舉事業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乃肇始於隋煬帝大業 2 年（606）在東都洛陽舉辦進士科取士，過程中經歷了隋朝的創立，唐朝的奠基，宋朝的改革，以及明朝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長達 1300 年之久，一直沿襲至清朝末年（1905）才停止。⁶⁷

而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中，社會階層及階層體系都是封閉式或半封閉式的，社會流動非常稀少，幾乎呈現水平流動的現象。在社會流動中，社會成員將會從一種社會地位轉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或是不同階層職業之間的轉變，這樣的流動方式可視為垂直流動。科舉制度所引起的社會活動，也是當時能改變社會地位的唯一方式。⁶⁸同時，科舉之設也是為了替封建王朝選拔官吏、建立官僚團隊，因此，古代舉凡科舉出身的官員，無疑地擁有維護封建統治的本質。許多讀過聖賢書的士人，也會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取出仕的機會，達成安世濟民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百姓的利益，同時推動了社會的發展。⁶⁹當然，隨著科舉制度的產生，教育事業成為了專制政治下的官僚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事業。⁷⁰

⁶⁵ 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圖書館學季刊》，1926 年第 1 期），頁 39。

⁶⁶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9 年第 2 期），頁 98-99。

⁶⁷ 梁建華，〈明代河南科舉的特點及歷史作用〉（《教育評論》，2010 年第 5 期），頁 131。

⁶⁸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36。

⁶⁹ 梁建華，〈明代河南科舉的特點及歷史作用〉，頁 131。

⁷⁰ 陳秀宏，《唐宋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0 月第 1 版），頁 176。

宋元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科舉事業日益興盛。當時北方戰亂平凡，雖然因而造成北方科舉事業呈現衰落的趨勢，但並未從此一蹶不振。以河南的懷慶府為例，歷朝以來文明程度相對較高、政治與文化素養條件優越，即便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多數的官宦鉅族、門第世家依然能夠透過科舉維持著良好的門第家道。這對於當地的教育推動及文化發展，也確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力。⁷¹

明代延襲宋元舊制，在各府州縣的地方學校設立了藏書樓，供儒學生員們借閱書籍，作為學習之用。當時，明太祖朱元璋在經歷政治、軍事的鍛鍊，以及受到奔投在他身旁的知識份子影響，使太祖深深地了解圖書對教化臣民、鞏固極權專制統治的重要性，因而對訪求古今圖書非常重視。⁷²太祖曾經下詔曰：



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主灰冠禮樂之教號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鬥，惟知干戈，莫識俎豆。聯恆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⁷³



太祖詔令天下廣設學校，使得讀書人的數量不斷地增加，⁷⁴不但培養出建國後急需的官僚人才為新政權服務效忠，也藉此攏絡知識分子。可見明代官僚系統的人才來源，主要是透過科舉考試取中的舉人、進士來構成。然就整個明朝而言，舉人出身較不受重視，一般只能擔任低層職位，即便少數仕宦顯要者，也多遭世俗譏諷，故對國家及地方的影響力偏弱，因此，進士才是明代整個官僚體系的主要

⁷¹ 李小白，〈明代河南懷慶府進士區域分佈研究〉（《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頁54。

⁷² 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2期），頁107-108。

⁷³ 明·陳治本，《皇明寶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53-54，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9月初版，明萬曆30年（1620）秣陵周氏大有堂刊本），卷1，〈興學〉，頁36。

⁷⁴ 王維臨，〈《文淵閣書目》與《內閣藏書目錄》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4月），頁7。

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明朝中後期。也因為進士們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熏陶，服膺於儒家，明瞭「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擁有懷抱忠君報國的思想，這對於古代封建社會秩序的維護，以及極權統治地推行相當有利。話雖如此，明代不論是進士或是舉人出身，官職高者自然能夠影響國家政局，而官職低者，往往也能影響著一方黎庶，教化鄉邦。⁷⁵

藏書活動伴隨著科舉事業的興盛而發達，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許多人也往往是因為讀書，才有了藏書的習慣。例如明代華亭縣藏書家何良俊（1506-1573）便是，他自稱：

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霸之餘略，以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即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憚。⁷⁶

從上述當中，可以看出何良俊除了癖嗜藏書外，也非常熱愛閱讀。他是一位喜好讀書之人，對於家中的藏書手不釋卷，就連上廁所也會進行閱讀。⁷⁷凡遇異書，就算典當衣物或縮減飲食費用，也會不計書價的購買，以必得為志。得書之後便縱情閱讀，每當遇到書中的難題時，他總是不屈不撓，深思以求其解，以至於他的學識相當淵博。正因為他這樣的個性，使他不斷地蒐訪圖書，成為知名的藏書家。綜上所述，可以推論古代文人往往是因科舉而讀書，為讀書而藏書，最後成為藏書家。所以，科舉制度和古代私人藏書事業，是息息相關的。

⁷⁵ 陳娜，《明代河南人口問題探析》，頁 24。

⁷⁶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歷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

⁷⁷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 57。

二、 明代河南書院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書院肇始於唐代的「麗正書院」，最初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做藏書與校書的工作。⁷⁸到了宋代時期，書院活動進入到活躍的時代，不但藏書內容豐富、規模更是廣大。⁷⁹而在宋、元兩朝時，書院事業已蓬勃發展，加上印刷術的成熟，更加推動書院藏書事業進入繁榮的階段，使得書院的發展也較前代獲得更進一步的推廣。⁸⁰另外，在藏書方面，當時書院藏書為了配合教育，收藏的圖書以學術研究為主，也非一人的私產，特立於公、私藏書之外。⁸¹入明以後，書院藏書益發鼎盛，規模較宋元時期有更大的提升，往後成為中國古代四大藏書類型之一。⁸²

明代隨著學派林立，書院講學風氣興盛，再加上每個學派皆有嚴格的傳承關係，以及對書院先賢的祭祀，管理規範化等因素，遂形成了明代祭祀、教學、藏書與生活融合為主體的學校建築類型。當時書院的建築規劃大致分成 5 個部分：祭祀區、教學區、藏書區、生活區、遊憩區。以藏書為主要的部分，是以藏書樓為中心，當時多半稱為「御書樓」或「尊經閣」，至於沒有藏書樓的書院，書籍僅能放置在其他區域。⁸³

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其中包含他人的捐贈，然而向書院捐贈圖書是歷代的傳統，儘管捐贈圖書的數量不等，捐贈的目的各異，這都為豐富書院藏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⁸⁴除此之外，書院藏書的來源還有藉由皇帝賜書、官府配置、書

⁷⁸ 呂昊青，《明清河南書院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5 月），頁 14。

⁷⁹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 年第 7 期），頁 23。

⁸⁰ 任蒙，〈中國書院藏書事業考略〉（《圖書館學刊》，2018 年第 5 期），頁 112。

⁸¹ 李光生，〈宋代書院藏書論略〉（《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6 年第 3 期），頁 22。

⁸² 任蒙，〈中國書院藏書事業考略〉，頁 112。

⁸³ 呂昊青，《明清河南書院研究》，頁 14-16。

⁸⁴ 蕭東發、鐘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圖書館》，2001 年第 1 期），頁 72。

院自籌……等途徑。⁸⁵然而，中國古代的書院藏書的發展過程，並非一路順利地向上發展，而是隨著書院的興衰而產生變化的。⁸⁶

明初，河南地區絕大多數的書院都毀於兵燹。例如在元代以規模宏敞、學術資源充足而聲名遠播的南陽「諸葛書院」，便是在元末鼎革戰火當中毀損頹圮，僅存遺址；永城的「澮濱書院」，亦於至正末的戰亂中被毀。而嵩州的「伊川書院」更是遠近馳名，是宋、元理學的發展聖地，卻也不幸燬於元末兵災。還有許多河南的書院，如陽翟的「儒林書院」、光山的「涑水書院」、睢陽的「應天書院」等，都是毀於此時。⁸⁷

整體而言，明代的書院事業於前期並不受重視，後期又遭到幾次禁毀，其發展歷程可謂艱辛。然而，這並不意謂著中國古代的書院藏書事業在明代呈現停滯不前的狀況，事實上，它仍是以某種程度在向前邁進。⁸⁸明朝建立後，有鑑於河南境內各地書院的殘破，為了振興地方的教育事業，當地政府便開始積極修復、建設河南的書院。

以下僅就明代於河南轄下的開封府、南陽府、河南府、汝州府等處的書院建設與發展情況，作一綜整，以便了解當時地區文化與教育事業的真實面貌，進而略探明代河南私人藏書文化風行的時代背景。

⁸⁵ 任蒙，〈中國書院藏書事業考略〉，頁 113。

⁸⁶ 陳傑、楊雅君，〈古代書院藏書探析〉，頁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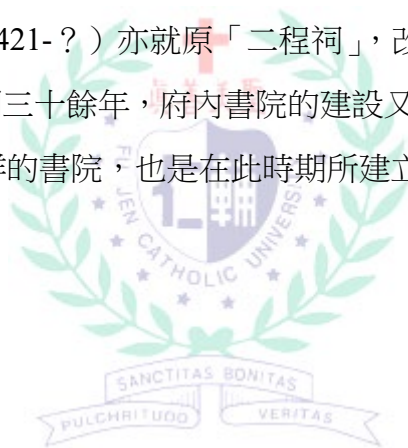
⁸⁷ 鄧洪波、樊志堅，〈明代書院的藏書事業〉（《江蘇圖書館學報》，1996 年第 5 期），頁 45。

⁸⁸ 鄧洪波、樊志堅，〈明代書院的藏書事業〉，頁 45。

(一)、 開封府

相較於元代，明代時期書院分佈區域的變化最大，而在河南地區書院崛起於開封府。然而，開封府的書院建設，在明初同樣經歷了一個近百年的沉寂期，從洪武元年（1368）到成化元年（1465），全府僅有提學副使劉昌（1424-1480）於天順 5 年（1461）建立「麗澤書院」一所而已。

不過，從成化元年開始，開封府的書院建設開始躍進，陸續在各地方設立了許多書院。在成化 4 年（1468），襄城縣籍的戶部尚書李敏（1425-1491）於縣西南紫雲山之麓建立書院，制如儒學；17 年（1481），李敏奏請朝廷頒發匾額，乃賜名「紫雲書院」。次年，通許縣知縣也修建了「育英書院」，共有堂房 36 楹；另外，還有巡撫李衍（1421-？）亦就原「二程祠」，改建為「二程書院」。成化以後，歷弘治、正德兩朝三十餘年，府內書院的建設又呈現中斷。然而，這時府內仍有 5 所創設年代不詳的書院，也是在此時期所建立。⁸⁹



(二)、 南陽府

自古以來，南陽就為河南的重要之地，形勢險要，經濟發達，屬於典型的盆地環境。這裡民風淳樸，「淳尚詩書，去本歸末」，直至今日，仍是省內教育發達之區。⁹⁰

明代南陽府境內建有 12 所書院，外加 5 所創設年代不詳者，共有 17 所。到了明朝末年，本地書院相繼廢弛，其中有 4 所毀於戰爭，即泌陽的「豐羽書院」、葉縣的「問津書院」、新野的「百水書院」、鄧州的「臨湍書院」。長期荒廢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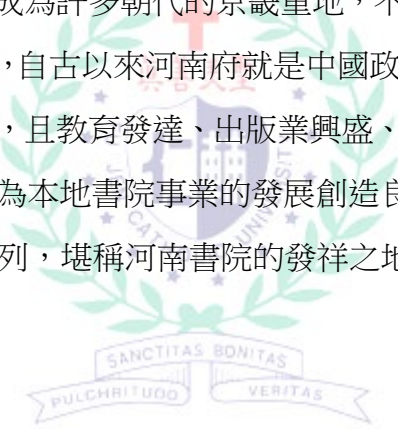
⁸⁹ 王洪瑞，《河南書院地理初探》（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4 月），頁 54。

⁹⁰ 王洪瑞，《河南書院地理初探》，頁 55。

4 所，即南陽的「養正書院」、舞陽的「舞泉書院」、鄧州的「賈狀元書院」、「大成書院」。至於存廢不詳者，則有 9 所。其中，約略可知惟葉縣的「問津書院」於萬曆 7 年(1579)朝廷下令禁毀書院時曾經遭到廢除，但在萬曆 18 年(1590)，知縣高文登又予以重建，可惜不久又毀於兵燹。總之，明代河南南陽府大部分的書院都是屢屢增修，時興時廢。⁹¹

(三)、河南府

河南府地處河南西部，多名山大川，土壤肥沃。⁹²同時，河南府也是地勢險要、歷來民風尚學之處，成為許多朝代的京畿重地，不但經濟穩定，於文化、教育方面，也較為發達。因此，自古以來河南府就是中國政治與文化重心的所在地，不僅物產豐足、經濟繁榮，且教育發達、出版業興盛、文化交流頻繁，這些時代社會背景的條件因素，都為本地書院事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⁹³促使本地書院建設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堪稱河南書院的發祥之地。⁹⁴



(四)、汝州

汝州地狹縣少，僅以區區四縣，夾處在開封、南陽、河南三府之間。由於北端靠登禹，西邊連接篙洛，南端依宛葉，東邊連接襄許，既有伊洛之學的教化，又屬人潮密集之地。因此，汝州在明代先後建立了 14 所書院，比起元代，整整多了 13 倍，成為有明一代河南書院分佈較為密集的区域。⁹⁵

⁹¹ 王洪瑞，《河南書院地理初探》，頁 56。

⁹² 劉炳陽，〈明代河南府行政區劃沿革〉（《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104。

⁹³ 梁建華，〈明代河南科舉的特點及歷史作用〉，頁 132。

⁹⁴ 王洪瑞，《河南書院地理初探》，頁 57。

⁹⁵ 王洪瑞，《河南書院地理初探》，頁 56。

三、 明代河南的圖書事業

書籍是文化的載體，也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的反映和沉澱，致使文化得以保存與傳播。藏書事業是由千年以來文化的積累、保存、整理、傳播及再創造的重要系統。⁹⁶此外，印刷術的發明也使得書籍售價降低，讓書籍更容易融入民間進行流傳。⁹⁷

可見推動私人著述的進一步發展、促使紙張廣泛的使用，以及圖書裝幀方式的改進，都與印刷術息息相關，也因而推動了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較諸前代，當時的私家藏書不僅規模較大，分佈範圍也較廣泛。⁹⁸此後，書籍的製作材料與方式持續不斷地革新進步，進而促使私人藏書事業不斷地發展，使得明代進入空前的鼎盛局面。另外，明代私人藏書具有很強的地域特徵，在地域分布上相當不平衡。大致來說，北方地區較少、南方地區則偏多，而南方地區的私家藏書，又大多集中分布於江蘇、浙江一帶，而河南介於中間偏西北的位置，藏書事業不若江南發達。⁹⁹

明初，朝廷為了鞏固新政權的極權統治，於是傳統封建思想的意識明顯的表現於太祖朱元璋的政策上。¹⁰⁰首先，朱元璋採取減免稅糧、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設施，致使農業產生了基本改觀。此後，經過六、七十年的努力，明代的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水平才得以逐漸復興起來。¹⁰¹到了明中葉以後，社會上經濟和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使得士大夫、官紳富庶之家，乃至一些讀書人皆有餘力蒐書、藏書。¹⁰²由於當時社會上金錢的快速流通與手工業的崛起，加上海上貿易的興盛，使得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經濟貿易發展快速，已經擺脫明初戰亂的貧窮與不安，進

⁹⁶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 20。

⁹⁷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頁 130-131。

⁹⁸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頁 39-40。

⁹⁹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江西圖書館學刊》，2001 年第 4 期），頁 64。

¹⁰⁰ 蘇晉予，〈河南藩府甲天下—明代河南藩王述論之一〉（《史學月刊》，1991 年第 5 期），頁 40。

¹⁰¹ 馮曉霞，《浙江藏書史》（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 年 5 月第 1 版），頁 62。

¹⁰²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頁 98。

入貿易鼎盛的階段。¹⁰³在經濟的快速發展下，印刷出版業也跟著活絡起來，人民對文化消費需求的提高，更是促進印刷出版業繁榮的重要條件。此外，明代於造紙技術上也擁有許多獨特的工法，例如竹紙、皮紙等各種紙張的選料、配料及工法技術，較諸以往都顯得更為進步。¹⁰⁴

中國的印刷術發明於隋唐之際，但它的醞釀過程卻十分漫長。印刷術的發展得益於印章、拓印及雕刻等複製技術的成熟。¹⁰⁵晚唐時期的雕版印刷術已經趨於實用，印刷非常清晰，但當時只限於印製佛經而已。直到北宋初期，官刻書籍才慢慢獲得發展，而後進一步地推動雕版印刷業，使得印刷技術也愈臻於精美，逐步開啟了官、私印書盛行的局面。¹⁰⁶

不久，北宋中葉又發明了活字版印刷術，有泥活字和木活字，使得書籍的印製成本更為低廉。¹⁰⁷當時印刷術已被廣泛地運用，活字版印刷更為當代新的印刷技術，也被廣為使用。印刷技術的進步，不但促使刻書作坊遍佈各地，市場上圖書的種類與數量也自然隨之大幅地增加。¹⁰⁸到了元代，為了迎合消費者文藝品味的提高，坊間又出現了套版印刷技術，讓書籍的版面更加豐富美觀。套印技術發展到了明代的萬曆年間達到了極盛，應用在色彩版畫上，其技術更加複雜，要一色一版，十色十版，顏色的深淺濃淡，以及圖畫的陰陽向背，皆能夠表現出來。這同時需要運用各種技巧才能完成的技術，成為了當時的「彩色印刷」。¹⁰⁹

總之，經過歷朝歷代的發展，中國造紙技術與出版印刷業都不斷地進步。中國的印刷術普遍盛行之時，其官刻、坊刻、私家刻書也都同時獲得開展，終於成

¹⁰³ 郭姿吟，《明代書籍出版研究》，頁 95。

¹⁰⁴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 65。

¹⁰⁵ 袁立澤，《變革有成文化傳－中國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 10 月初版），頁 68。

¹⁰⁶ 昌彼得，《中國圖書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 年 10 月再版），頁 27-37。

¹⁰⁷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世紀文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37。

¹⁰⁸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頁 23。

¹⁰⁹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9 月初版），頁 248-249。

為古代雕版印刷術的三大系統，¹¹⁰而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也逐漸邁向鼎盛時期。到了明代，全國的刻書機構已經非常多，包括中央的經廠、國子監、都察院、禮部、兵部……等單位，以及地方上的各級衙門和藩府，再到民間的私宅、坊肆，都競相刻書，且數量都非常大。¹¹¹

四、明代河南的藩府藏書

中國古代政府普遍注重圖書的保存及管理，設置了許多管理機制，具有優良的傳統。周朝中央政府典藏了各種不同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仍以輔助國家政事施行為主要目的而典藏的。漢代時期的內府藏書，已成為了一項專門事業，他們開始重視藏書的目標、擬訂計劃、講求永續經營等經營理念，這個轉變使得之後的藏書被稱作藏書事業。兩漢時期，官府藏書不但數量遽增，且收藏更為豐富。當時執行政府藏書事業的官員甚多，包括：太常、太史、博士、御史等皆是，至於藏書的地點則包括蘭臺、石室、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溫室、延閣、廣內、秘室，以及東漢的東觀等藏書場所。¹¹²東漢桓帝延熹 2 年（159）創設秘書監，成為負責管理中央政府藏書事業的專門機構，並逐步形成了完備的管理制度。¹¹³由於當時的專業管理，使得東漢的官府藏書事業不斷向上發展，而文化的進步也是圖書被受重視的原因之一。¹¹⁴

¹¹⁰ 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 年 11 月第 1 版），頁 68。

¹¹¹ 王維臨，《《文淵閣書目》與《內閣藏書目錄》研究》，頁 8。

¹¹² 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4 月初版），頁 8-33。

¹¹³ 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5 月），頁 10。

¹¹⁴ 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頁 8。

今人認為，這段期間裡頭文化的躍進，有賴於東漢末年蔡倫（63-121）對造紙技術的改進與突破。相較於以往的書籍載體如竹條、木簡、布帛等材料，紙張顯得更加易於收藏、攜帶、書寫，尤其比布帛的成本低廉，故對典籍的複製與流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¹¹⁵唐代以後，由於藏書盛行，中央政府的藏書事業獲得更加輝煌的成就，出現了不少知名的藏書大家。¹¹⁶此後，中央政府的圖書管理機關，於歷代獲得不斷的興革，組織與功能益發進步，例如：隋唐的秘書省、兩宋的秘書省與三館秘閣、元代的秘書監、明代的翰林院……等。¹¹⁷

明初沿襲元代制度，依舊設立秘書監，並任命秘書令、秘書丞等官員來負責主持與管理中央政府藏書事宜。如同漢、隋、唐、宋各代一樣，明代也繼承了前代的官府藏書，並成立了「大本堂」、「文淵閣」等中央政府藏書處所。¹¹⁸洪武13年（1380），朝廷裁撤秘書監，併其職於翰林院典籍，與詹事府司經局、內廷宦官機構等單位，一同管理內府藏書，形成了獨特的內府藏書管理體系，並以此為基礎，開展相應的訪書、編目、纂修、抄錄、刊印等圖書業務相關工作。¹¹⁹

從北宋開始，由於河南地區多遭兵燹，致使當地的經濟、社會、教育與文化等各方面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政治、經濟地位已大不如前。但因鑑於河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具有悠久且良好的歷史文化傳統，使得明代建立之初，朝廷就十分重視對河南的經營。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今開封），並且曾經想要定都於河南開封，卻因許多考量而猶豫不決，一直到洪武11年（1378），才打消了建都開封的念頭。不過，太祖仍然視河南為重要區域，為了經營好河南，使得河南能夠成為穩固明王朝北疆的基石，太祖乃下令在河南建藩封王，讓宗室替朝廷

¹¹⁵ 羅竹蓮，〈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淺析〉（《時代文學》，2008年第4期），頁87。

¹¹⁶ 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頁10。

¹¹⁷ 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頁10。

¹¹⁸ 顧永時，〈古代官府藏書流通管理及影響〉（《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頁100。

¹¹⁹ 易凌等，〈明代內府藏書管理及其啟迪〉（《高校圖書館工作》，2018年第3期），頁92。

固守邊陲。11 年，朱元璋冊封第 5 子朱橚為周王，就國開封，開啟了明代河南的宗藩政策。其後，終明之世，又陸續有唐王、伊王、趙王、鄭王、衛王、秀王、崇王、徽王、汝王、滿王、福王等 11 位藩王，被分封於河南地區。¹²⁰

明代的藩府藏書地域擴及全國，喜好藏書的藩王很多，例如朱元璋的第 6 子周王朱橚與第 17 子寧王朱權，皆收藏了大量的珍貴書籍，彬彬尚文，好學崇禮。這些熱衷於藏書的藩王所藏的書籍種類也相當多元，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國家檔案等書籍外，尚有天文、小說、雜技等禁書，這些藏書便成為了珍貴的古代文化資產。¹²¹

其實，明代藩府藏書的興盛是起因於為了躲避政治迫害、維護專制極權統治的基本利益、裨益國家的治理、維護中央的統治權等目標，尤其朝廷認為四書、五經為有助箝制市民思想的重要經典，可用來了解天地、縱觀陰陽、嚴正紀綱、強化傳統封建倫常與秩序。¹²²因此，朝廷往往會刊印四書、五經等書，並頒賜給天下藩王。對於朝廷來說，明代的藩府藏書不僅可以羈縻宗藩的政治野心，豐富諸王的學識以效忠朝廷，同時，還可將藩王可能會貪圖逸樂、魚肉鄉民的作風，轉移至培養他們的藝文創作能力。此外，更因為宗藩們積極的抄書和刻書，讓許多古代的圖書得以保存與流傳至今，¹²³且就其數量、規模和藏書人數來看，可謂歷朝之冠。¹²⁴

在明代經濟的高度發展下，為宗室的文化事業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尤其到了嘉靖末年，城市經濟已經相當發達，造紙和印刷業的規模與技術，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這些都為藩府藏書及開展圖書出版事業，提供有利的物質基礎。¹²⁵

¹²⁰ 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頁 10。

¹²¹ 張世瑩，《明代藩府刻書及其流傳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頁 44。

¹²² 任民鋒，《中國古代文化價值觀與藏書特色之分析》（保定：河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5 月），頁 27。

¹²³ 張世瑩，《明代藩府刻書及其流傳研究》，頁 44。

¹²⁴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頁 131。

¹²⁵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頁 114。

有明一代，河南宗藩以藏書知名者主要有周府、鄭府與徽府等，其中，又以周府的藏書數量最多。傳至六世孫朱睦㮮，字灌甫，號西亭，又號東坡居士，覃精經學，曾任周藩宗正，不僅著述等身，且畢生癖嗜蓄書，極力蒐訪天下典冊，足跡自中州以至吳中、兩浙、東郡、耀州、澶淵、應山諸處，或購求，或寫錄，或補綴，積書甚富。¹²⁶

明代藩府藏書分布地區廣、藏書數量豐富，為古代圖書的保存與流傳，做出極大的貢獻。至於刻書方面，明代藩府的種類也很多樣化，包括了古今載籍，甚或是自己編撰的書，以及宗室撰寫的書。明代的宗藩憑藉優越的經濟條件與政治地位，加上豐富的藏書，可為其從事校訂和刊刻古籍活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與優質版本。¹²⁷前述周藩宗正朱睦㮮即為顯例，其藏書豐富，高達 12,560 卷，建「萬卷堂」以儲書，藏書聲名天下遠播。¹²⁸

藏書目的的多元化，有些藏書家為讀而藏、為用而藏、為追求功名利祿、為顯示風雅，或因興趣而藏，藏書動機不一，尤其是追求珍刻秘槧者，這類藏書家往往熱衷於追求稀有版本，並關注圖書交易於市場上的變化，對於市場上變化莫測的價格走向瞭若指掌，以上種種條件皆促進了明代藏書事業的發展。當然，也在明代藩府藏書風氣的興盛之下，更為宗室教育與發展帶來了重要的改變。¹²⁹

¹²⁶ 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頁 43-46。

¹²⁷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頁 113-128。

¹²⁸ 汪如潤、馬偉，〈明代河南宗藩詩人考論〉（《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1 期），頁 84。

¹²⁹ 祁琛雲，〈宋代宗室藏書及其文化教育研究〉（《貴州文史叢刊》，2011 年第 4 期），頁 6。

第四節 明代私家藏書活動的興盛

考諸史冊，中國古代私家寔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孔子（551-479）首創私人講學之風氣，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精神，而後孔子弟子相傳先後大約有 3000 人，其中著名的有 70 餘人。這為私家藏書的發展創造了非常有利的開端，尤其是在教育的推廣上，同時促進了私家藏書活動的發展。¹³⁰

隨著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印刷業的繁榮，這些條件使得私人藏書有著良好的基礎，並且在短時間內能夠蓬勃發展。不但藏書家的藏書量越來越大，種類亦越來越多，而藏書家之間的文會過從也越來越頻繁，很多藏書家訪書、購書都是透過文會過從時，所獲得圖書資訊的。¹³¹

作為中國古代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觀藏書、書院藏書等四大藏書體系之重要組成部分的私家藏書。其私家藏書的特色，包括當藏書家如遇珍奇異書時，將不惜金錢大量購買；或是將私家所藏書籍進行嚴密保存，不但不對外開放借閱，甚至制定保管法則與入閣觀書之相關規定；以及藏書家在藏書時對於書籍的校刊、整理、抄寫、勘刻極為重視。此外，除了上述所談到對於私人所藏的書籍並不開放外，反之有不少數藏書家非常注重書籍的流通與共享，願意開放私人的藏書樓，供他人閱覽及借出進行抄寫，這種互相借轉借校，進而豐富各自的藏書，也使書籍能不斷地流傳下去。¹³²

再加上，明代時期的教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優異條件，使得私家藏書獲得空前規模的發展。私人藏書不僅成為政府藏書的重要補充來源，更是讀書人和學者利用之資。¹³³

¹³⁰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2008 年第 10 期），頁 189。

¹³¹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 26。

¹³² 王美英，〈試論明代的私人藏書〉，頁 117-118。

¹³³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2003 年第 4 期），頁 20。

一、私家藏書方面

明代私人藏書的風氣格外興盛，形成社會各階層的一股時尚。當時，雕版印刷與活字版印刷都非常發達，官府、坊肆、私家、寺觀等印書活動都十分活絡。由於各方刻書活動的普遍及盛行，為私人藏書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刻書家本身即為藏書家，使得私人藏書具有優良的品質及豐富的來源。同時，官刻、坊刻的盛行，也為私人藏書的積累提供了保障。¹³⁴

以下為明代私人藏書的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時期加以介紹：

(一)、 明初至天順年間（1368-1464），是明代私家藏書的萌芽期：

藏書多由高官顯貴所倡導，藏書家大多以官員、士大夫為主，普通庶民百姓所佔的數量並不多，這個時期的私家藏書呈現剛剛起步的特徵。¹³⁵當時著名的藏書家，以浙江的宋濂（1310-1381）、江西的楊士奇（1365-1444）、南直隸的葉盛（1420-1474）最為知名。¹³⁶

(二)、 成化至隆慶期間（1465-1572），是明代私家藏書的繁榮期：

承接前期，明代的私家藏書持續發展，漸趨鼎盛。另一方面，官府藏書因缺乏固定的管理機構而導致衰退，再加上當是官府藏書流傳不廣，人們轉而重視私

¹³⁴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 24。

¹³⁵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頁 98。

¹³⁶ 黃玉淑、于鐵丘，《趣談中國藏書樓》（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1 版），頁 92-93。

家藏書，這是明代中葉私家藏書鼎盛的關鍵原因。此時藏書大家群雄並起，藏書規模不斷擴大，藏書家的身份由早期的貴胄顯宦為主，慢慢地下移至普通的士庶布衣，而後私家藏書總量與官府藏書相比，私家藏書越來越具有壓倒優勢。¹³⁷這個時期，陸陸續續地出現了不少藏書家，如河南的左國璣（1522-1566）、浙江的范欽、南直隸的文徵明（1470-1559）、江西的嚴嵩（1480-1567）等。

（三）、 明萬曆至崇禎末年（1573-1644），是明代私家藏書的延續期：

神宗萬曆以後，朝政腐敗，社會崇尚奢華委靡，世道低落，但當時的私家藏書風氣依然得以延續，藏書事業仍舊興旺。在這個時期各地區也陸續產生了例如河南祥符縣的周亮工（1612-1672）與福建閩縣的徐燭（1570-1645）等以藏書為名的藏書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藏書流通共享觀念甚囂（古義：人聲喧嚷，塵土飛揚），很多藏書家都紛紛起來鼓吹，例如南直江陰的李如一，倡導藏書共享；浙江秀水的曹溶，則撰寫《流通古書約》，號召同好分享藏書；而徐燭也認為圖書不可單純的被當作私人財產來收藏，而是應該與人分享，進行交流，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藏書。¹³⁸

二、藏書樓方面

藏書樓在中國歷史上已有 2000 年歷史，而明代是中國古代圖書事業發展的重要時期，藏書樓在明代的發展，可歸功於當時印刷書籍越來越容易取得。¹³⁹藏

¹³⁷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頁 98。

¹³⁸ 莫燕紅，〈明代晚期藏書家藏書開放思想溯源〉（《圖書館學刊》，2013 年第 3 期），頁 116。

¹³⁹ 加·卜正民，〈明代的社會與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6 月第 1 版），頁 149。

書達到了一定的數量和規模，必須有個專門的地方放置和保存，而藏書樓就為藏書之處。¹⁴⁰古代的藏書家們都特別留意館藏建築，¹⁴¹尤其是明代的藏書家，特別喜好營建書樓以藏書，他們多半將書樓建立於高處，目的在於登高望遠，營造山水環伺的優美景色。¹⁴²通常放置在官府藏書的書樓建立者大多為地方官員，由他們負責創建及修復，有時也會向當地的富人進行募捐，作為一部份的經費來源。

143

不同於官方藏書，私家藏書樓的具體樣式及樓閣、房舍的設計，形態比較豐富多樣，在長期的私家藏書史上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傳統，¹⁴⁴文人經常會在藏書樓裡閱讀、著書、談藝論道或交友宴樂。¹⁴⁵

明代浙江寧波藏書家范欽曾經做過很多地方的官員，而他每到一處，便廣泛蒐羅各地的奇書及地方的文獻。經過數十年的辛勞，使其藏書累積到七萬餘卷之多，而當時中央政府藏書機構文淵閣，也只有四萬多卷藏書而已。至今，范欽的藏書樓「天一閣」還保存著數千塊明代的雕板，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雕板印刷的重要材料。被譽為「江南書城」的「天一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家族圖書館之一。¹⁴⁶

明代的私人藏書活動十分繁盛，其中與藏書家秉持保守態度有關，例如藏書堅決不外借，僅供自己和族人使用，如上述的「天一閣」就是如此。反之，也有許多藏書家的思想較為開明，主動將私藏對外開放，允許外人借閱，或與其他藏書家互抄互刊，或將私藏刊布流通於眾。當然，中國古代私人藏書家開放私藏的

¹⁴⁰ 石洪運等，《圖書收藏及鑒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頁180。

¹⁴¹ 楊虎，〈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活動文化特質初探〉（《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頁101。

¹⁴² 呂允在，〈明人書齋的命名，格局與佈置〉（《藝術學報》，第83期，2008年10月），頁263-265。

¹⁴³ 萬雷，〈簡論明代中期的學校藏書樓〉（《出版廣角》，2017年第304期），頁48。

¹⁴⁴ 楊虎，〈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活動文化特質初探〉，頁102。

¹⁴⁵ 呂允在，〈明人書齋的命名，格局與佈置〉，頁263-265。

¹⁴⁶ 李姝娟，〈明代藏書樓「天一閣」的藏書文化及其貢獻〉（《蘭臺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24期），頁109-110。

思想並非始於明代，前代已經有些藏書家為其提供了榜樣。在這些實踐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代藏書家將私藏開放的思想發揚光大。¹⁴⁷

相對於私人藏書事業，歷代帝王透過國家力量進行官府藏書建設，利用所藏的書籍，尤其是被視作治世工具的儒家經典，作為施政參考、培育官員、著書立說、名流千古的根本。同時，透過儒家經籍的治世功能，也能維護和鞏固當權者的封建專制統治，所以，古代的官府藏書便是在此功利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於這種概念，封建統治者在藏書機構的制度化管理上顯得非常重視，除了設置明確、專門的管理機構，還大量興建專門的藏書處所，並且規定專職來擔任管理者，給予很高的地位和待遇。¹⁴⁸

但相較於私家藏書，明代中央政府的藏書則顯得暮氣沉沉。明代初期、中期，內府藏書還有一定的數量，數量多的時候約二萬餘部，只可惜由於沒有嚴格的藏書管理制度，造成精本、善本的丟失情況。再加上沒有定期地整理、校勘圖書，以致於明初積累的藏書，到了中後期已經散佚甚多，損失慘重。相對於內府的藏書趨於衰落，當時的士大夫、平民百姓，卻是想方設法地蒐集圖書，使得私人藏書日益增多，甚至出現藏書家的收藏數量已超越了中央政府的藏書規模。¹⁴⁹至於明代中後期圖書事業的高度發展，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社會政治的富足、造紙業和印刷業技術的進步，具有密切的關聯性，然而這些背景條件對於書籍的傳播與推廣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

此外，由於明代統治者大興文化教育事業，鼓勵士庶讀書參加科舉，促使社會上對於書籍的需求大增，為明代圖書產業的活絡開創契機。加上明朝政府又實行了許多的優惠政策，例如：廢除書籍稅、出版較為自由等措施，都為圖書事業的開展帶來一定的利基與動力。因此，也使得私刻與坊刻十分興盛，幾乎全國隨處都可見，北到河南、南到廣東、雲貴，東至江浙，西到陝西、寧夏，北方以北

¹⁴⁷ 董文強，〈論明代藏書家的開放思想及其對私人圖書館的啟示〉，頁 7。

¹⁴⁸ 任民鋒，〈中國古代文化價值觀與藏書特色之分析〉，頁 12-13。

¹⁴⁹ 王美英，〈試論明代的私人藏書〉，頁 116-117。

京為首，南方以江蘇為重。在發展過程中，各地漸漸出現大規模的刻書中心，如建陽、金陵、蘇州、杭州、新安、北京、大名等，而後大量的藏書家開始自行刻書，例如常熟毛晉、江蘇朱承爵(1480-1527)、浙江范欽、浙江李之藻(1565-1630)等人。¹⁵⁰

基於上述原因，使得前一代的書籍得已大量出版，致使明代社會從上到下都以藏書、刻書為榮，當時以賣書為業的店鋪更是遍布全中國，據《江浙藏書家考略》的統計，宋代知名藏書家約 80 多人，元代僅 30 多人，然而明代知名藏書家已大幅增加到 500 多人。¹⁵¹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私家藏書樓的分布並不平均，主要分布在東南地區。明初開始，江南地區的私家藏書發展便已開始有所起色。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南方省份的經濟較為發達，以及出現了更多樣化的文學藝術創作，再加上江浙一帶是當時全國出版中心的所在地，還具有長久優良的藏書傳統，於是使得江南地區的私人藏書活動步入鼎盛的局面，尤其是江浙地區的私家藏書發展快速，逐漸確立了全國藏書中心的地位。同時，明代中後期的私家藏書分佈地域也獲得更大範圍的擴展，南方的江西、福建，北方的山東、河南、直隸等省，皆出現了數量不等的藏書名家。¹⁵²

¹⁵⁰ 周飛越，〈明代藏書事業繁榮的政治因素探究〉（《新世紀圖書館》，2010 年第 3 期），頁 101。

¹⁵¹ 李姝娟，〈明代藏書樓「天一閣」的藏書文化及其貢獻〉，頁 109。

¹⁵² 牛紅亮、張小玲，〈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 35。



圖二 大明一統之圖。¹⁵³

¹⁵³ 明·李賢，《大明一統志》，卷首，〈大明一統之圖〉，無頁數。

第五節 明代河南文人的風尚

私家藏書於圖書文獻的整理與學術的發展上，占很重要的一部份。在宋代，藏書家多半自我標榜志向不在博取功名，往往是為了讀書而藏書。此外，對於少數步入仕途的官僚士大夫來說，如果他們也是只為讀書而藏書，除了可以展現個人的風雅外，也可滿足本身的學術需求。一般而言，宋代藏書家的特點是將藏書與校讎工作結合，所以，他們不僅是熱衷於藏書之人而已，同時也是文獻學家。¹⁵⁴此外，也有單純只想滿足一己的慾望和愛書的癖好而從事藏書者，¹⁵⁵他們的藏書內容也經常會受到物質條件與本身偏好的影響。¹⁵⁶

南宋以後，由於一度受到靖康之難和金末戰亂的摧殘，導致河南境內的藏書家人數有所減少。其後，歷經元、明二代的蘊蓄，才又慢慢地恢復及發展。¹⁵⁷明代時期，河南藏書家的藏書活動逐漸成熟，私家藏書也比較普遍，書籍的借閱也更為開放，不但刺激了人們的讀書熱情，也使越來越多人開始投入學習，此現象對於當地文化之傳承與建構多有助益。¹⁵⁸自古以來，私家藏書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會環境下產生，因此，藏書的發達與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¹⁵⁹



一、明代文人的圖書收藏偏好

明代文人多喜好收藏書籍者，藏書活動也非常多樣化，包括書籍的蒐集、典藏、鑑賞和利用等。其中，鑑賞是一項特殊的收藏活動，需要有一定的學識功力

¹⁵⁴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頁 26。

¹⁵⁵ 徐雁，《滄桑書城》（長沙：岳麓書社，1999 年 4 月第 1 版），頁 26。

¹⁵⁶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3 月初版），頁 213。

¹⁵⁷ 張世瑩，《明代藩府刻書及其流傳研究》，頁 44。

¹⁵⁸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頁 26。

¹⁵⁹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頁 131。

來對藏品進行考訂、校讎、分辨真偽等工作，進而闡述自己的觀點。此外，在辨偽書籍之前，可先閱讀前人的經驗，藉以得知前人辨偽之成果，亦可從前人辨偽之過程，習得辨偽方法。¹⁶⁰明中後期，在藏書家注重鑑賞的風氣下，陸續有各種珍槧善本，以及總結鑑賞經驗的專門性著作湧現，對於滿足收藏者的需求發揮極大的貢獻。¹⁶¹

傳統中國文人對於讀書生活，多有陶醉、嚮往的理想，以致於有不少知識分子為此廢寢忘食。元代蘇州藏書家沈景春，每逢奇書，不但會宴請出售者，甚至支付高價購書。¹⁶²明代更多喜愛奇書之人，以沙縣名士樂純為例，他喜好藏書與讀書，每逢異書，則亟欲展書閱讀。樂純自述曰：

性好積書滿牀，生涯每得奇書，不即登床讀已始快。天恨生我眼，一經校閱，遂即了了。嘗嘆後生少年，得一奇書不知何語，以為難讀，便束書床，塵埃堆積，永不一披；即有稍知讀書者，必坐此弊，為之太息。¹⁶³

對於閱讀「奇書」、「雜書」，明代文人表現出積極追尋的態度，部分文人還出現近乎沉醉與癡迷的行為，較之前代更是過之而無不及。所謂「奇書」與「雜書」，乃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經學、史學之書，基於好奇、探索的心態，不少明代文人對於這類書籍都抱持著濃厚的興趣，而此類書籍內容所記載的知識與學問，也多半與傳統典籍有所差異，於是文人們透過多方閱讀，更能吸收大量的新知，擴大學問涵養的範圍。¹⁶⁴

另一方面，明代的藏書家也經常是為了利用而藏書，多半表現在作為進行複製、買賣，或是為了交友、分享等目的。藏書家之間的藏品時常互相流通，除進

¹⁶⁰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10月再版），頁210。

¹⁶¹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文博》，1998年第1期），頁87。

¹⁶² 余章瑞，《藏書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頁64。

¹⁶³ 明·樂純，《雪菴清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11，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影印），清供2卷，〈書床〉，頁13上。

¹⁶⁴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志趣的樹立〉（《藝術學報》，第84期，2009年4月），頁321。

行買賣外，往往還有為了交友而彼此互相贈送的。由於每位藏書家的藏品有所不同，所以除了互相借觀外，彼此之間還會透過借抄來進行交流，不但豐富了彼此的收藏，更增進了大家的情感。¹⁶⁵若由此看來，友誼可說是打開那些難以取得之藏書的另一把鑰匙。¹⁶⁶

藏書家間的活動除了書籍交流外，他們還會互相邀約鑑賞，或是一同飲酒吟詩，此唱彼酬，久而久之，便成了文友及書友。¹⁶⁷許多明代文人樂於交友，並邀請好友前來自家的園林亭榭，一同賦詩飲酒、品畫題跋，極度風雅。¹⁶⁸同時，許多文人也喜好清談，他們閒居鄉里山野，糾結志同道合之士，相互往來。¹⁶⁹為了經常聚會，保持聯繫，他們透過盟會結社的方式來進行，包括詩社，以詩酒悠游為主；怡老會社，具有隱居的性質，經營暮年社群；文社，以科舉作文為主，以及其他各式各樣不同主題或聚會宗旨的盟會社集。文社大多是為了求取科舉功名，因此，自然而然的就很容易跟政治牽涉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政治會社。¹⁷⁰

然而，當時不少文人雖然貧窮，而無力買書，卻仍然想盡辦法從藏書友人家中，借書來鈔寫及閱讀，且常日以繼夜的讀書；甚至藉此機會擷取群書的部分內容加以編輯，發為著述。藏書貴在「致用」，與好友共讀，互為切磋，相互啟發，以文會友，其樂無窮，同時讀書應當心眼並用，將書中知識，融會貫通，真正領悟讀書生活的真正趣味。尤其是讀書生活當中，若能得到一些益友的參與共融，便可化孤寂為樂趣，實為人生難得之際遇。三五好友們相約對酒賦詩、評花詠月，一同體會讀書與物外之趣，激盪彼此間性靈上的交會。¹⁷¹

¹⁶⁵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頁 88。

¹⁶⁶ 美·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35。

¹⁶⁷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頁 89。

¹⁶⁸ 張懋鎔，《書畫與文人風尚》（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8 月初版），頁 17。

¹⁶⁹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生活的規劃與開展〉（《藝術學報》，第 86 期，2010 年 4 月），頁 318。

¹⁷⁰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56-163。

¹⁷¹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生活的規劃與開展〉，頁 314-318。

在這樣的藝文社會環境下，學者們莫不傾心於書籍，購書、抄書、刻書、編書、藏書之風便如風起雲湧，而讀書風氣也隨之益發熾盛，各家學派紛紛著書立說，聚眾講學，並建立私家藏書，提供教學之用，故而明代藏書發達的地區，往往也是產生進士最多的地方。總結來說，古代私家藏書的利用主要體現在增長知識、修身養性、著書立說、校勘古籍，以及編製書目等方面。¹⁷²

明代藏書家的特點約略為關注藏書的版本，注重收藏善本，用心於藏書的鑑賞、校勘、分類、編目等工作，講究發揮藏書的閱讀與論學功能，投入成本大，購求量多。許多藏書家為了聚集更多種類的圖書，不惜投入大量資金，甚至典衣廢食、變賣家產。有的甚至將農耕收入，除進行繳稅之外，其他則全都用於購書，別無其他用途。¹⁷³得書以後，藏書家更不顧身家性命，也要保存珍藏，他們比常人更懂得典籍的價值。¹⁷⁴可見，正因為有這些對於圖書整理與保存做出極大貢獻的古代藏書家，後世才有機會擁有大批前人所留下的珍貴善本圖書。¹⁷⁵



二、明代文人的書齋生活

書齋，是明代文人閱讀書籍的重要場所。「齋」為齋戒、潔淨之意，書齋作為古代文人讀書、涵養內心的場所，大多位於山林花木景色宜人之處。¹⁷⁶明代蘇州文人計成（1582-1642）嘗曰：

¹⁷²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頁 131。

¹⁷³ 孫赫男、王璐，〈宋明以來河南私家藏書考述〉（《史學集刊》，2017 年第 2 期），頁 56。

¹⁷⁴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頁 347。

¹⁷⁵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頁 27。

¹⁷⁶ 呂允在，〈明人書齋的命名，格局與佈置〉，頁 263。

書房之基立於園林者，無拘內外，擇偏僻處，隨便通園，令遊人莫知有此。
內構齋、館、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¹⁷⁷

將書齋建立於僻靜幽雅的天然環境中，透過與大自然結合，使文人的身心無拘於內外，得以縱情於自由解放當中。¹⁷⁸他們選擇山居從事讀書生活，期盼在書香與山水美景的結合下，既能得山水之樂，亦有讀書之趣，讓生活樂趣倍增。¹⁷⁹除了隱居山中，也有文人將居室或園林建立於湖泊之濱，憑藉湖光山色的襯托，營造出悠遊生活及逃避喧囂的場域。然而，居室空間只是文人生活的一小部分，相對的，倘佯在碧波和林野之中，才是文人生活的主軸。¹⁸⁰

文人的書齋經常是位於隱密的寧靜環境，書齋中圖書滿架，隨取隨讀；且在讀書生活中特別強調安靜和幽雅，更是有利於讀書時的思索與感受。¹⁸¹讀書既為生活的樂趣之一，他們採取的讀書態度，自然也不同於時下為求入仕而苦讀應考的士子們，而是使讀書的自娛性取代了嚴肅性，成為文人閒居時的快樂源泉。¹⁸²

文人不僅在書籍上獲取學問、知識的知性學習，讀書之餘，更在生活文化當中調和山水、棋酒、花月等感性事物，或撫琴吟唱，或品茗焚香，或器物鑒賞，來塑造自身高雅清幽的氣息。¹⁸³為此，他們對於書齋的布局也非常講究。通常書齋內的擺設除了「文房四寶」一紙、筆、墨、硯之外，明代文人還會放置紙鎮、

¹⁷⁷ 明·計成，《園冶注釋》（《建築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6月初版），卷1，〈立基·書房基〉，頁67。

¹⁷⁸ 呂允在，〈明人書齋的命名，格局與佈置〉，頁263。

¹⁷⁹ 朱倩如，《明人的山居生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6月），頁153。

¹⁸⁰ 林利隆，《明人的舟遊生活—南方文人水上生活文化的開展》（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5年10月初版），頁213。

¹⁸¹ 江慶柏，〈圖書與明清蘇南社會〉，頁45。

¹⁸² 黃明理，〈「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4期，1990年6月），頁1036。

¹⁸³ 呂允在，〈明人書齋的命名，格局與佈置〉，頁270。

印章、筆架、古畫、鼎彝銅器等「文房清供」。除此之外，搭配焚香、烹茶、飲酒等高雅活動，也是不可或缺的要件。¹⁸⁴

為了營造出藏書與讀書的高雅生活情境，焚香成為明代文人表現其雅致生活品味的一種方式。例如明代蘇州藏書家文徵明，他除了是藏書家之外，還是一位著名的畫家，¹⁸⁵此外，他對於閱讀搭配焚香，也是相當地喜愛，他甚至撰寫〈焚香〉一詩，詩云：

銀葉熒熒宿火明，碧煙不動水沉清；綠屏竹榻澄懷地，細雨輕寒燕寢情；
妙境可能先鼻觀，俗緣都盡洗心兵；日長自展南華讀，轉覺逍遙道味生。

186

透過焚香，在裊裊爐煙與香氣環繞的氛圍裡，文徵明於燈下夜讀道家經典《莊子》一書，不但可沉澱心靈、洗淨塵俗煩囂，更能憑添幾許仙家氣息，使人感受到他展現跳脫擾攘塵世的澄明心境的一面。除了文徵明之外，很多明代文人在書齋讀書之時都喜歡伴隨焚香，代表專注閱讀和品味清雅的精神象徵。再如嘉興藏書家項元汴（1525-1590）也是如此，他覺得焚香可使人心清神悅、暢志舒懷、遠辟睡魔、薰心熱腸，又可祛邪辟穢。文人營造閱讀氣氛，透過焚香的雅趣，刻劃出兼具知性與感性的讀書情境，成為他們極欲追求的愜意與想像，增添日常的讀書氣氛。¹⁸⁷

同時，明代文人也將飲茶活動融入藏書與書齋生活當中，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日課清供。明代繼承了唐宋以來的飲茶文化，茶葉消費人口蓬勃發展，製茶方法也比宋代盛行的團茶法更加多元與進步，而泡茶的方法也是如此。點茶法是宋

¹⁸⁴ 連啟元，〈爐煙裊裊—明代文人書齋的焚香雅致〉（《藝術欣賞》，第6卷第1期，2010年2月），頁13。

¹⁸⁵ 黃敬程、陳冠至，〈明代長洲名士文徵明的藏書生活〉（《圖書與資訊學刊》，第83期，2013年11月），頁75。

¹⁸⁶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27，文徵明〈焚香〉，頁11上。

¹⁸⁷ 連啟元，〈爐煙裊裊—明代文人書齋的焚香雅致〉，頁14。

代泡茶的主要方法，將碾成粉狀的茶末與沸水混和，並用茶筴迴環攪拌，調成沫餒豐富的茶湯；而直到明代，才開始以沖泡為主要的方式。明代社會飲茶風氣十分盛行，文人將品茗視為文會活動的重要環節之一，「茶寮」也在此氛圍下隨之慢慢普遍。所謂「茶寮」，即是根據不同文人的風格與品味所構築出的茶事活動處所，同時也根據不同的格局，呈現的不同空間樣貌，有的設置於書齋旁，有的則設置於室內廳堂，也有設置於郊野山林之間的。¹⁸⁸明代文人基於對飲茶活動的喜愛，更是寫下了茶書、茶詩、詞文歌賦等文學創作，將自身對於茶事的雅好融入藝文生活當中。¹⁸⁹

三、明代文人養生與藏書生活的融合

明代文人的養生其實與身體健康並無直接關係，雖然按照字面解釋，「養」為保養、養護之義，「生」為生命、生長、生存之義，但是明代文人的養生，主要是為了保持生命的清醒與自覺，是追求一種精神滿足與自適，更是一種生活樂趣，屬於明代的休閒活動之一。

欲養生，「閑」是不可或缺的。明代文人論「閑」，主張人不可為外物縈心，不可讓聲色干擾。他們強調安頓身心不只可以養生，更是真正的「閑」，能使自己成為「閑人」，即為養生，簡單地說，「養生」就是閒適生活。¹⁹⁰而「休閒」二字，雖意謂休憩閒適，但明代文人卻不言「休閒」，而以「閒適」來詮釋。¹⁹¹明

¹⁸⁸ 張維晏，〈以唐寅《琴士圖》為例，側寫明代繪畫中文人雅興的再現〉（《議藝份子》，第 20 期，2013 年 3 月），頁 11。

¹⁸⁹ 廖寶秀，《茶的饗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年 5 月初版），頁 15。

¹⁹⁰ 蕭慧媛，〈「養生」—明代文人的休閒生活〉（《南亞學報》，第 31 期，2011 年 12 月），頁 511。

¹⁹¹ 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2002 年 6 月），頁 103。

代文人以觀書、彈琴、靜坐來調養身心，將養生作為一種生活態度，並且融入生活各種活動當中，除了是一種自我與天地共生的生命觀，更是傳統文人面對生命存在的一種態度。

每個時代的文人對於生命都存在著不同態度，明代文人往往是以「養德」、「養心」、「天人合一」等態度來經營生命。雖然，明代文人又將「養生」稱為「尊生」，但在明代文人的文集或書信裡，種種養生的方法及觀念卻未必相同，甚至會產生衝突。不過，明代文人仍以「養生在我不在天」的觀念，來顯現他們各自的「尊生」態度。因此，可以看出透過養生理論的提出與方法的琢磨，以及他們對於養生態度的堅持，便可展現出明代文人對於生命存在的體認。¹⁹²

此外，「習靜」的生活，更是休憩閒適內涵的要項，靜可以修養，可以居家、可以學藝、可以閒適，而沉冥寧靜的境界，更是達到內心的安適自得。要達到真正的內心修養，身形之外的放情詩酒、對於自己的檢點、約束，可以透過「習靜」來養性。故安於寂靜、習於幽靜，都是克己的修養工夫，更是明代文人讀書生活的一個時代面向。不問功名，唯有讀書，讀書對文人而言，在精神上確實具有修身養性的功效。藉由讀書時的心神專一，可以迴避一切繁雜俗事，還能怡養性情，因此，「習靜」之際的讀書方式，便與文人的生活形態相得益。¹⁹³文人讀書生活往往蘊含隱逸情懷、掩關習靜、閉門謝客、不問俗事、自少至老、遠離塵囂，在山林幽靜的書齋中，沉浸於大自然的懷抱，達到「定、靜、安、慮、得」的恬靜安逸境界。¹⁹⁴「隱逸」屬於士人對於自我定義與身份的認同，具社會批判的作用。明代士人多以山人自稱，其實質為抗衡政治專制，保持個體的獨立意識，使得隱居已不單單只是享受生活而已。¹⁹⁵當然，明代文人追求隱逸與習靜的特徵，也感

¹⁹² 蕭慧媛，〈「養生」—明代文人的休閒生活〉，頁 498-499。

¹⁹³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志趣的樹立〉，頁 316。

¹⁹⁴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生活的規劃與開展〉，頁 300。

¹⁹⁵ 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 1 版），頁 7。

染著藏書家，促使藏書家們在藏書生活當中，也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與內心的平靜，獲得自身心態的滿足。¹⁹⁶

傳統中國文人多以讀書為志業，將追求科舉功名、榮登金榜等功利性質作為讀書的主要目標。但是，從上述明代文人的藏書與讀書生活，可以看出部分文人有別於一般求取功名者，其讀書之目的在於單純的知識追求，或是將讀書視為生活的樂趣之一。明代文人視書齋為藏書之所，並將讀書、藏書、習靜、焚香等活動融入生活當中，使書齋擁有不同的生活面貌，¹⁹⁷進而形塑出一種時代的文人品味與生活特徵。



四、明代河南的藏書風氣

明代河南的藏書家在河南境內的藏書活動可分成兩種情況，其一為在河南鄉里隱居、授學、為官，直接在家中藏書；其二為宦遊四方，途中大肆蒐購訪求圖書，然後運回河南故居，在家鄉建藏書樓、書院等典藏之；或是直接在任官之地建造藏書樓、書院等典藏之。他們以各種方式將河南的藏書文化形塑並發揚，也有不少藏書家為了藏書不惜傾家蕩產，以竟其藏書志業者。¹⁹⁸

宋明以來，有許多長年待在河南的外省藏書家，甚至畢生都在河南境內寓居或定居。他們長期蓄書，並透過整理圖書及藏書活動，對促進當地士民重視書籍、重視知識和教育的意識，產生許多重大的影響。他們擁有數量豐厚的藏書成果，這對區域文化的保存與傳播，占有一定的重量。¹⁹⁹此外，藉由觀察私家藏書文化

¹⁹⁶ 劉叢，〈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意蘊探微—基於文化視角的分析〉，頁 112。

¹⁹⁷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生活的規劃與開展〉，頁 311-321。

¹⁹⁸ 孫赫男、王璐，〈宋明以來河南私家藏書考述〉，頁 54。

¹⁹⁹ 孫赫男、王璐，〈宋明以來河南私家藏書考述〉，頁 59。

的盛衰，不但可以瞭解明代的區域社會風尚和世態人情，對於當地的文化教育、圖書出版和科舉社會等領域，也都具有指標性的作用。²⁰⁰藏書文化不但融入了區域文化傳統之中，更為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建立特殊的風貌。

歷來河南私家藏書主要有兩個據點，唐代以前多集中於洛陽一帶，宋代以後則集中於開封一帶。尤其是在明代時期，河南開封成為了周藩封地，周藩的歷代藩王不乏熱衷於藏書，尤其是六世的朱睦㮮，更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²⁰¹由此可見，明代河南可謂充滿著良好的閱讀與藏書風氣，再加上獲得良好的經濟發展，以及前文所談到的科舉事業、書院的興起、圖書事業等社會因素，都深深鼓舞著明代河南地區藏書活動的發展。

對古代藏書家而言，他們藏書的目的經常是為了替後世留下前人的知識與經驗，發揮文化傳承的歷史作用。但是，隨著歷史的延伸，由於文獻的大幅增加與積累，保存文獻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艱難，不少文獻出現了遺失和散落的情況。而在此過程中，藏書家們往往付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對於真正懂得文獻、熱愛文獻的藏書學者來說，內容的豐富與否與內容的完整程度同樣重要，他們在收藏文獻的同時，也負擔著對文獻的保護、整理及校對工作，使得書籍能夠傳承優良的版本。²⁰²

可見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學者，而學者成功的關鍵，更在於書籍。沒有了書籍，便堵塞了文化傳播的渠道。同時，學術文化的交流與文獻的收藏，是相輔相成的，沒有交流便沒有進步，更不用說是文化的創新。只有在政治清明、學術文化旺盛的時代，藏書事業才能很好地進行和推廣，正是因為有了文獻的收藏，才使學術文化的風氣更加興盛。²⁰³

²⁰⁰ 劉長清，〈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研究〉，頁 160。

²⁰¹ 范鳳書，〈略論河南典藏在中國藏書史上的地位〉，頁 80。

²⁰²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頁 63。

²⁰³ 劉長清，〈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研究〉，頁 16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題旨為明代河南的私家藏書，透過仔細而縝密的檢索史料，以及分析相關研究之各種文獻，然後歸納結果，給予明代河南私家藏書歷史現象合理的解釋。因此，本文研究方法的重心在於廣泛地蒐集、整理、判讀與深入分析。為此，本研究採用一般的歷史研究法，藉由史料的蒐集加以舉證，再利用歸納法，最後推衍出合理的解釋與結論。



一、 文獻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於參考資料方面，以正史、明代文集、元明清筆記史料、明清地方志、明清書目與題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等，以及古代藏書學相關論著為主。透過對於現存明人文集、明清地方志、筆記小說、藏書專著等相關歷史文獻的檢索、蒐集與彙整，進而分析明代時期河南私人藏書的歷史軌跡，同時探討明代河南的地域與藏書家之間的關係。而在近人的研究成果上，舉凡有關明代的私人藏書活動、文人集團研究與文人生活文化等領域的研究文獻資料，本研究將加以蒐集閱讀，作為本研究的參考的依據。

明人文集是指集部中的別集類而言，文人個人畢生活動的紀錄，同時也是記載當代人物往來的生活史，是研究歷史人物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類型之一。在研究藏書家事蹟時，可以藉由藏書家或其友人的文集，來發掘他們的藏書事蹟、藏書心態與觀念，以及藏書活動、藏書生活等紀錄，所以對於本研究資料的蒐集將會有重要的幫助。

至於明清地方志，就掌握地方藏書家人數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史料，許多本地藏書家的藏書掌故，皆可在地方志中發掘出來。此外，一些傳記資料無從考查的藏書家，在方志上有時也能找到蛛絲馬跡，這對於藏書家身份的確認，起著很大的作用。

總之，在風俗文化和地域視野的敘述當中，地方志的作用頗為重要。地方志與正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更多方面地反映當地的社會生活，突出的記述地域性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這些正是地方志在社會生活史和文化史上的可貴之處，亦即從地方志上，可以探索到更多關於藏書家在藏書生活和文化上的資料。

另一方面，藏書史的研究，還必須多方面吸取如中國書史、目錄學史、古代板本、分類、科學技術，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與本文題旨相關的今人研究成果專書部份約略有：范鳳書的《中國私家藏書史》、²⁰⁴傅璇琮與謝灼華合著的《中國藏書通史》、²⁰⁵任繼愈的《中國藏書樓》、²⁰⁶楊立誠、金步瀛合著的《中國藏書文學家考略》、²⁰⁷徐凌志的《中國歷代藏書史》、²⁰⁸劉大軍等之《中國私家藏書》、²⁰⁹鄭偉章與李萬健合著之《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²¹⁰李玉安與陳傳藝合著的《中國藏書家辭典》、²¹¹梁戰與郭群一合著的《歷代藏書家辭典》、²¹²王河的《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²¹³李致忠的《中國古代藏書史》、²¹⁴周少川的《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²¹⁵徐良雄的《中國藏書文化研究》等皆是。

216

²⁰⁴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²⁰⁵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²⁰⁶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²⁰⁷ 楊立誠等，《中國藏書文學家考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

²⁰⁸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²⁰⁹ 劉大軍等，《中國私家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²¹⁰ 鄭偉章等，《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²¹¹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²¹²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²¹³ 王河，《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1版）。

²¹⁴ 李致忠，《中國古代藏書史》。

²¹⁵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

²¹⁶ 徐良雄，《中國藏書文化研究》。

除了以上所言之外，目前從事與本議題相關研究者，在期刊方面尚有：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²¹⁷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²¹⁸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²¹⁹邱曉輝〈古代藏書文化漫談〉、²²⁰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²²¹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²²²、張萍與吳效華合著的〈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上）〉、²²³李亞梅與李雪玲合著的〈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下）〉等。²²⁴學位論文方面，主要有：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²²⁵、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²²⁶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²²⁷呂昊青《明清河南書院研究》、²²⁸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²²⁹郭姿吟《明代書籍出版研究》、²³⁰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等。²³¹

二、文獻的分析、歸納整理

本研究需要接觸與蒐集大量的文獻史料，因此，必須計畫合適的文獻資料之整理與歸納方法。收錄史料的範圍將以藏書家為中心，因此，首先必須整理出河南地區藏書家的數量，接著掌握每位藏書家的生存年代、活動地區、藏書事蹟、

²¹⁷ 牛紅亮、張小玲，〈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

²¹⁸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

²¹⁹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

²²⁰ 邱曉輝，〈古代藏書文化漫談〉。

²²¹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

²²²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

²²³ 張萍、吳效華，〈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上）〉。

²²⁴ 李亞梅、李雪玲，〈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下）〉（《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2期）。

²²⁵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7月）。

²²⁶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

²²⁷ 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

²²⁸ 呂昊青，《明清河南書院研究》。

²²⁹ 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

²³⁰ 郭姿吟，《明代書籍出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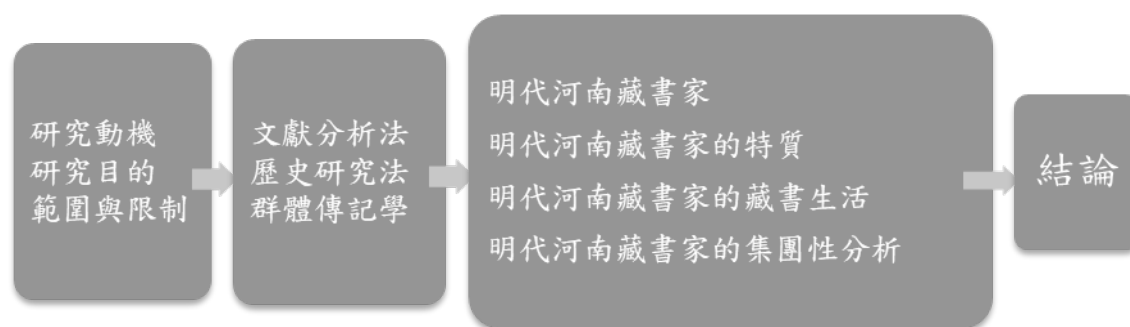
²³¹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

建立的藏書樓、藏書相關著作、交友情形等資料，依其內容和性質，予以分類、分析、整理與解釋。

此外，本文也將分析藏書家的時代橫向關聯，即是河南藏書家之間的社會關係，藉以形塑及論析他們的集團性與社群類型，例如將不同藏書家的生存年代、活動地區、藏書事蹟、相關著作和交友情形，經過適當的整理歸納後，從資料中梳理出藏書家彼此之間的關係，進而瞭解明代河南藏書風氣與藏書文化成形的真實相貌，最後得出適當的結論。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文基於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於釐清範圍限制後，接著利用適當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歷史分析法、群體傳記學等，然後從史料中蒐集明代河南藏書家的藏書事蹟、藏書家的藏書活動內涵與藏書生活特質、藏書家的集團性等資料，進行判讀與分析，最終歸納出結論，並針對各種歷史現象賦予合理解釋。（請參見圖三）



圖三 研究架構流程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透過史料的蒐集，作為歷史事實的佐證，再利用歸納法推衍出合理的結論。文獻分析法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和預測未來，對此，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的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所隱含的結構意義。本研究收錄的史料將以明代河南私家藏書為中心，首先須整理出河南地區的藏書家數量，並找出各藏書家的生存年代、活動地區、藏書事蹟、相關著作和交友情形等資料，並依內容和性質，予以分類、分析、整理與解釋。²³²

至於使用解釋資料的分析方法時，針對某一現象、事件或運動之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意義等加以闡明，或給予清楚的解釋，皆需藉由歸納與分析的幫助才能完成，若是沒有經過精細的分析，則將無法提供具有深度的解釋。



二、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乃以「歷史」作為研究的材料，而「歷史」是人類過去活動的記載，提供我們瞭解過去並作為未來之參考。因此，此法就是藉由「歷史」來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實之方法，一般使用的資料乃以文獻史料為主。藉由對史料的研究、蒐集及歸納，然後進行比較查考，找出事物的因果關係，最後加以分析詮釋。

²³³本文擬將蒐集到的相關資料，針對藏書家藏書活動的發展狀況，以及藏書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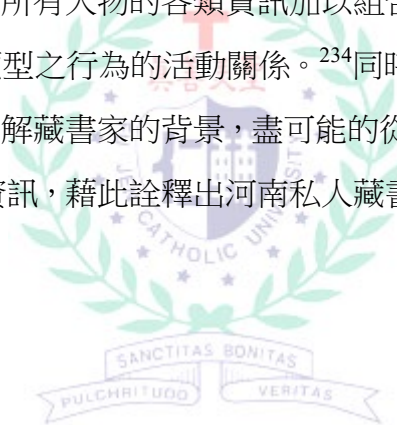
²³² 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39。

²³³ 謝寶媛，〈歷史研究法及其在圖書資訊學之應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62 期，1999 年 6 月），頁 37-99。

的掌握及其關係，進行比較分析，重建過去的真实樣貌，並探求本地藏書文化的影響力。

三、 群體傳記學

所謂群體傳記學，即是從史料中透過研究與分析歷史人物的生平紀錄，了解其共同的時代背景與特徵。此方法乃是先設定一個研究範疇，就此提出一組固定問題，如：生卒年、婚姻和家庭、經濟地位、居住地、教育程度、職業、仕宦履歷.....等。再將此研究中所有人物的各類資訊加以組合比對，檢測出人物彼此間的交互關聯性，與其他類型之行為的活動關係。²³⁴同時，必須進一步分析河南地區內的藏書分布，以及了解藏書家的背景，盡可能的從文獻史料找出所有與明代河南私人藏書家有關的資訊，藉此詮釋出河南私人藏書的社會文化，在最後將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成果。



²³⁴ Lawrence Stone, "Prosopography," in Felix Gilbert; Stephen Richards Graubard,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Norton, 1972), p.107.

第四章 明代河南的藏書家

明代刻書事業達，得書較易，私家藏書之盛遠紹宋、元。²³⁵由於明清時期私家藏書進入了鼎盛時期，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座大規模的私人藏書樓。可見在中國古代的藏書類型當中，私家藏書是發展最快、藏書規模最大、分佈地域也最廣的。尤其是明清時期，藏書家人數最多，藏書規模也最大，成為中國古代藏書的極盛時期。²³⁶

位處於中原的河南，書院教育一向發達，其藏書事業更是輝煌燦爛。²³⁷透過筆者仔細的爬梳史料後，發現明代河南地區具有藏書史蹟記載者，總共有 34 位。以下將明代 276 年的歷史，劃分成元末至天順、成化至正德、嘉靖至萬曆、天啓至清初等四個時段，再依照河南藏書家生卒年進行先後排序，並敘述每位藏書家的藏書史蹟。至於藏書家的生卒年先後順序，原則上先以生年先後為序；若生年無考者，再按卒年排序。此外，生卒年皆不可考者，則按史料所載約略的活動年代為主，從中訂定先後。最後，若其生卒年、科舉、活動年代皆不可考者，則置於最末。藉由表一，我們可以得知藏書家大多分布於河南的開封府，這個區域也是人潮最為密集之處。

表一 河南各府的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開封府	歸德府	河南府	汝寧府	南陽府	懷慶府	衛輝府	彰德府
藏書家數量	20	2	3	3	3	2	1	0

²³⁵ 張雷、李艷秋，〈明代私家藏書目錄考略〉（《書目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頁 29。

²³⁶ 余述淳，〈試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播的貢獻〉（《河南圖書館學刊》，第 24 卷第 1 期，2004 年 2 月），頁 78。

²³⁷ 趙國權、吳瑩，〈河南歷代書院藏書制度探微〉（《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31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101。

第一節 元末至天順時期（元末-1464）

1. 朱橚（1361-1425）

太祖第五子，洪武3年（1370）初封吳王，11年改周王，14年就藩開封府，以宋代故宮闕建為府邸。卒諡「定」，史稱周定王。²³⁸喜藏書，也好著述，不拘泥於經史，而關心民生實用。撰《救荒本草》，羅列縷述並圖繪野生植物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裨益朝廷荒政頗鉅。四庫館臣稱云：

臣等謹案《救荒本草》八卷，明周王朱橚撰。橚，明太祖第五子，洪武11年封，14年就藩開封。建文時，廢徙雲南；成祖復其爵。洪熙元年薨，諡曰：「定」。《明史》本傳稱橚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上之，即是書也。²³⁹

朱橚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又以國土夸曠，庶草蕃蕪，考核其可佐饑者，四百餘種，繪圖疏之名《救荒本草》。洪熙初年，諡定。據《天祿琳琅續編》中載記：「《春秋經傳集解》，明周橚賜籍，有《周府御書樓寶朱記》。」²⁴⁰可見朱橚好學，通詞賦，嘗作元宮詞。所編《救荒本草》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和研究價值，對往後的植物研究也有著重要的意義。²⁴¹藏書印有「周府御書樓寶」、「明善齋記」等。

²³⁸ 徐筱筱，《明代河南宗藩研究》（河南：鄧州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5月），頁20。

²³⁹ 明·朱橚，《救荒本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目錄，〈救荒本草目錄〉，頁2上-下。

²⁴⁰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9月初版），頁62。

²⁴¹ 徐筱筱，《明代河南宗藩研究》，頁20。

2. 李敏（1425-1491）

字公勉，開封府襄城縣人，景泰 5 年進士。成化 4 年（1468）建紫雲書院。《明史》記載李敏：「授御史。天順初，奉敕撫定貴州蠻。還，巡按畿內。以薊州餉道經海口，多覆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薊州，以避其險，軍民利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13 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沒塞下，掩殺守墩軍，敏伏壯士突禽之。修治垣塹，敵不敢犯。15 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弘治 4 年（1491），得疾乞休，帝為遣醫視療。已復力請，乃以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生平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孔廟無雅樂，以敏奏，得頒給如制云。」²⁴²另外，《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也載記李敏自稱：「先少保公積書至七萬九千餘卷。」²⁴³可見李敏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藏書極為豐富，做為後代教育之用。



3. 吳伯通（1441-1500）

字原明，四川廣安縣人。在《杭州府志》中所載：「天順甲申（8 年，1464）進士，弘治 3 年（1490）擢浙江提學副使。」²⁴⁴「歷官按察使，學務躬行，以道自任督學河南、浙江振起士類倦，倦以治心養性為訓，居家建耳棠書院，教授百餘人。手錄白鹿洞規示之。著《達意稿》、《續近思錄》，其學根極于性命之理，而發揮于王道，學者稱石谷先生。」²⁴⁵此外，吳伯通於「成化乙未（11 年，1475）

²⁴²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1 月臺 6 版），卷 185，〈列傳·李敏〉，頁 1 下-3 上。

²⁴³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 171。

²⁴⁴ 明·陳善，《杭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52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年初版，明萬曆 7 年（1579）刊本），卷 62，〈人物·吳伯通〉，頁 57 上。

²⁴⁵ 明·虞懷忠，《四川總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99-20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1573-1620）刻本影印），卷 10，〈人物·吳伯通〉，頁 44 上。

陞任河南按察使司僉事。……建四書院於境內（河南），開封大梁書院、輝縣百泉書院、洛陽伊洛書院、汝寧汝南書院。後酌白鹿洞規自為條件廿一，使有持循，而大梁書院密邇臬署，則遂居之。……所著有《達意稿》三十卷、《石谷韻語》十二卷、《策問答》七卷、《順慶府志》十五卷。」²⁴⁶吳伯通一生篤信程朱理學，躬行實踐，興辦教育，蒐藏典籍，在中國古代書院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4. 王鴻儒（1459-1519）

鴻儒，字懋學，南陽府南陽縣人。成化 23 年（1487）進士。「官至南京戶部主事，家富藏書。」²⁴⁷「少工書，家貧為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為諸生，遂舉鄉試第一。」²⁴⁸另外，《列朝詩集小傳》亦述其：「少穎悟，讀書過目不忘。為府史佐書，郡守段容思見而奇之，使為弟子員，教以經術，蔚為大儒。……相臺崔銑稱其闡朗光大，言無支浮，服儒誦書，弗因官輟。邊武得權，政門旁雜，鼠憂飲泣，如困葛藟，嚴卻介之義，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咸推為大雅君子云。」²⁴⁹所著有《凝齋集》、《凝齋筆語》行世。²⁵⁰

5. 朱見沛（1462-1505）

明英宗朱祁鎮第九子，敕封徽藩。成化 17 年（1481）就藩禹州，卒諡莊。明代徽藩刻書頗豐，藏書方面，《千頃堂書目》著錄有《徽府書目》一卷。²⁵¹據

²⁴⁶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四川：廣安市地方志辦公室刊印，2010年5月第1版，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咸豐9年（1859）刊本），卷7，〈藝文·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叙·王質〉，頁12上-13上。

²⁴⁷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頁127。

²⁴⁸ 清·張廷玉，《明史》，卷185，〈列傳·王鴻儒〉，頁14下-15上。

²⁴⁹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9，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年10月初版），卷81，〈丙集·王尚書鴻儒〉，頁299。

²⁵⁰ 清·潘守廉，《南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年臺一版，據清光緒30年（1904）刊本影印），卷7，〈祠祀·王鴻儒〉，頁78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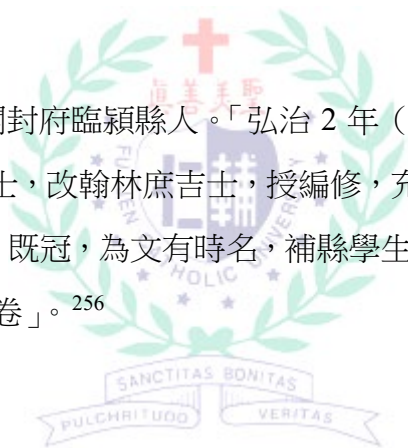
²⁵¹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657。

《明史》所述：「徽莊王見沛，英宗第九子。成化 2 年封。17 年就藩禹州。承奉司自置吏，左布政使徐恪革之，見沛以聞。憲宗書諭王：『置吏，非制也，恪無罪。』正德元年薨。子簡王祐檣嗣，嘉靖四年薨。子恭王厚燾嗣，29 年薨。子浦城王載堦嗣。」²⁵²《禹縣志》亦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引》：『《讀書敏求記》、《蟋蟀經》二卷，予昔藏徽藩芸窗道人五綵繪畫本，為季滄葦豪奪去。』按葉德輝《書林清話》徽藩所刻書有《錦繡萬花谷》前後續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列子《亢倉子》老子諸本傳於世，亦有惠士林之一端，不容湮沒者，故附記之。」

253

6. 賈詠（1464-1547）

字鳴和，號南塢，開封府臨潁縣人。「弘治 2 年（1489）河南鄉試第一，弘治丙辰（9 年，1496）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侍講。」²⁵⁴著有《南塢集》。²⁵⁵「少穎敏強記，既冠，為文有時名，補縣學生。」《千頃堂書目》中載：「《臨潁賈氏藏書目》二卷」。²⁵⁶



²⁵² 清·張廷玉，《明史》，卷 119，〈列傳·徽莊王見沛〉，頁 13 下。

²⁵³ 王琴林，《禹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 年臺一版，據民國 20 年（1931）刊本影印），卷 9，〈經籍志〉，頁 63。

²⁵⁴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明人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12，〈內閣行實·賈詠〉，頁 69 上-下。

²⁵⁵ 明·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16，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8，頁 2 上。

²⁵⁶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5 月第 1 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0，〈簿錄類〉，頁 69 上。

第二節 成化至正德時期（1465-1521）

7. 戴冠（不詳）

戴冠，字仲鵠，歸德府信陽縣人。「正德戊辰（3年，1508）進士，授戶部主事，官至提學副使。」²⁵⁷《河南通志·續志》載戴冠：「平生喜聚書，與王守仁（1472-1529）、李夢陽（1472-1529）及同里何景明（1483-1521）、馬錄、樊鵬為詩文氣節之交，所著有《邃谷集》十二卷。」²⁵⁸

戴冠是一位非常有正義感的官員。根據《明詩紀事》中載述：

見寵倖日多，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略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擊勇士，役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為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宜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壁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為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為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使，以清介聞。²⁵⁹

因為戴冠看到太監長期被受寵倖，導致耗費大量物資拿去做俸祿，則上疏極諫。武宗閱後大怒，貶為廣東烏石驛丞。嘉靖初年，重新起用，歷任潛山縣知縣，歷陞戶部員外郎、福建延平府知府、直隸蘇州府知府、山東提學副使，以清廉聞名

²⁵⁷ 清·陳田，《明詩紀事》（《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11，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年10月初版），卷 10，〈戊籤〉，頁 143。

²⁵⁸ 清·孫灝，《河南通志續通志》（《中國省志彙編》14，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初版，清雍正 13 年（1735）刊本影印），卷 65，〈文苑·戴冠〉，頁 34 上-下。

²⁵⁹ 清·張廷玉，《明史》，卷 189，〈列傳·戴冠〉，頁 8 上-9 下。

於時。可見，戴冠個性「清修自勵，簡靜以居，素位而行，累無怨尤。」而他在歷山東提學副使時，「師事大復何先生（何景明），有時名。其詩聲調宏邁，語意勁峭，慷慨激烈，有古國士風。」²⁶⁰

8. 朱睦㮮（1520-1587）

字灌甫，號西亭、東陂居士，開封府人。周藩定王朱橚四世孫，封鎮國中尉，萬曆 5 年（1577）舉為周藩宗正。如《明史》中所載記：「睦㮮幼端穎，郡人李夢陽奇之。」²⁶¹，也於《明詩紀事》中所述：「購得藏書家江都葛澗、章邱李開先（1502-1568）兩家散出之書，建『萬卷堂』五楹以藏之，有 42,560 卷。仿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²⁶²據《祥符縣志》載記：

朱睦㮮，字灌甫。周藩鎮平恭靖王四世孫，父安河，封奉國將軍，母張氏淑人。㮮生而端穎，李獻吉一見即奇之曰：「公家飛兔也。十歲，徧謁名儒，受經學。甫弱冠，六經皆通大義，益購秦漢以來諸家經解，日夜讀之，諸所發，曰：多得之於世儒箋註之外充。」精於《易》、《春秋》，博通古今故實，以及經世之務，考究皆有成畫，撫院監司至於諸郡邑長吏，咸就㮮問政，應之若響，莫不畢效。……即第建《萬卷堂》，購書三萬餘卷，日誦讀其中，至老不倦。²⁶³

²⁶⁰ 清·孫奇逢，《中州人物考》（《明人傳記叢刊》綜錄類 37，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8，頁 35。

²⁶¹ 清·張廷玉，《明史》，卷 116，〈列傳·朱安瀾〉，頁 13 上-14 上。

²⁶² 清·陳田，《明詩紀事》（《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10，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2 下，〈甲籤·朱睦㮮〉，頁 479。

²⁶³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朱睦㮮〉，頁 60 上-61 下。

學者稱朱睦㮮為「西亭先生」。他「就宅西建『萬卷堂』以儲書，其子勤美編有《萬卷堂書目》。」²⁶⁴此外，朱睦㮮與「沈約、吳棫韻，舉正誤繆，撰《韻譜》五卷。其詩文有《陂上集》二十卷，文尤典雅可誦。」²⁶⁵

另外，《明詩紀事》載朱睦㮮云：「家故饒貲財，僮奴數百人，皆逐羸夷老屑夢，執業自給，逐十一之利，其家益大起。訪購圖籍，請接賓客，傾身遊貴顯間；通懷好士，內行修潔，築室東陂之上，延招學徒，與分研席，用是名聲籍甚。萬曆初，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十餘年，國中大製作，皆出其手。修《河南通志》，撰《中州人物誌》。」²⁶⁶

9. 李濂（1488-1566）

字川父，開封府祥符縣人，孫子李孺。《皇明三元考》載李濂云：「治書，幼穎敏好讀書，九歲攻古文，人稱大梁才子。」²⁶⁷正德 8 年（1513）省試第一，隔年中進士，知沔陽州，旋同知寧波府，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列朝詩集小傳》亦載：「嘉靖 35 年（1556），免歸，年紀三十有八；歸田後四十餘年乃卒。……濂少負俊才，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甜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為人。」²⁶⁸，「川父博學多聞，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志》、《汴京遺蹟志》、《醫史》諸傳凡若干卷。」²⁶⁹《明史》亦載其：「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示李夢陽，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雒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里居四十餘年，著述甚富。」

²⁶⁴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頁 68。

²⁶⁵ 清·陳田，《明詩紀事》，《明人傳記叢刊》12，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2 下，〈甲籤·朱睦㮮〉，頁 479。

²⁶⁶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 2 下，〈甲籤·朱睦㮮〉，頁 479。

²⁶⁷ 明·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卷 9，頁 10 下。

²⁶⁸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 81，〈李僉事濂〉，頁 365。

²⁶⁹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明人傳記叢刊》綜錄類 36，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87，《河南開封府·李濂》，頁 22 下。

²⁷⁰李濂「著述甚富」、「博學多問」，可以得知他所收藏的書籍定不亞於一般藏書家。

10. 楊旦（不詳）

字啓東，號中泉，開封府鄆城縣人，楊琳之子。正德 16 年（1521）進士。在《鄆城縣志》中記載：「少屬文，有奇氣，諸老生皆下之。領庚午（正德 5 年，1510）鄉薦，登辛巳（正德 16 年，1521）進士第，壬午（嘉靖元年，1522）授吉安府推官，逾二年，擢刑部主事，又調戶部。嘉靖 10 年（1531）轉兵部，四任咸有異政能聲。無何，公署災，延燒什器儲侍，謫河間府推官。居一年，轉河間府同知；不逾年，擢工部郎中。明年，陞陝西西安府知府，未之任而卒。旦孝友聞於閭里，且素振冰蘖聲，由布衣歷七轉至二千石。既死後，家無長物，惟藏書千餘卷；子孫衣食僅足，亦足以驗其所守矣。」²⁷¹楊旦個性清廉，友愛身旁的朋友，同時更是一位有能力的朝廷官員。

11. 左國璣（1522-1566）

字舜齊，開封府尉氏縣人。「父尚，鎮平王府廣武郡君，遂家祥符。七歲能詩，讀書日數千言，字法擬顏魯。公弱冠，從李獻吉（李夢陽，1472-1529）就學於京師。正德 11 年（1516）舉於鄉，才名籍甚，四方好古之士，皆千里來從游。國璣至都下，公卿爭迎致之，得其隻字片辭，輒為寶之。累試南宮弗利，當路者欲薦入官，辭弗就，歸老汴上。博極群書，肆力著作，所著有《賦頌碑誄序》、《記諸體詩》，各累萬言行於世，人稱之曰：『中川先生』」。²⁷²

²⁷⁰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6，〈列傳·李濂〉，頁 23 下。

²⁷¹ 明·楊邦梁，《鄆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59，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第一版，明嘉靖刻本），卷 7，〈宦蹟〉，頁 87 上。

²⁷²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左國璣〉，頁 52 上-下。

12. 劉黃裳（1530-1595）

字玄子，汝寧府光州縣人，萬曆 14 年（1586）進士。據《列朝詩集小傳》載記：「玄子七歲能操觚，摸右軍書。十歲，寓長安，賦京都諸篇。父之友陳約之、唐應德皆摩其頂，以為奇童子。」「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倭犯朝鮮，有興復屬國之師，以知兵見推擇，贊畫宋司馬軍事，遷郎中。兵罷，請告歸里而卒。」晚年，「里居無聊，賦詩縱酒。一夕飲友人家，丙夜中寒而卒。玄子博學多聞，其為詩才氣橫溢，苦無裁製，亦重慶之餘波也。」²⁷³據《大泌山房集》載劉黃裳「藏書故充棟，猶募所未有，泐石蠹簡，貴於百朋萬鎰。」²⁷⁴著有「《藏徵館集》行於世。」²⁷⁵

13. 李蓁（1531-1608）

字于田，南陽府內鄉縣人。《河南通志》記云：「嘉靖 32 年（1553）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罷歸。蓁好學，家多藏書，注《宋藝圃》、《明藝圃》諸書，援據該洽，識者珍之。」²⁷⁶此外，《列朝詩集小傳》亦載：「于田多藏好學，與晦伯相埒，著《于壘注筆》諸書，援據該博。其持論多訾毀道學，譏評氣節，而詆謫新建太過，言多失實，論篤者弗與也。」²⁷⁷

²⁷³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 81，〈劉武庫黃裳〉，頁 655。

²⁷⁴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50-153，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39 年（1611）刻本（卷 10 卷 81 卷 93 配鈔本）影印），卷 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 20 下。

²⁷⁵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 81，〈劉武庫黃裳〉，頁 655。

²⁷⁶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5，〈文苑·李蓁〉，頁 31 上。

²⁷⁷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 81，〈李副使蓁〉，頁 654。

14. 張九一（1533-1598）

字助甫，號周田，汝寧府新蔡縣人。《新蔡縣志》載：「少孤，能樹立，博聞強識。為諸生有聲，太倉王世貞（1526-1590）誌其墓，稱之篤行君子。九一穎悟絕倫，為古文詞博雅雄麗。赴省試，五策幾二萬言，主司大賞歎，置第三。嘉靖癸丑（32年，1553）聯捷進士，時年甫二十，除知黃梅縣，窮治奸猾，摘服如神，遇事衡決，不移時而罷；暇則讀書賦詩，客至，觴詠竟日。……會勘施州軍功，九一任楚事，獨核實持平，議事竣，遷右叅議，而被勘者與前不任勘者，復以蜚語中之，遂罷歸。築『綠波樓』，積書萬卷，諷誦其中。屏居，非其人不可見。」²⁷⁸著有《綠波樓集》、《朔方奏議》行世。



第三節 嘉靖至萬曆時期（1522-1620）

15. 王璇（-1526）

號平山，衛輝府新鄉縣人。成化 17 年（1481 年）進士。《郟縣志》載：「宏治辛酉（14 年，1501），平山居士聚書若干卷。歸，自宜川相郟城隅得隙地焉，以創書院，聚二三子教之。乃鑿井，爰得舊井，不假累砌，畚鍤所至，寒泉甘冽，人異之，居士歎曰：『古今之相符者，庸獨井耶！自井不田，維民不養，維士不教，於今者亦久矣。』」²⁷⁹以及，「先生既卒之二十四年，為嘉靖丙戌（5 年，1526），夫人聶氏以正月七日庚寅卒於家，其第四子尚綱（王尚綱，1478-1531，郟縣人）方起為陝西布政司參政，聞喪於官，即晝夜奔行歸郟海。時以子壻之喪吞華州，

²⁷⁸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 年臺一版，據民國 22 年（1933）重刊清乾隆 60 年（1795）修纂本影印），卷 7，〈人物·張九一〉，頁 12 下-14 上。

²⁷⁹ 清·姜篋，《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 年臺一版，據民國 21 年（1932）石印本影印），卷 11，〈藝文·符井書院記-王璇〉，頁 25 上。

見其匍匐哭踊，拒饘粥，哀毀過也。與監察御史東君希宋勸之，即別已去，顧其痛深道遠，心恆以為憂焉。今年九月既望，子尚忠等將奉聶夫人之柩，合窆於先生。尚綱以書洎按察副使王君邃伯狀來，謂海與交獨厚，宜撰碑銘表諸墓石。往者尚綱與海同舉宏治壬戌（15年，1502）進士，先生以其冬十月至京師，海嘗親侍杖履，覩其為人恭厚淵懿，言章而理，道穹而遜，以為非己所恆見，由是知吾尚綱所以亮德跨譽為也，名人者，不獨其天資之厚也。明年七月十六日辛巳（16年，1503），先生卒於家。」²⁸⁰

16. 李繼業（不詳）

字伯耀，號尚雲，開封府襄城縣人。在《襄城縣志》中載記：「嘉靖乙卯（34年，1555），公登賢書，……迫于親命」，²⁸¹被迫棄儒從軍。《中州道學編》載：「其曾叔祖則大司農恭靖公敏（李敏，1425-1491）也。先是，恭靖公嘗建學舍于邑西南山中，置學田、購書，集遠近多士講學。成化15年（1479），上其事于朝，詔賜御額曰：「紫雲書院」。公承先志，益加修葺，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五子之書訓迪後進，期于躬行實踐，故學者皆稱為尚雲先生云。」²⁸²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于世。

此外，《襄城縣志》亦載：「公自幼器宇不凡，入小學之時，即勵志勤苦，弱冠，餼于庠，讀薛文清《讀書錄》，然有感，遂奮志為聖賢之學，有所親規之曰：『掇巍科而繩祖武，是子今日所急者，何以此為？』公笑而不答。公所立為學□規甚密，人初疑以為苦難，已而見公視聽言動必□乎禮，而溫厚冲穆之氣，見于

²⁸⁰ 清·姜夔，《郟縣志》，卷11，〈藝文·平山先生墓碑銘-康海〉，頁27上-下。

²⁸¹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49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不注初版年，1976年，據乾隆11年（1746）刊本影印），卷13，〈藝文·尚雲李先生墓表〉，頁101下。

²⁸²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21，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初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30年（1691）嵩陽書院刻補修本影印），卷2，〈李尚雲繼業〉，頁39上。

眉宇，從容順適若有□樂，則未嘗不心醉歎服以為不可及，而從遊者日□衆矣。……公天性孝友，親沒後，十餘年不御酒肉，待弟有恩義。……蓋嘗聞天之報，施善人不于其身，則于其子孫。」²⁸³

17. 王惟儉（1567-?）

字損仲，開封府祥符縣人。萬曆 23 年（1595）進士。「授濰縣知縣，遷兵部職方主事。」²⁸⁴此外，《列朝詩集小傳》亦載：「天啓初，三為大少卿，以僉都御史出撫山東；入工部右侍郎。罷歸卒。」²⁸⁵《增訂廣輿記》所云：「家藏多古書、畫器物，人推其博雅。」²⁸⁶

另外，《列朝詩集小傳》載其「敏而好學，通籍六載，御批罷官。終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以其間盡讀經史百家之書，修辭汲古，於斯世泊如也。好古書畫器物，不惜典衣舉息家藏饗饗周鼎、夔龍夏彝，皆一時名寶。」²⁸⁷《增訂廣輿記》又記其「仕至工部侍郎，萬曆時，御批罷官。終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故得盡讀經史百家之書，議論俱有根據，家藏多古書畫器物，人推其博雅。」²⁸⁸時人至稱：「好古博物者，符祥王損仲（王惟儉）、雲間董元宰為最。」²⁸⁹《明史》亦載云：「萬曆、天啟間，世所稱博物君子，惟儉與蓋其昌並，而嘉興李日華（1565-1635）亞之。」²⁹⁰可見，王惟儉在當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好古博物」之文人，為世人所稱的博雅君子。清人劉青藜（1839-1900）嘗以詩讚其藏書云：

²⁸³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 13，〈藝文·肖雲李先生墓表〉，頁 101 上-102 下。

²⁸⁴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8，〈列傳·王惟儉〉，頁 14 上。

²⁸⁵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11，卷 81，〈王侍郎惟儉〉，頁 679。

²⁸⁶ 清·陸應陽、蔡方炳，《增訂廣輿記》，清康熙刻本，卷 6，〈河南〉，頁 21 上。

²⁸⁷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11，卷 81，〈王侍郎惟儉〉，頁 679。

²⁸⁸ 清·陸應陽、蔡方炳，《增訂廣輿記》，卷 6，〈河南〉，頁 21 上。

²⁸⁹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 81，〈王侍郎惟儉〉，頁 679。

²⁹⁰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8，〈列傳·王惟儉〉，頁 14 下。

史稿東都載幾車，寶觥雲散畫樓墟。中郎剩有文姬在，欲效曹公問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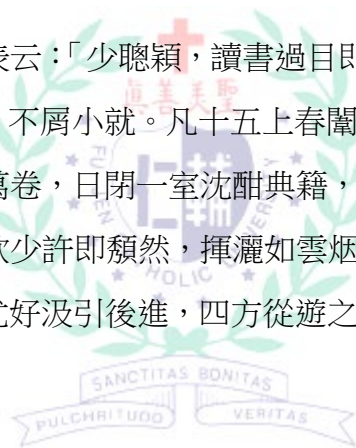
291

詩末註云：「王損中增刪修《宋史》，「寶觥」，其藏書樓也。」²⁹²

18. 張民表（1570-1642）

字法幢，字武仲，開封府中牟縣人。本名林宗，因避諱改名民表，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蕊淵道人，²⁹³萬曆 19 年（1591）舉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張孟男（1537-1606）之仲子也。《虞初續志》載其：「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²⁹⁴，「著有《原圃塞菴詩集》」。²⁹⁵

《中牟縣志》載張民表云：「少聰穎，讀書過目即成誦，年 22（萬曆 22 年，1594）舉於鄉，久困公車，不屑小就。凡十五上春闈，年七十餘，猶挾策走長安道，志不少衰。家積書數萬卷，日閉一室沈酣典籍，窮披博覽；為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所與交，皆海內賢豪長者，尤好汲引後進，四方從遊之士，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²⁹⁶



²⁹¹ 清·阿思哈、嵩貴，《續河南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 32 年（1767）刻本），卷 75，〈藝文志·詩·聞張穉菴先生話大梁遺事〉，頁 20 上-下。

²⁹² 清·阿思哈、嵩貴，《續河南通志》，卷 75，〈藝文志·詩·聞張穉菴先生話大梁遺事〉，頁 20 下。

²⁹³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頁 187。

²⁹⁴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7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據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藏清咸豐元年（1851）小嫻嬛山館刻本影印），卷 4，〈張林宗先生傳〉，頁 11 上。

²⁹⁵ 清·朱竹垞、姚柳依，《靜志居詩話》（《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8，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10，〈李濂〉，頁 29 下。

²⁹⁶ 蕭德馨，《中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9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第 1 版，據民國 25 年（1936）石印本影印），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61 下。

19. 耿華國（1578-1666）

開封府襄城縣人。家藏典籍甚富，為「耿震國之兄，合先世所積三萬五百七十卷。」²⁹⁷著有《蒙泉雜言》、《論語正意》、《周易解》。²⁹⁸

第四節 天啟至清初時期（1620-清初）

20. 賈壯（1607-1663）

字弱侯，號止庵，開封府襄城縣人。順治乙酉（2年，1645）舉于鄉，丙戌（順治3年，1646）進士。……讀書嗜古，尤工舉子業，手錄徑數盡，許久之，掩卷暗誦，滾滾竟帙不遺一字。…公性簡淡，平生無他嗜好，顧獨有書癖。其任懷寧也，購書數千卷，公餘即事披覽。尤好吟咏，宦遊所至，輒與騷人□客共相唱和。……公貌狀□悟，嚴重有威儀，凜然不可犯。及□蜀，友朋從容□矣，備極欵曲，又何其藹如也。初與余訂交，日相得甚歡，視諸同年生為尤厚。其後遊宦四方，歲時遺問不絕。余嘗謂以公之才品聲望，使得內秉鈞軸，韓、富儔也，而竟齎志以沒，未大其用。惜哉！」²⁹⁹

²⁹⁷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183。

²⁹⁸ 明·蕭元吉，《許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1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一版，道光18年（1838）刻本），卷8，〈人物·耿震國〉，頁67上-下。

²⁹⁹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12，〈賈僉憲公傳〉，頁34上-36上。

21. 周亮工（1612-1672）

字元亮，號減齋，又字櫟園，開封府祥符籍，江西撫州金谿縣人。明末清初的文人，學者稱櫟園先生。崇禎 13 年（1640）進士，官御史。³⁰⁰「精鑒賞，家有『賴古堂』，藏奔印篆、書畫極富。」³⁰¹著有《同書》、《鹽書》、《相編》、《讀畫錄》、《詩人傳》、《印人傳》、《字觸》、《書影》、《閩小記》、《賴古堂詩文集》等書。³⁰²

周氏子孫清人周鑾嘗述乃祖周亮工的「賴古堂」藏書曰：「藏書凡百種，皆搜輯海內鉅公名儒之著論可傳而未傳者。……鑾家從來宦籍無常，藏書舊板屢經遷徙，歲久漶漫，今且遺落殆盡。」³⁰³藏書印有「河南周亮工」、「賴古堂」等。



22. 呂維祺（不詳）

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新安縣人。「萬曆 41 年（1613）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書室曰明德堂，有《明德堂文集》。」³⁰⁴藏書印有「明德堂之書畫印章」。

23. 耿介（1623-1693）

河南府登封縣人，明末清初之文人。順治 9 年（1652）壬辰科進士，改翰林院檢討。「耿先生興復嵩陽書院，與都人士講學。」³⁰⁵對河南文化教育有較大貢獻，此外，著有《中州道學編》。

³⁰⁰ 清·李瑤，《明季北略》（《明人傳記叢刊》105，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年10月初版），卷22，頁659。

³⁰¹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頁258。

³⁰²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頁125。

³⁰³ 清·周亮工，《賴古堂集》（《清人別集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賴古堂集序〉，頁1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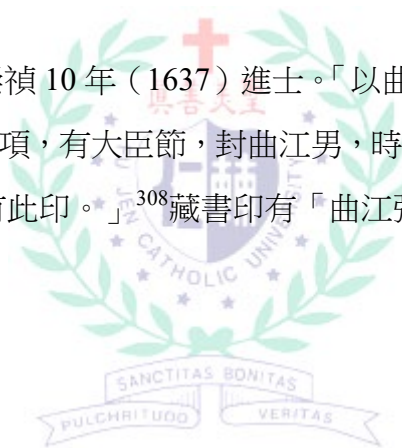
³⁰⁴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1年6月初版），頁33。

24. 耿震國 (?-1644)

字麗陽，開封府襄城縣人，崇禎末年殉難。「嘗購書於金陵，與先世書合三萬餘卷，建『富春軒』以貯之。」³⁰⁶《許州志》載：「崇禎時，舉賢良方正，不就。幼隨兄華國（耿華國，1578-1666）師事高忠憲攀龍（高攀龍，1562-1626），學有稟承。流寇入中州，震國與華國首貨巨萬家貲，募練義勇抗拒，邑人賴之；又設策拯救餓夫，全活不下千餘戶。精詩，古文瑰麗高邁，無講學家迂腐氣。」³⁰⁷著有《山樵暇語》、《富春軒文集》。

25. 張宏志（不詳）

開封府項城縣人，崇禎 10 年（1637）進士。「以曲江之名者，因張九齡裔孫之意，九齡唐曲江人，為項，有大臣節，封曲江男，時稱曲江公，有《曲江集》。宏志應為九齡後裔，致有此印。」³⁰⁸藏書印有「曲江張氏」。



26. 喬騰鳳（不詳）

字遙集，懷慶府孟縣人，崇禎 15 年（1642）舉人。「明亡，隱居不仕，杜門著述，積圖書數千卷，靡不探厥精奧，歸於實用。所為詩文博大奧衍，不名一家，世傳誦之，其書今存未梓。」³⁰⁹「所著《耕樂堂詩文集》若干卷。」³¹⁰

³⁰⁵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 2，〈中州道學編序〉，頁 2 上。

³⁰⁶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頁 347。

³⁰⁷ 明·蕭元吉，《許州志》，卷 8，〈人物·耿震國〉，頁 67 上-下。

³⁰⁸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 20。

³⁰⁹ 阮藩濟，《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4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第 1 版，據民國 21 年（1932）刊本影印），卷 10，〈藝文·耕樂堂集〉，頁 15 上。

³¹⁰ 阮藩濟，《孟縣志》，卷 7，〈人物下·喬騰鳳〉，頁 15 上。

27. 李和霖（不詳）

字霖六，歸德府歸德縣人。「少孤，母張氏，午夜課讀。中順治 8 年（1651）舉人，歸德府教授。以卓異，擢國子監博士，遷刑部主事，降兵馬司指揮，致仕歸。性喜儲書，建藏書樓，置經傳子史及漢唐宋諸集，後進、貧無書者賴之。」

311

28. 張鑾（不詳）

字朝儀，號淮濱，汝寧府真陽縣人。《真陽縣志》載述張鑾云：「嘉靖 5 年（1526）貢，任山東兗州府學訓導，陞青城縣學教諭、陝西保安王府教授。性篤實，勤學好問，凡所歷任，惟務聚書，經史百氏家所未有，親自手錄，雖醫卜、律曆、陰陽、兵畧諸書，罔不涉躡，而精於釋老。與諸生講說經學，亶亶不倦，所在以儒術著聞，四方從游者甚衆。陞保安王府教授，乃曰：『藩府多不能行其志，仕亦何為？』即退，而歸於淮北之敝廬，士林咸器重之。」³¹²

第五節 生卒年無考者

本節收錄部分凡有記載藏書事蹟的明代河南藏書家，但無法考證其生卒年或活動時代者，在此存於文末，冀能完整地呈顯明代河南藏書文化的原始面貌。以下按特定方式排序，若藏書家之生卒年皆不詳，則依其科舉年代（以進士優先，

³¹¹ 清·康基淵，《嵩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8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第 1 版，據清乾隆 32 年（1767）刊本影印），卷 28，〈列傳藝林〉，頁 4 下。

³¹² 明·何麟，《真陽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60，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第一版，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 5，〈選舉志·貢士〉，頁 3 上。

而後舉人、監生、貢生、生員、薦舉等)由遠至近排列；若生卒年、科舉年代皆無，則依其人活動之年代，或其親友、同時代人之生存年代約略加以判定，由遠至近排列；其生卒年、活動年代皆無法判定者，則列於最後。

29. 朱勤羹（不詳）

號竹居，朱睦㮮之子，開封府人。封輔國中尉。據《明詩紀事》載述朱睦㮮云：「其子勤羹，號竹居，亦嗜書，收藏益富。」³¹³明朝宗室中，周藩朱睦㮮不但購入大量書籍，並依不同顏色的牙籤作為標籤分類，好做識別。此外，朱睦㮮之子朱勤羹，也同樣有藏書嗜好。

30. 李呈秀（不詳）

字宣璧，開封府西華縣人。「居西華時，藏書至富。晚年丁明季之亂，所積悉為寇盜所燬，乃避居召陵，流離顛沛之際，益留意於古今秘籍，雖販夫野老，苟有書，期在必得，得則諷誦忘晝夜。遇忠孝節義之事，足以厲世振俗者，與人言之切切，人顧不相應，則憤而閉戶手錄，錄一事畢，撫卷慷慨疾呼而泣焉。」

314

³¹³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2下，〈甲籤·朱睦㮮〉，頁480。

³¹⁴ 周世臣，《鄆城縣記》（《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年第1版，據民國23年（1934）刊本），卷24，〈耆舊篇七·李呈秀〉，頁7上-下。

31. 朱安泐（不詳）

字思甫，南陽府鎮平縣人。周定王櫛玄孫。封「奉國將軍。篤行好古，於學無所不窺，邸第建『青藜閣』，藏書數千卷。」³¹⁵「一歲喪母，事其父以孝聞。父病革，割臂為湯飲父，父良已。年七十，追念母不逮養，服衰，廬墓三年，詔旌其門。素精名理，聲譽大著，人稱陸桴為「大山」，安泐為「小山」云。」³¹⁶

《新鄉縣續志》亦載朱安泐云：「篤行好古，於學無所不窺，邸第建『青藜閣』，藏書數千卷，日誦讀其中。極意著作，攻古文辭，海內名流皆與從游。性至孝，父曰南山公，嘗病割左股以進，病良已。大司寇餘姚翁公顏其堂曰：『世孝』云。博極群書，明習當世之務。晚年宗陽明之學，與海內名儒韋南荅、耿楚侗（1524-1597）、鍾文、陸鏡源諸公相辨論，多所會悟。兩臺監司、郡邑諸大夫，皆造廬相問。自論文考政之外，一言不及私，士人益重之。晚年奉旨為宗正，群公、族子弟，授之經義，執經問難，莫不人人解頤。又二年卒，壽八十六。所著有《理學寤言》、《太極圖考》、《古本大學》、《續談藝錄》、《春草齋集》、《江山覽勝集》、《鷗丁漁唱集》、《叢桂莊詩集》、《宗臣志》、《寧夏定變錄》、《北地年表》、《叢桂莊品題詩》、《牡丹譜》，皆行于世。」³¹⁷

32. 張子定（不詳）

字仲安，衛輝府新鄉縣人。「早歲入邑庠，文名藉甚，尤長於詩賦，每同輩命題分咏，君詩一出，眾咸擱筆。長食廩餼，秋闈屢荐不售，乃設教以啟後學，四方來學者甚眾。……家藏書甚富，丹黃皆出其手。……晚歲屢主講滑台、東明

³¹⁵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安泐〉，頁66上。

³¹⁶ 清·張廷玉，《明史》，卷116，〈列傳·朱安泐〉，頁14上。

³¹⁷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安泐〉，頁66上-下。

諸望族家，士子請益者，問以業何經史，則以何經史相詰難，博聞強記，時共稱焉。以歲貢終。著有《溢香齋詩草》傳世。」³¹⁸

33. 王正誼（不詳）

字舒生，開封府人。「王正誼以子惟儉貴」³¹⁹。《博望山人稿》載：「國朝徙通許，四傳始徙祥符，以籍自占，為贈公振生。侍御公琬有子曰：『中達』，官黃縣，配李孺人，首舉即封中憲公云。公諱正誼，字舒生。有至性，自幼即敦篤如成人，顧其中秀辯。喜涉羣書，薄排比，言非古也。家世獨富藏書。」³²⁰

34. 曹啟佑（不詳）

字經畚，懷慶府河內縣人，邑庠生。「幼有至性，好學，家甚貧。年十五，即設帳授徒，得束脩，市甘旨以奉親。親老患病，每藥必嘗，衣不解帶者數年。入庠後，文譽噪甚，因竭力事親，絕意進取，訓課諸生，勤懇如子弟。嘗患從學者無力購書，聞見不廣，乃市經史子集數百卷，貯之塾中，縱使瀏覽，由是多所造就，門人入邑庠、登鄉榜者，不下數十人，邑中百餘年來文教之盛，無有能及之者。」³²¹所著有《聯桂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

³¹⁸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7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第 1 版，據民國 12 年（1923）刊本影印），卷 5，〈人物·文苑〉，頁 50 下-51 下。

³¹⁹ 清·張壯行、馬士鸞，《祥符縣志》，卷 4，〈人物·王正誼〉，頁 51 上。

³²⁰ 明·曹履吉，《博望山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85-18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初版），卷 13，〈誌傳·誥封中憲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暨元配累贈恭人耿氏墓誌銘〉，頁 2 上。

³²¹ 清·袁通、方履錢，《河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7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初版，清道光 5 年（1825）刊本），卷 26，〈人物·曹啟佑〉，頁 41 上。



第五章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藏書生活

藏書，顧名思義就是收藏圖書典籍。其目的為人類進行閱讀、鑑賞、研究和利用，而進行的收集、典藏、整理圖書的活動。³²²中國古代私人藏書家聚書、藏書的首要目的，通常就是為了自己讀書的需要。此外，許多私人藏書樓的主人，都是藉由閱覽藏書，進而取得許多學術成就的。³²³

在典籍的保存方面，自秦始皇焚書坑儒，銷毀了大多數的圖書典籍起，促使有些人會將自己的書籍藏匿在牆壁內當中。到了漢武帝時，政府實施徵書政策，而其徵收的就是這一類型的書籍，透過這樣的方式，不但奠定了國家藏書的基礎，同時也繁衍了歷代史料的經典。可惜明末戰火不斷，像是前文談到的流寇李自成（1606-1645），在他攻打汴梁時，受到戰火波及的藏書家張民表便是不顧戰火，也要搶救自己所藏之書，於是我們了解到正是因為有這些不畏艱難的藏書家們的始志護書，才讓我們今日仍然可以看見這些經典的古書。

本章的重心著重於文人讀書生活中的訪書、購書、借書、抄書等不同歷程，以及探究藏書家們在當時所遇到的不同情境，藉此窺探明代河南私人藏書家生活的不同風貌。

³²²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2。

³²³ 馬艷霞，〈古代私人藏書樓的開放實踐、思想與影響〉（《大學圖書館學報》，2011 年 10 月，第 6 期），頁 116。

第一節 藏書的維護

明代的藏書家大多重視圖書的維護與保存，雖然部分藏書家的藏書不幸毀於水火、兵亂等災禍，但也有不少人的藏書得到了良好的保護，並輾轉流傳至今。明代文人勤學苦讀，嗜書如癡，窮年累月，堅持不輟，蔚然成風，「讀書」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藉著積極從事「訪書」、「購書」、「借書」、「抄書」等方法，努力搜求，取得書籍。

近人洪有豐（1895-1963）曾經論及保護古籍的重要性，認為「圖書之於學術，猶貨幣之於經濟焉。典籍之藏，其關係學術，與金融機關之關係經濟，殆無異。」³²⁴他將圖書與學術之關係比作貨幣與經濟的關係，古籍保護對於學術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因為如此，藏書家們將珍重收藏、刊刻流傳、保護典籍視為己任，尤其是遇到國家危難、藏書瀕臨散亡之際，藏書家們更是義不容辭地扛起保護典籍的大旗。³²⁵因此，許多文人藉由訪書的活動成就個人讀書、藏書的意志，同時在訪探、尋求的過程中，使得不少散失亡佚的典籍得以重現；斷簡殘編的詩文得以復原。³²⁶

在典籍傳播方面，有些藏書家會將自己的藏書借閱給大眾使用，使他人也有機會閱讀書籍。這種將私產化為公益的行為，不但能夠擴大閱讀的氛圍，同時也能進行知識的傳播。另外，也有藏書家提供原刻本給大眾進行抄錄，經由多人抄書而生產出更多的副本，更使書籍可以傳播到四面八方，即便受到人為或自然災害而損毀時，我們依然還存有副本可以閱覽。

³²⁴ 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頁 39。

³²⁵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 23。

³²⁶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藝術學報》，第 85 期，2009 年 10 月），頁 505。

一、藏書的管理

古代藏書家為了維持典籍的完整性，可說為護書成癡。例如有些人會祭祀祈求神保佑書的平安，也有人為了保護書籍避免被蟲蛀而損毀，利用芸香草來防蠹。其中，芸香草，是古人常用以避蠹之物，三國時期已有利用芸香草來防蠹的文獻記載。在《訥河縣志》與《沙縣志》中也有記載芸香草之作用，云：「芸香草，教則其者甚，列裝入枕內，最可避蠹。」³²⁷「芸香草可辟書蠹」³²⁸等相關史料。另一種則是利用曝書的方式，所謂曝書，也就是將圖書進行晾曬的動作，達到防黴、防蟲的功效。如《德平縣志》中所談到的相關風俗民情曰：「六月六日，儒曝書、民曬衣，謂之却蟲蠹。」³²⁹也就是說，在每年的6月6日當天，儒生會進行曝書，同時村民們也會在當日進行曬衣的行為，來杜絕蠹蟲。因此，在習俗上，這一天「曝曬」，能夠達到最好的功效。

此外，在藏書方面更有所謂的「藏書之法」，如孫從添（1692-1767）所撰寫的《藏書紀要》中記載了藏書的八種方法，包括購求、鑒別、鈔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及曝書，其中也包含曝書的保護方式。這些一點一滴所流傳下來的護書行為，也默默累積了不少有利的護書方式，使得書籍得以獲得更好的保護，並流傳至今。

明代河南的藏書家在私人的藏書樓以及日常的圖書保存上，日積月累形成了完善的護書系統。除了利用購書、刻書的方式來收藏書籍的之外，他們還會到處蒐集殘破不堪的書，並花費很大的心力和金錢將其復原成原本的樣貌。而在拼湊這些古籍的時候，同時也會進行校勘，糾正書中的錯誤，將古籍的內容修復成符

³²⁷ 崔福坤，《訥河縣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東北，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民國20年（1931）鉛印本），卷10，〈草類·芸香草〉，頁399。

³²⁸ 梁伯蔭，《沙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23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1版，據民國17年（1928）鉛印本影印），卷5，〈物產·芸香草〉，頁5上。

³²⁹ 清·凌錫祺，《德平縣志》（《中國方志叢書》35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臺一版，清光緒19年（1893）刊本），卷1，〈方輿志·曝書〉，頁10上。

合原始的模樣，藉由修復古籍的過程，可以讓老舊不堪的典籍變回接近原始的模樣，並且好好的保存起來。

此外，明代擁有藏書樓的藏書家們，在他們的藏書樓中，除了有安排管理人員進行圖書排架、書籍裝訂、修補之外，還特別設置了一些災害防範的設施，像是專門用來防火、防潮、防鼠、防霉、防盜和防曝曬等裝置，³³⁰以防堵書籍遭受破壞。而中國古代的書院，與圖書的保護亦有著密不可分的緊密聯繫，例如位於河南開封的大樑書院（又稱麗澤書院），據《大梁書院藏書目》所記載，云：「書籍年久，函線損敝，司書吏呈明監院官酌易重裝。」³³¹無論是哪個時期的書院，藏書、修書、講學等都是主要活動，尤其是書院的藏書，可以滿足文人學者們從事學術研究、修訂典籍和教學研習的目的。³³²

在《大梁書院藏書目》中嘗提到書院藏書的借閱規則，以及相關管理人員的職務內容。例如〈藏書借閱規則〉中所曰：

各項書籍，均存院長院內西偏精舍，用司書吏一人經管，用司閣役一名典守鎖鑰。書院置一閱書簿，交司書吏檢取，於簿內記明某月、某日，取某書幾卷、幾本，某生閱，齋長某人，各於名下書押。每次取書，每人只許一種，不得逾期，交還後再取。

書院中會設置一本借閱簿，如文中所提及的「閱書簿」，「閱書簿」上的內容最後會交由司書吏確認。此外，簿中所記載的訊息，除了學生的借閱日期與數量外，還會註記在不同指導人員的名下，如同現在的指導老師。而每次每人只能借一種書，並且還書後才可再借閱。另外，也提到關於院長閣中藏書的典藏維護情形，根據書中所述：

³³⁰ 趙國權、吳瑩，〈河南歷代書院藏書制度探微〉，頁 101。

³³¹ 清·顧璜，《大梁書院藏書目》（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 24 年（1898）），〈藏書借閱規則〉，頁 7 上。

³³² 陳傑、楊雅君，〈古代書院藏書探析〉，頁 218。

院長閣所存各書，每至伏日，酌量抖晾一次，由司書吏呈明監院官，遴派數人用心經理，勿使渡凌亂。書籍年久，函線損敝，司書吏呈明監院官酌易重裝。每屆一年，監院官將所存各書抽查一次，損失則著賠。以上所訂規則，如有未周及日久應變通處，儘可增損更訂，惟以行之久遠，絕去弊端為斷。³³³

我們從《河南通志》中可以看出，古代對於書院的藏書樓擁有嚴格的規定，對於較舊的書籍、線裝書上的現已太過老舊……等書籍，還會特別交代司書吏呈明監院官來做重新裝訂。



二、明代河南書院藏書的管理制度

書院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以私人創辦為主，是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因此，書院的產生與中國古代對於圖書收藏及地方上對書籍編纂、學術研究的重視，有著密切的關係。³³⁴

明初伊始，太祖對於創辦官學、提倡科舉方面雖然相當重視，可惜卻忽略了書院對於教育的重要性。當時一般的文人士子因官學待遇優厚，有多種途徑可作為仕進之階，所以對於書院建設也不甚熱心，故自洪武至成化時期這百年之間，明代書院建設皆處於相對沉寂的狀態。直到嘉靖、隆慶、萬曆間，明代書院的建設才逐步興起，各地開始大量建立書院，使得書院的發展進入到興旺時期。在隆慶、萬曆 50 餘年間，書院仍然持續的大量收集圖書。其中，包括在河南地區，於隆慶 2 年（1568）時，永城縣建立了「太邱書院」，開始蒐藏圖書；在萬曆 6

³³³ 清·顧璜，《大梁書院藏書目》，〈藏書借閱規則〉，頁 7 上。

³³⁴ 陳傑、楊雅君，〈古代書院藏書探析〉（《科技視界》，2016 年第 24 期），頁 218。

年（1578）時，輝縣知縣亦重修了「百泉書院」，藏書教育士子。在圖書管理制度中，圖書分類、編目是圖書收藏、流通的基礎，也是圖書管理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明代河南書院志當中，常有書院的藏書書目，像是《大梁書院藏書目》、《百泉書院書籍目錄》……等。

以河南的「百泉書院」為例：明成化 17 年（1481），由四川廣安縣籍的河南提學僉事吳伯通（1441-1502）所建立的「百泉書院」，位於河南輝縣蘇門山。蘇門山麓為衛水發源地，山川幽美，百泉長流，故以名之。吳伯通以當時「學術務於枝葉，不理根致，創設了四間書院。」³³⁵，以祀先賢及振興學術，而「百泉書院」是其中之一。「百泉書院」內建有講堂、主敬堂、先賢祠等建築。此外，吳伯通自創教規，親自講學，且後繼的地方官督課尤嚴，並置學田給贍，直到萬曆 6 年（1578）時，知縣聶良杞（1547-1619）重修院舍，增加藏書，因而吸引了大批士子前來，使書院名冠中州。在聶良杞《百泉書院志》一書中載述：「書院在萬曆間藏書 26 部，凡 275 冊。」³³⁶除上述外，還有很多任職在外的河南籍藏書家，也為家鄉藏書文化的傳揚付出甚多。³³⁷

這些將畢生精力大半用於河南地方文獻的蒐集整理，以及用於地方書院、書舍、精舍的創辦，以便講學授徒的河南籍藏書家，經過千餘年的發展，在藏書事業上，無論從來源、內容，還是借閱、保管等諸多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完善了藏書管理制度，為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也給後世留下許多珍貴的文獻典籍。³³⁸

³³⁵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卷 6，〈藝文·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叙·王質〉，頁 13。

³³⁶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316。

³³⁷ 孫赫男、王璐，〈宋明以來河南私家藏書考述〉，頁 57。

³³⁸ 趙國權、吳瑩，〈河南歷代書院藏書制度探微〉，頁 101。

第二節 藏書的利用

中國古代私人藏書家聚書、藏書，多半是為了自己讀書的需要而收藏，很多私人藏書樓主人也藉此取得許多學術成就。不過，有些藏書家還公開私藏，使很多古代學者從私人收藏家身上獲得學術研究上需要的文獻資料，造就了少數精英學者，從而推動了古代的學術研究。³³⁹也就是說，歷代有許多思想開明的藏書家不會敝帚自珍，願意將私人的藏書開放給鄉人鄰里閱讀，有的甚至大批捐出個人藏書興辦學堂，以培養更多的人才，藉此大大地發展了當地的文化及教育事業。

340

隨著私學的興起，穩定的士人群體也相伴而生，私學成了古代聚集賢才的重要途徑。³⁴¹因此，這樣的義舉就讓普通百姓也有機會可以進行圖書的閱讀與利用，藉此改變自身的文化素養或社會地位，對於他們來說，可謂影響甚大。³⁴²就如同河南臨潁縣藏書家賈詠的作為，賈詠自身喜好著書，此外每當他參加完科舉考試之後，由於賈詠文筆非比尋常，如《國朝列卿紀》中所述「文章醇雅暢達，無艱深險僻之語」、「凡程文一出，天下誦之」，³⁴³說明每當考完試之後，因賈詠的文筆實在令人讚嘆，大家互相搶著閱讀，使得天下百姓有機會閱讀他所撰寫的文章，其他考生也藉此學習，賈詠也不吝嗇地分享給大家。

在賈詠年老後，更是耳聰目明越來越健康，求文者自四面八方不斷前來，他依然「揮毫運思，酬答如平時」³⁴⁴，真誠地對待他人，「人稱為篤行君子」³⁴⁵。如文中所述：

³³⁹ 葛立輝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其文化貢獻〉（《邢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頁103。

³⁴⁰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30。

³⁴¹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篇〉（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頁11。

³⁴² 徐凌志，〈中國古代藏書理念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9期），頁122。

³⁴³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卷12，〈內閣行實·賈詠〉，頁69下。

³⁴⁴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卷12，〈內閣行實·賈詠〉，頁69下。

雖老，猶著作不倦，耳目益聰明，四方求文者踵至，揮毫運思，酬答如平時。居鄉謙抑真坦，若未嘗居顯者，人稱為篤行君子。³⁴⁶

賈詠本身也是弘治己酉科（2年，1489）河南鄉試第一名舉人，能如此將自身所學傳承給他人，可見他在推動地方教育與學術、培養區域人才上的熱忱與貢獻。

而科舉制度的產生，也漸漸影響了藏書的推廣，使得民間的教育事業獲得更大的發展。綜觀有明一代，河南地區的科舉人才主要集中於河南府，進士總人數一共有258人，是明代河南產生進士較多的地區。³⁴⁷同時，還出現孫賢（1423-1478）和劉理順（1582-1644）等兩名狀元、明末抗清名士史可法（1601-1645），以及文壇「前七子」盟主李夢陽（1472-1529）等人，均出自開封府轄區。³⁴⁸今人研究指出，明代河南地區的進士分布在轄下各個州縣的情況不均，明顯呈現出區域人才分佈不平衡的態勢，這是因為當地社會發展不平衡的一種反映。相較於河南府轄下的1州13縣，府治所在的洛陽進士人數最多，高達126人，遠遠超越其他州縣。此外，整個明代河南的舉人與進士當中，有69人官拜尚書，另有不少人在中央、地方擔任要員、封疆大吏。³⁴⁹

許多藏書家紛紛捐出個人的藏書，或是構建書堂以藏書，提供鄉里子弟們讀書、授徒講學的設施與場所，進而促進區域藏書與學術風氣的形成。³⁵⁰

書院藏書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院內的教授、生員，以及當地的一些讀書人，所藏圖書主要不只是為了「藏而藏」，而是希望能「方便讀者使用」，故書院藏書的管理方式與原則，自然也與一般的藏書樓有所差別。明代的書院圖書管理制度

³⁴⁵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卷12，〈內閣行實·賈詠〉，頁69下。

³⁴⁶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卷12，〈內閣行實·賈詠〉，頁69下。

³⁴⁷ 李小白，〈明代河南府進士區域分布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2018年4月），頁66。

³⁴⁸ 梁建華，〈明代河南科舉的特點及歷史作用〉，頁132。

³⁴⁹ 李小白，〈明代河南府進士區域分布研究〉，頁66-68。

³⁵⁰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頁29。

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探索，經年累月、日益更新，逐漸形成一整套較為完整、獨具特色的系統，當中包括圖書徵集、整理、分類、編目、保管、借閱等制度。³⁵¹因此，私家藏書不僅具有保存和傳播文化的功績，同時促進了書院的產生，及推動文化教育的發展。

第三節 藏書的流通

圖書與文人讀書生活息息相關，文人對圖書的蒐羅、保存與傳播的作用，透過各種不同的閱讀歷程，增長知識、與友共享、陶冶情操、淨化心靈、寄託情感從讀書中感受到樂趣。對於喜愛閱讀的明代文人而言，那些耗盡心力所得來的珍藏書籍是他們一生重要的心血結晶。也因如此，藏書借予他人與否的議題，一直都是有所困惑。即使願意大方借出，但又怕他人隨意損壞書籍，或是遲遲不歸還。若是一味窮追討還，恐怕又破壞讀書雋雅之意。為此，不少藏書家多採取「借借」的態度，誓言不以示人。對於站在相反立場的文人而言，在積書之餘若能將自身的藏書作為彼此流通、交換的管道，對於書籍保存也是具有更深遠的意涵，同時藉由彼此傳抄的方式，能夠更有效率的保存文獻，以及進行知識共享，也因此產生了相互借抄的規約出現。³⁵²

³⁵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310-311。

³⁵²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頁 505。

一、抄書與刻書

歷代的貧寒之士常常只能透過借書或抄書的途徑，來進行求知與閱讀。抄錄書籍亦是古代藏書家增益藏書最常用的方法，也不因雕版印刷的普遍而廢止。另外，袁同禮（1895-1965）指出：「明人好抄書，頗重手抄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³⁵³還有像是時人錢謙益嘗謂：「宗尉西亭（朱睦㮮）多藏書，余屬林宗購其書目。」³⁵⁴林宗（張民表）還會特別跟朱睦㮮購買書目，來購其滿足自身藏書。而書籍在明代時期，仍然是一項昂貴的商品。雖然當時的印刷術已盛行，卻往往因書籍難得，流傳稀少，而不易取得；或因為困於經濟，而無力購置；更因出現秘本未刻，為世罕見等狀況。因此，常常會需要多次的交換互借，輾轉傳抄。³⁵⁵在圖書抄錄上便成為了古代藏書家蒐集圖書最常用的方法，即便是在雕版印刷普遍流行的宋、元、明、清等朝代仍會以抄錄為主要的複印方式。此外，手抄方面，特別是名家的抄本，必是經過文人專業的鑑定，選擇罕見書籍或是傳錄較好的版本，所抄寫的版本多為善本。抄本往往代表著文人對藏書活動所付出的心血，同時抄書的底本多採用孤本、善本，因此文人抄本的價值，歷來為後人所珍藏與重視。

歷代文人還把抄書當作是讀書時幫助記憶的有效方式，只要藉由手抄一遍便能夠加深印象，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關於抄寫可以應用在求知、博學的方法上，時人吳應箕（1594-1645）特別強調了抄書的三大好處，他認為：

余亦嘗謂手抄有三益：先經抄一遍，於記誦亦易，益一也。可以校書之訛誤，收己之放心，益二也。常抄，則手法亦熟，即以當學字，益三也。今

³⁵³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27年），頁8。

³⁵⁴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81，〈張先輩民表〉，頁681。

³⁵⁵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11月），頁163。

時讀書，有力者必雇傭傭史，其或不得已而抄，又潦草成行；而其貧者，又直諉於無書可抄。手抄之益，今之不解也久矣。³⁵⁶

藉由抄書可以達到幫助記誦、校正訛誤、熟練學字等三大益處。就如同明代河南的藏書家賈壯便十分喜好抄書，據《襄城縣志》記載：

公諱壯，字弱侯，號止奄，世為襄城人。……讀書嗜古，尤工舉子業，手錄徑數尺，許久之，掩卷暗誦，滾滾竟帙不遺一字。順治2年（1645）舉于鄉，隔年成進士。³⁵⁷

賈壯在讀書時會一邊閱讀一邊抄寫，且抄寫完畢後，還會將卷軸捲起開始背誦，直到能夠倒背如流，一字也沒遺漏為止。可見抄書確實能幫助記誦，同時又能夠校正古書中的錯誤，並順勢練習書寫。藉此，我們揭曉了一部份古代文人的生活的面貌。

即便明代的圖書印刷事業已相當發達，仍然可以看出文人、雅士非常重視抄書，形成了一種時尚的生活特色。當時抄書之行為並未因為雕版印刷的發明與普及而遭到廢止，文人往往將手工抄寫視為求知自學、積累知識的管道。同時，抄書不但是書籍製作和文獻整理的基本工作，更是古代典籍傳播和流通的主要媒介。藏書家們透過彼此之間互相借閱、傳抄的行為，使得古代的圖書、典籍得以流通，也促進知識與文化的傳播，以及著述和創作的精神，同時也精進了書法的藝術，甚至有藏書家藉由抄書來滿足自我的癖好。總之，抄書是明代文人生活文化的特色之一。³⁵⁸

另外，在雕版印刷術發明後，進行刻書的藏書家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自五代後蜀的藏書家毋昭裔開始鏤版刊印九經之後，漸漸地熱衷於刻書的藏書家便層出

³⁵⁶ 明·茅坤，《茅坤集》（《兩浙作家文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卷20，〈萬卷樓記〉，頁616-617。

³⁵⁷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12，〈賈僉憲公傳〉，頁24上-26上。

³⁵⁸ 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第1期，2009年6月，頁115。

不窮，不乏其人。³⁵⁹例如明代河南藏書家徽藩朱見沛刻書頗多，按葉德輝《書林清話》所述：

徽藩所刻書有《錦繡萬花谷》前後續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列子《亢倉子》老子諸本傳於世，亦有惠士林之一端不容湮沒者，故附記之。³⁶⁰

又如祥符縣藏書家周亮工（1612-1672）在其友人中牟縣藏書家張民表過世後，便將他所留下的詩文百餘篇刻印發行，將其著作傳承下去，並命名為《原圃集》。據《中牟縣志》中記載：

門人周亮工，在金陵聞汴沒，遣人問民表耗，得遺孤，載與俱歸，撫育十年，成立始遣還牟。又輯其餘詩百餘篇，刻而傳之，名曰：《原圃集》。³⁶¹

許多藏書家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雄厚的資財刻印了許多種品質甚佳的圖書。不但刻書內容豐富，有的刊刻家集，有的刊刻鄉土文獻，有的搜羅佚典秘本，³⁶²使得不少散失、亡佚、殘編的典籍，皆得以重現復原，而書籍的取得與轉借，更可獲得保存文獻、傳播知識的雙重作用，故對於古籍整理與文化保存，不但具有相當的貢獻與意義，也因而產生了多樣化的著作。³⁶³

³⁵⁹ 余述淳，〈試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播的貢獻〉，頁 80。

³⁶⁰ 王琴林，《禹縣志》，卷 9，〈經籍志〉，頁 63。

³⁶¹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

³⁶² 余述淳，〈試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播的貢獻〉，頁 80。

³⁶³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頁 505。

二、著書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藏書生活中，除了進行抄書、刻書之外，許多藏書家也非常樂衷於「著述」，而這也是藏書家利用所藏的一種積極表現。³⁶⁴如祥符縣藏書家李濂便是，致仕後，里居四十餘年，著述甚富，「有《嵩渚集》、《祥符文獻志》、《汴京遺蹟志》、《醫史》諸傳凡若干卷。」另外，鄆城縣藏書家左國璣，也是一位勤於讀書，甚至讀遍所有書，並用盡全力從事著書的藏書家。《祥符縣志》記載：「左國璣，字舜齊，尉氏人。父尚，鎮平王府廣武郡君，遂家祥符。七歲能詩，讀書日數千言，字法擬顏魯。公弱冠，從李獻吉就學於京師。正德 11 年舉於鄉，才名籍甚，四方好古之士，皆千里來從游。國璣至都下，公卿爭迎致之，得其隻字片辭，輒為寶之。累試南宮弗利，當路者欲薦入官，辭弗就，歸老汴上。博極群書，肆力著作，所著有《賦頌碑誄序》、《記諸體詩》，各累萬言行於世，人稱之曰：『中川先生』。」左國璣「才名籍甚」，可見他在當時是一位極為有名的文人，甚至他所講出來的隻字片辭，都如同寶物，極其珍貴。他在世間更是留下了許多著作，時人尊稱他為「中川先生」。

除了左國璣外，還有另一位著述甚富之人，即中牟縣藏書家張民表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著有《原圃塞菴詩集》。門人周亮工撰〈張林宗先生傳〉，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頽然揮灑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韓愈，768-824），詩法魏晉及杜少陵（杜甫，712-770），餘子不道也。」³⁶⁵

張民表在 4、5 歲時，就開始拜佛，直到 20 歲左右對於所有梵典都瞭如指掌，並能完美詮釋，對於書中的含意也理解的非常到位。他也非常喜好古文詞，所撰寫的著作直追古人。此外，對於家中的藏書，張民表也勤於閱讀，並標上句讀。

³⁶⁴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140-141。

³⁶⁵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 4，〈張林宗先生傳〉，頁 11 上-15 上。

他個人喜好一邊飲酒一邊著書，這有助於幫助他發揮功力。而他生平著書也非常多，經彙整之後將近上百卷。只可惜他所藏的圖書秘不示人，未與人共享，甚至當朋友建議他將書版刻印行時，張民表仍笑笑地謝絕對方。此外，他在詩詞的學習上屬於復古派的文人，只願效法魏晉名家、韓愈、杜甫等古人為學習對象，其餘的不學。從以上種種行為得知，張民表是一位非常有個人特色的文人。但他也是一位非常好客的文人，日常生活中，十分喜好雅集。

如《虞初續志》載：

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³⁶⁶

張民表個性謙虛，其父張孟男雖然官列近御，位高權重，但張民表卻非常喜好周濟他人，以致家道中落。雖然如此，張民表仍樂於結客盟會，待人接物，不曾感到疲累。就如張睡心先生所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張民表家中常常聚集許多賓客，酒一杯接著一杯，不曾停息，酒杯也不曾空著。這種熱鬧的集會氣氛，可謂難能可貴。至於撰寫〈張林宗先生傳〉的友人—祥符縣藏書家周亮工，也是一位著書盛富之人。家中藏書樓名為「賴古堂」，他除了時常從事藏書與刻書活動之外，在他「著書甚多」³⁶⁷，「著有《同書》、《鹽書》、《相編》、《讀畫錄》、《詩人傳》、《印人傳》、《字觸》、《書影》、《閩小記》、《賴古堂詩文集》等書籍。」³⁶⁸另外，在《長汀縣志》中所載云：

³⁶⁶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4，〈張林宗先生傳〉，頁11上-15上。

³⁶⁷ 清·武念祖，《上元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44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臺一版，據清道光4年（1824）刊本影印），卷20，〈寓賢·周亮工〉，頁24上。

³⁶⁸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頁125。

李長日，字化舒，號石村，長秀弟。善古文詞，尤長於詩，方伯³⁶⁹周亮工取其文編入《賴古堂文選》。³⁷⁰

周亮工將李長日的詩文編入自己所纂輯的《賴古堂文選》當中。可見周亮工在著書時，並非獨自一人閉室撰寫，也會與其他文人有所交流。由此可知文人生活並非只是相約飲酒作樂，也會相互幫助，使他人的經典也能編入書籍，流傳後世。

在著書方面，除了上述所及的藏書家外，明代河南還有許多藏書家也喜歡從事著述工作。例如臨潁縣藏書家賈詠著有《南塢集》；信陽縣藏書家戴冠所著有《邃谷集》十二卷；內鄉縣藏書家李蓀撰有《明蓀圃集》；新蔡縣藏書家張九一著有《朔方奏議》、《綠波樓詩集》等。

綜上所述，藏書家除了進行藏書外，有些還會進行著書或刻書的活動。然而，著書家未必是一位藏書家，著書者不一定會收藏大量書籍。相反的，許多藏書家也並未花時間於著書，只專注於購書與抄書，努力增進自己的藏書而已，因此，藏書家也未必是一位著書家。

但是，藏書家相較於其他人來說，他們所閱讀的書籍數量明顯較多。這些所讀之書可以有助於增進其學識與寫作靈感，寫作的量也會大幅提升，也許這對於他們在著書時將有所幫助。最後，藏書的規模，或許也會與他們在著書時的參考有所關連。

³⁶⁹ 方伯：指實力強大的諸侯，或諸侯的領袖，明清時成為對布政使的雅稱。

³⁷⁰ 清·謝昌霖，《長汀縣志》（《中國方志叢書》8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據清光緒5年（1879）刊本影印），卷24，〈人物文苑·李長日〉，頁3下。

三、書籍的流通

大部分的藏書家對於私人藏書的利用都抱持著「重藏輕用」的封閉心態，除了自家子孫可閱讀外，一般多不願意見示於人。可以理解的是，他們的所做所為也是希望能夠確保家中的藏書得以永續傳承，避免圖書的流失。像是寧波范氏的「天一閣」，一開始就立下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家規，告誡子孫們不得將藏書出借，但這樣的行為反而造成圖書傳播上的阻礙。直到明代中後期之後，不少藏書家才慢慢領悟到藏書共享、互借和流通的重要性，開始出現許多藏書家願意外借自家所藏之書。再加上，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影響，社會上對書籍的需求大增，進而刺激了刻書業和圖書流通業的發展。³⁷¹

此外，我們可以發現明代的藏書家在圖書傳播上存在著兩種派系，其中一派主張圖書流通共享，相反的，另一派則是不願與人共享。而這些反對藏書流通的藏書家們，他們認為藏書是屬於他們的私有財產，即便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因為書籍得來不易，³⁷²加上天災人禍，或是政治因素的影響，人們對於書籍的珍視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們並不願意共享所藏之書。還有一些人則是因為害怕書籍出借後被毀損、遺失，畢竟他們都是惜書之人，如此疼惜的態度就影響了他們的共享意願。至於那些主張開放私藏流通、願意與人「共享」的藏書家們，大多則是認為藏書不應該只是私人財產而已，應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強調藏書的流通是保存國家文化遺產的主要途徑。

「共享」所指得是一個開明的圖書流通精神，包括借閱、贈送和使用等，更是人類的最重要的傳播管道。³⁷³圖書流通共享的方式甚多，考諸史籍，明代藏書家之間流通共享的主要途徑，不外乎透過教育、贈送、交換、借閱、鈔寫、購買、刊印等形態來進行，而其中又當以借閱最為普遍。於是當時許多藏書家在借閱這

³⁷¹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518。

³⁷² 葉乃靜，〈我國古今圖書流通思想演變之研究〉（第 4 卷第 1 期，2000 年 3 月），頁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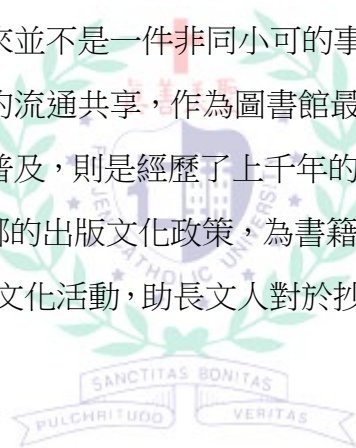
³⁷³ 陳冠至，〈「書能一人讀，不能一人藏」—明代江南私人藏書開放流通的心態與實踐〉（《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第 34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2。

方面，也就是圖書的共享與流通上紛紛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譬如河南歸德縣藏書家李和霖，「性喜儲書，建藏書樓，置經傳子史及漢唐宋諸集，後進貧無書者賴之。」李和霖本身喜愛藏書，甚至為此建立了藏書樓。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明朝時期的教育仍不普及，許多人無法就學以及許多因家貧而無法購書者無書可讀。然而，李和霖的藏書除了自己閱讀外，還願意將其所藏開放給他人使用。

這一種開放思想的成熟、普及與指導下，也促使更多藏書家們紛紛大方地將自家的珍藏開放流通，提供給別人借閱或利用。可見有明一代，在圖書的相互分享、借閱與鈔錄上，也逐漸地擴大發展，成為了許多藏書家群體之間的一種共識，並蘊釀出不同於以往的圖書流通型態。³⁷⁴

在今日圖書流通看起來並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甚至都視它為理所當然。現代的圖書館更是把圖書的流通共享，作為圖書館最基本的任務。反觀過去，從圖書的收藏到圖書的流通普及，則是經歷了上千年的歷史。藏書風氣的盛行帶動了圖書的流通與消費，鬆綁的出版文化政策，為書籍問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於是大量藏書、購書、訪書的文化活動，助長文人對於抄書、刻書文化事業的熱衷。

375



第四節 藏書的生活

中國私人藏書自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啟蒙的爆發而隨之產生。至隋唐時期，開始施行科舉制度而逐漸興盛。到了宋代，因雕版印刷的活躍而大盛，直到明清時期也依然相當盛行，甚至陸續出現《李蒲汀家藏書目》、《藏書紀要》等，針對藏

³⁷⁴ 陳冠至，〈「書能一人讀，不能一人藏」—明代江南私人藏書開放流通的心態與實踐〉，頁 3。

³⁷⁵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頁 505。

書規則或藏書目錄而著的專書。此時知名藏書家多如牛毛，甚而出現「藏書癖」等專有名詞之形容詞，來形容這些愛書成癡的藏書家們。³⁷⁶

明代許多文學家沉溺於藏書，他們既是文學家，又為藏書家，兩者相得益彰。³⁷⁷他們對於書籍的追求、愛惜和眷戀，常把自己比作「書癖」、「書痴」、「書淫」。像是宋朝詩人陸游（1125-1210）就自稱為「書癖」，或是明代藏書家邊貢（1476-1532），即因藏書毀於大火，日夜思念終於大病而卒，年僅 57 歲。黃丕烈（1763-1825），清代江蘇蘇州人，在每年除夕，集合一年所收之書，焚香祭拜，以表達對圖書的敬意。這些用情於書，執著專注的感情，確實讓人欽佩。³⁷⁸這些嗜書如命的藏書家，對於書籍的情感已達到不可自拔的地步。這些擁有「書癖」之人，除了自身興趣之外，也有一些是本身既有書癖，也是一位潔癖之人，像是「家藏書甚富，丹黃皆出其手」的明代河南新鄉縣藏書家張子定，「性清淨，有潔癖，日手五沐，口十漱，習以為常。」³⁷⁹可見他除了有藏書癖好之外，個性也如此潔癖，每日洗五次手、漱十次口。雖然如此，他將這些行為看作是習以為常之事，且在教育與知識傳播方面占了一席之地。

在中國私人藏書方面，藏書家們主要是透過購買、抄寫、餽贈、繼承、自著等方式來徵集圖書。此外，中國古代私人藏書主要以「秘惜所藏」為目的，即珍秘及愛惜藏書，以提供家族與後代使用為目的，反映了中國古代知識私有的特色。書籍除因作者在寫作時賦予的意義之外，在收錄到個人書架上而成為私人藏書之後，便會產生屬於個人的獨特脈絡，成為私人藏書對於書籍本身所產生的另外一種意義。也就是說，私人藏書的度架與排序部分，藏書家為便於管理與查檢書籍，於是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編排方式，³⁸⁰成為自家藏書生活與藏書文化的特色之一。

³⁷⁶ 吳宇凡、蔡孟軒，〈私人藏書脈絡初探〉（《大學圖書館》，第 19 卷第 2 期，2015 年 9 月），頁 113。

³⁷⁷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 74。

³⁷⁸ 張圍東，〈古籍裡的風景—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印記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2018 年 12 月，第 2 期），頁 148。

³⁷⁹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 5，〈人物·文苑〉，頁 50 下-51 下。

³⁸⁰ 吳宇凡、蔡孟軒，〈私人藏書脈絡初探〉，頁 113-114。

一、藩府的藏書生活

明代河南境內有一批特殊的藏書家，他們是封地在河南的藩王與宗室，這些藏書家經常獲得朝廷的賞賜圖書，又憑藉厚實的財勢大肆收購，故以量多質精稱雄。³⁸¹如袁同禮於〈明代私家藏書概略〉中所提到「明初私家藏書，當以諸藩為最富。當時被賜之書，多宋元善本，藩邸王孫，又多好學之士，以之翻雕刊印，時有佳刻。」³⁸²

明代的藩王多喜藏書，例如伊藩、周藩、唐藩等皆封藩於河南境內，府址分別是洛陽、開封、南陽等地，其中尤以周藩朱睦㮮的「萬卷堂」藏書樓最負盛名。³⁸³周府藏書自定王朱橚開始，藏書的嗜好代代相傳。朱橚於洪武 3 年初封吳王，11 年改周王，14 年始就藩開封府。喜藏書，也好著述，不拘泥於經史，而關心民生實用。撰《救荒本草》，羅列縷述並圖繪野生植物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裨益朝廷荒政頗鉅。³⁸⁴四庫館臣謂：「《明史》本傳稱橚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上之，即是書也。」

傳至六世孫朱睦㮮，在周藩諸王及宗室當中，藏書最為豐富。他「購得藏書家江都葛澗、章邱李開先兩家散出之書，建『萬卷堂』五楹以藏之，有 42,560 卷。仿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由於所藏倍增，朱睦㮮闢建「萬卷堂」以藏之。最膾炙人口的是度藏方式仿照唐人藏書類例之法，分經、史、子、集四類，並使用各色牙籤，按類標以識別。朱睦㮮亦雅好結客與文會交流，樂於與人分享所藏。就如《祥符縣志》中所載：「名重海內，名流皆與交驩，遠弗能

³⁸¹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 204。

³⁸²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頁 1。

³⁸³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 2 下，〈甲籤·朱睦㮮〉，頁 479。

³⁸⁴ 徐筱箴，《明代河南宗藩研究》，頁 20。

至者，則束書千里，定為神交；而四方之士擔簦游梁者，皆賴為館穀，門下食客履相錯也。」³⁸⁵

此外，襲封鎮平王府奉國將軍的朱安沅也喜好藏書，《祥符縣志》載朱安沅曰：「奉國將軍篤行好古，於學無所不窺。邸第建『青藜閣』，藏書數千卷。」可見朱安沅喜愛書籍的程度與朱睦㮮不相上下，皆為了藏書而構建藏書樓，而朱安沅將其藏書樓名為「青藜閣」。

即便明代的藩府藏書主要是以帝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所提供的服務，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其中又以政治與文化認同最為代表。因此，必須使藏書成為文化傳播之一種，才能透過書籍培養出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才。³⁸⁶爰此，明代的藩府藏書對於國家的治理、維護統治權、實現政治目標等，可謂具備相當高的作用力。而明代河南藩府藏書的風氣相較於其他地區更為興盛，在它們的藏書數量相當豐富之下，也為古代圖書的保存與流傳，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二、私人的藏書生活

藏書有其獨特性質，不同於圖書館及書店所陳列的書籍，係指一種為閱讀、保存、鑑賞、研究和利用等目的，而進行的收集、整理、典藏圖書的活動。藏書也屬於人類保存、留傳書籍與知識的一種行為，更是增進自我學術知識、涵養的方式之一。有些藏書家本身熱愛藏書也喜好閱覽，譬如明末河南藏書家張民表，他愛書嗜好甚篤，積書萬卷，終日勤讀絲毫不倦，誠如《中牟縣志》中所述：「年七十餘，猶挾策走長安道，志不少衰。家積書數萬卷，日閉一室沈酣典籍，窮披

³⁸⁵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睦㮮〉，頁61下。

³⁸⁶ 任民鋒，《中國古代文化價值觀與藏書特色之分析》，頁27。

博覽。」張民表積書數萬卷，常會將自己關在自家書室並沉醉於書籍，可見其對書的鍾情。

此外，孝順的襄城縣藏書家賈壯也是如此，他為了替父親治病，在寒冷的天氣至山谷中為父親採藥。而在照顧父親之餘，他仍專注於讀書，不僅如此，他更是用抄錄的方式來加強記憶。可見，賈壯除了進行藏書之外，也熱衷於閱讀。如在《襄城縣志》中所記載：「友人魏象樞（1617-1687）嘗述賈壯生平，曰：『性至孝，父贈公嘗患痢，醫藥無效，公虔禱于神，情辭□惻，已而假寢。』有告之者曰：『蒲公英可愈。』時嚴冬積雪，苦不能得，徧覓山谷中，得一二莖，服之而瘥，人以為孝感所致云。……讀書嗜古，尤工舉子業，手錄徑數盡，許久之，掩卷暗誦，滾滾竟帙不遺一字。……公性簡淡，平生無他嗜好，顧獨有書癖。其任懷寧也，購書數千卷，公餘即事披覽。』³⁸⁷

私人藏書除了是指個人進行藏書的行為外，也可以將其視為家族傳承的活動。他們將書籍典藏於家室或藏書樓中，³⁸⁸經過長年累積，數量非常可觀，也同時會進行傳承。如歸德府嵩縣藏書家李和霖，「性喜儲書，建藏書樓。」以及開封府祥符縣藏書家周亮工建立的「賴古堂」藏書，還有襄城縣藏書家耿華國建立的「富春軒」藏書……等，他們皆是為了藏書而建立藏書樓的明代河南藏書家，同時也藉此書樓將一生所藏傳承下去。譬如耿華國與弟耿震國的「富春軒」藏書，二人所藏「合先世所積，三萬五百七十卷。」可見他們的累世藏書，不但可以擴大家族藏書的規模，對於保護中國古代典籍的貢獻，也確實居功厥偉。

私人藏書並不像圖書館因為要服務大眾而包羅萬象，因為在藏書的構成當中將牽涉個人的需求與喜好。因此，這些屬於私人性質的藏書，在書與書之間的領域關係和形式內容上，也會充滿獨特的個人色彩。³⁸⁹除此之外，有些藏書家屬於欲求不滿的類型，儘管家中的藏書已經非常豐富，但仍然可望那些自己尚未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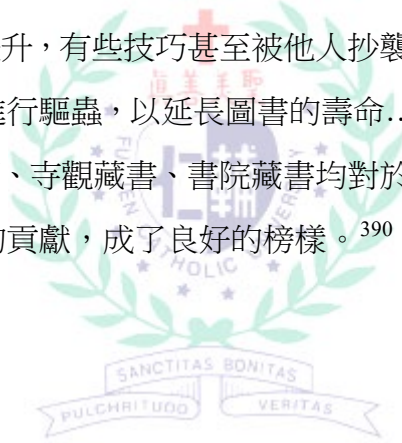
³⁸⁷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12，〈賈僉憲公傳〉，頁34上-36上。

³⁸⁸ 吳宇凡、蔡孟軒，〈私人藏書脈絡初探〉，頁112-113。

³⁸⁹ 吳宇凡、蔡孟軒，〈私人藏書脈絡初探〉，頁115。

到的書籍，像是光州縣藏書家劉黃裳藏書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但他仍然持續徵求不輟，不斷地收買家中沒有的書籍，誠如《大泌山房集》載述劉黃裳云：「藏書故充棟，猶募所未有。」此外，劉黃裳更是愛書成癡，「泐石蠹簡，貴於百朋萬鎰。」他在家中庭院堆積石頭，並將破敗的書卷擺置於屋中。做這些事讓他覺得比擁有很多朋友或是擁有很多財產，都還來的快樂。

流傳至今的歷代典籍，其字裏行間無不透著藏書家的心血汗水。在圖書保存上許多的藏書家都非常積極去保護他們所收藏的圖書。包括那些曾經歷天災人禍所存留下來的古籍，那些看似殘缺不全，無法恢復的圖書，仍有許多的藏書家總是耗盡心力，刻意覓坊，並依靠自己有限的的能力，盡可能地將手中的殘書破鏡重圓、完美再現。因此，在書籍防護上，經過上百年的時間，圖書保護的方法不斷創新，使其防護力更加提升，有些技巧甚至被他人抄襲而一直沿用並流傳下去，如古籍利用曝書的方式進行驅蟲，以延長圖書的壽命……等方式。可見歷代的藏書事業，無論官藏、私藏、寺觀藏書、書院藏書均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以及社會進步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成了良好的榜樣。³⁹⁰



³⁹⁰ 蕭東發等，〈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與資訊學刊》，第32期，2000年2月），頁49-52。

第六章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會關係

河南籍的藏書家在河南境內的藏書活動，一般而言有兩種情況，其一主要是在河南或鄉里隱居、授學、為官等，其二是輾轉外地為官，四方聚書，在家鄉建有藏書樓、書院，他們在居喪或罷歸期間，乃至致仕歸裡後，或讀書自娛，或講學授教於邑裡。他們以各種方式將河南的藏書文化傳承著，不少人更是傾資以盡藏書事業。

這些藏書家的特點是更為關注藏書的版本，注意收善本書，用心於藏書的校勘、分類、編目，發揮藏書的借閱、究學功能。這些藏書家的藏書事業浸透著文化精神，他們的藏書活動彰顯著社會的文明與發展態勢。他們的藏書活動珍藏了人類追索文明的足跡，保鮮了人類文化積累的經驗，使它沒有在歷史煙塵中風乾。

391



第一節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家庭關係

藏書事業的發達與區域的藏書風氣密切相關，尤其是文化世族家風的傳承、延續與影響，對於私人藏書事業的揚興亦具有相關性的作用。這些藏書家藏書與教學並重，以豐贍的藏書培育著讀書種子，滋養著鄉邦文教的土壤。許多家庭紛紛以收羅圖書為主要事務，一開始大多為個人喜好，而後藏書家一生收集了龐大的藏書，慢慢的一代傳一代，每一代也為了後世子孫而努力保存及收集藏書。此外，用藏書以教子孫，這些圖書也為教育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³⁹²如最具代表性

³⁹¹ 孫赫男、王璐，〈宋明以來河南私家藏書考述〉，頁 56。

³⁹²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100-101。

的明代河南藩王藏書家朱橚藏書甚富，而後傳承給六世孫朱睦㮮，他同樣繼續收藏、保存、維護著，接著再傳到朱睦㮮之子朱勤夔，也同樣感染了藩府藏書門風，據載：「其子勤夔，號竹居，亦嗜書，收藏益富。」可以看到藏書與累世傳承，是息息相關的。

說到藏書的傳承，除了藩王朱橚一家之外，開封府祥符縣藏書家周亮工也是藏書豐富，與明末清初的許多篆刻家交往甚密，嗜印成癖。透過藏書印可以了解一部書的遞藏經過，同時也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³⁹³周亮工的藏書印有「河南周亮工」、「賴古堂」等 50 多個藏書印。



圖四 〈河南周亮工〉朱文長方印。³⁹⁴



圖五 〈賴古堂〉朱文方印。³⁹⁵

其子周在浚也延續著父親的藏書志願，繼續藏書，也同樣刻有專屬於自己的藏書印，如「周雪客/家藏書」等。

此外，當今許多人認為學歷就是一切，古人也用是否有考上科舉來判斷一個人，然而，這對擁有個人思想的藏書家劉黃裳頗不以為然，他曾說：「是上有千古之業，下有千古之名，豈以一第為加損！」³⁹⁶他認為人藉由努力可以創造千古

³⁹³ 湯蔓媛，《印象，方寸之間——記傅斯年圖書館古籍鑒藏章特展》（《古今論衡》，2016年12月，第29期），頁139。

³⁹⁴ 明·胡正言，《印存玄覽》（《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0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據清順治17年胡氏蒂古堂刻後印本影印），卷3，〈印存玄覽〉，頁19下。

³⁹⁵ 印鑑，〈賴古堂〉，中國歷代人物印鑑數據庫，出處：
<http://diglib.zjlib.cn:8081/zjtsg/zgjcj/cypicgl.jsp?channelid=91700&searchword=%C3%FB%C8%CB%B1%E0%BA%C5=84>

³⁹⁶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20上。

之業，無者，則修身養性，往後世留得千古之名，並非藉由是否考上科舉來決定一個人在歷史上的評價。如同今日的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相似。也因為如此，他決定放棄科舉，返回家鄉侍奉兩老。而他也非常孝順，不單單只是陪伴他們，還會替父母找尋生活樂趣。如〈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中所記載：「歸而奉兩尊人，先意承志，就養無方，白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每上觴，兩尊人樂以忘憂也。」³⁹⁷劉黃裳讓他的父母每天都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第二節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朋友關係

明代文人喜好結社，如文社、詩社的各種文人社集。文社，本為文人們相互揣摩、追求晉身科舉功名而設置。因此，文社之人往往生氣相屬，交流平凡，也同時促進了當地文化與學術的傳播與流通，更進一步推動了文化事業的興盛。如文人們會互相標榜，即稍有一些表現，就會互將加以品題，樹立門戶，形成一個主題社群，如藏書家張子定在題詩方面非常有才華，據《新鄉縣續志》中所載述：「每同輩命題分咏，君詩一出，眾咸擱筆。」³⁹⁸可見他能力深不可測。此外，當中擁有不勝數的詩社、酒會...等集會，以及在不同文化目的下所產生的集會，皆屬於明代文人間標榜風氣下的產物，也成為了文人時尚的趨勢。³⁹⁹以下將使用交友示意圖來呈現河南境內文人們互相之間的交流關係，並藉由底色作為河南藏書家的標示。

³⁹⁷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 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 20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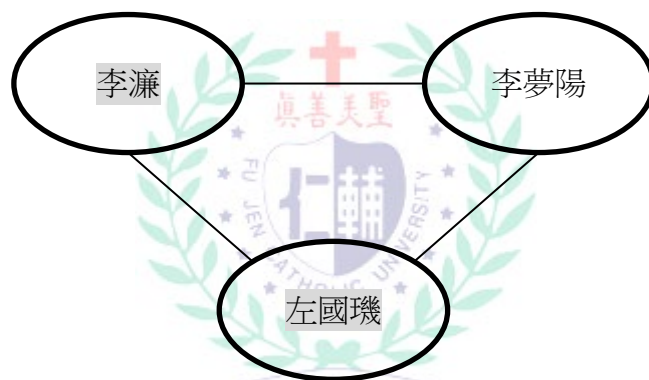
³⁹⁸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 5，〈人物·文苑〉，頁 50 下-51 下。

³⁹⁹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109。

明代藏書家李濂與李夢陽內弟左國璣並稱田、左。曾作《理情賦》，李夢陽大加贊賞，並親自前往吹台拜訪李濂。此時李濂知名於河、雒間。如《明史》中所記載：

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示李夢陽，夢陽大嗒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雒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里居四十餘年，著述甚富。⁴⁰⁰

另外，據《祥符縣志》中載述左國璣與李夢陽的師徒關係云：「公弱冠從李獻吉（李夢陽（1472-1529）就學於京師。」⁴⁰¹



圖六 李濂、左國璣交友示意圖。

明代一般文會集社的趣味性，往往包含了以文會以友、品題賞鑒、翰墨唱和……等文藝之事，以及宴樂戲謔等酒宴之歡。如藏書家張民表喜好飲酒賦詩，常常飲酒後，便能發揮所長，也因如此，使得他所交往的朋友大多為賢者之士，大家都想前來相互學習，據《中牟縣志》中記載：

⁴⁰⁰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6，〈列傳·李濂〉，頁 23 下。

⁴⁰¹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左國璣〉，頁 52 上-下。

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所與交，皆海內賢豪長者，尤好汲引後進，四方從遊之士，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⁴⁰²

藏書家張民表的朋友關係。據《虞初續志》中所載記：

林宗（張民表）與祥符王損仲（王惟儉）、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子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中尉西亭（朱睦㮮）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啓中，予以闖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間關寓予，酒間片語，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為可知矣。鄭醒愚曰：「先生之才之品俱足傳，得櫟園先生文，更傳不朽。」⁴⁰³

張民表、王惟儉、阮太冲、秦京互相關係良好，以外朱睦㮮多藏書，因此張民表還會向朱睦㮮購買其書目。可以從中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甚好，其中張民表與王惟儉皆為藏書家，當中還包括藏書大家朱睦㮮，他們在藏書方面有所交流。

此外，張民表更結識了周亮工，而周亮工在因緣際會下常駐於張民表家中，且這一住長達 8 年之久，後來周亮工當官後，他便離開了張民表家。如文中所述：

祥符周亮工，少貧來就學，民表語人曰：「此德器也。」館之八年，且使三子師事之，亮工聯登進士，始辭去，後官至少司農。⁴⁰⁴

然而，張民表一家在一場戰爭中不幸喪命，家族中僅剩張民表最年幼的兒子允集，拼命地抓住木筏才得以生還。據《中牟縣志》載：「人眾筏沈，俱淪於水，惟季子允集年尚幼，附浮木得生。」⁴⁰⁵

⁴⁰²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61 下。

⁴⁰³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 4，〈張林宗先生傳〉，頁 11 上-15 上。

⁴⁰⁴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1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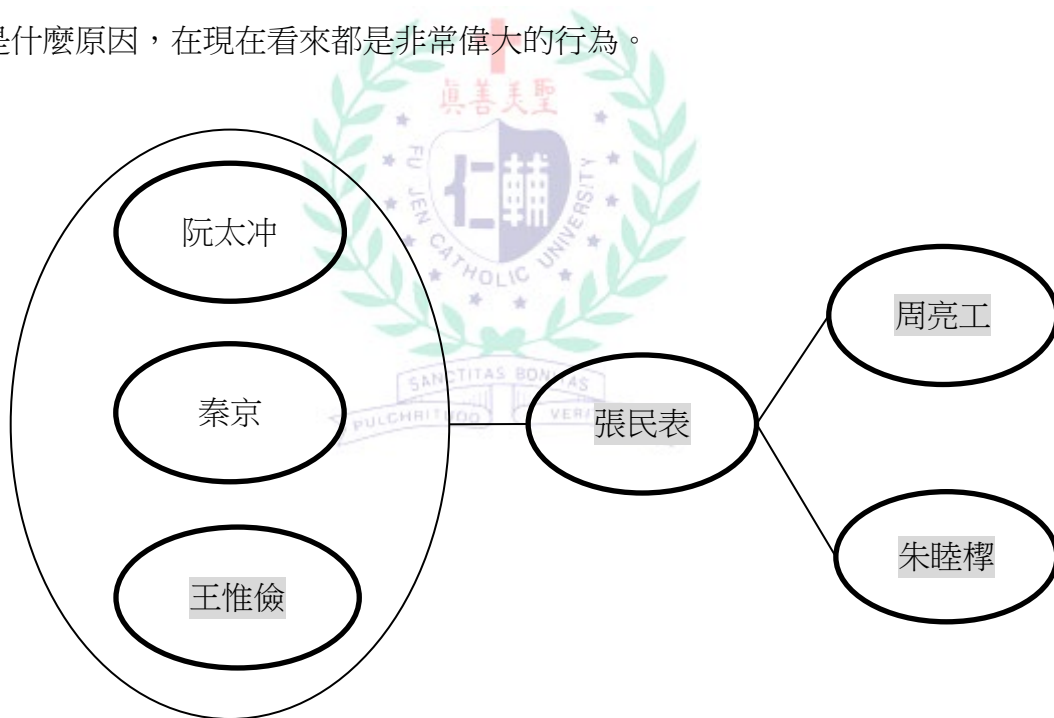
⁴⁰⁵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1 下。

此時，住在金陵的周亮工，聽聞城中淪陷的噩耗之後，馬上派人打聽張民表一家的消息。然而，得知僅剩年幼的季子允集生還，並將其帶回南京扶養長大，整整養育了 10 年之久。如文中所述：

門人周亮工，在金陵聞汴沒，遣人問民表耗，得遺孤，載與俱歸，撫育十年，成立始遣還年。又輯，其餘詩百餘篇，刻而傳之，名曰：《原圃集》。

406

除此之外，周亮工更是將張民表所剩餘的百篇詩集，用刻書的方式傳承至今，並將其名為《原圃集》。由此可知，張民表與周亮工之間的關係甚好，也許是周亮工感謝當初張民表對於自己的幫助，因此以養育張民表之子表達感謝之恩。不管是什麼原因，在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偉大的行為。



圖七 張民表、周亮工、王損仲、朱睦㮮交友示意圖。

接著，是一位在明代當地有美貌如仙之稱的藏書家劉黃裳，此人面貌姣好，廣受市井小民的青睞，據《大泌山房集》中所載記：

⁴⁰⁶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1 下。

公頎而白皙，隆準美鬚髯，目光曄曄若巖下電，騎而過市，市人望之若神仙中人，大道青樓窺簾隙，而願允下陳。牛僧狗屠、彈碁鬪槩、蹶張蹴踘、牽黃臂蒼之徒，赴而從之，籠街噓路。⁴⁰⁷

劉黃裳很高、皮膚白皙，五官立體，留著美美的長鬚髯，眼光炯炯有神，每當騎馬過街，市集的人都見他為神仙中人，可見他美貌如仙，在樓中的女子也不忘都看一眼，甚至都許願要當他的妾，甚至各式各樣身分的人都前來跟隨，與他為友一般，或形同門徒。因此，每當劉黃裳一出現，街道上便擠滿人潮，只願觀其一絲美貌。

而當時有一位叫趙冢宰的大官，並不喜歡與人同行，性格孤僻，非常在意自身容貌。不過他也是一位心胸寬大、正直之人，不懈於齷齪小禮之人。起初，趙冢宰與劉黃裳兩人並無特殊交情，格格不入，然而到後來變成了最好的朋友，並友好一輩子。其中，趙冢宰也在劉黃裳落榜時，看劉黃裳一直良良於懷而安慰他。如《大泌山房集》所載述：

同榜趙冢宰齒鳳行，冢宰斤斤，謹質形於體貌，而公豪宕，恥齷齪小禮。兩人初不相入，已更交歡，沒身不衰。明年，冢宰成進士，度公被放，不無介介，慰藉之。⁴⁰⁸

再來談到，有著「大山」、「小山」之稱的朱家二人，據《明史》載記：

田按史（朱安泐）稱將軍安泐素精名理，延納詞人，聲譽大著。與中尉睦樛齊名。人稱睦樛為大山安，泐為小山安。泐詩惜不多見。⁴⁰⁹

⁴⁰⁷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 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 18 下。

⁴⁰⁸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 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 18 下。

⁴⁰⁹ 清·張廷玉，《明史》，卷 116，〈列傳·朱安泐〉，頁 14 上。

從漢淮南王劉安召集文人從事著述，各選辭賦，以類相從，分別稱為「大山」、「小山」，如同《詩經》有〈大雅〉、〈小雅〉之分。在南朝梁時期，何點、何嗣兄弟二人一起遁世隱居，前者號為「大山」，後者號為「小山」。到了明周肅王之後，睦樛、安澗俱有學行，故後來也用以稱呼同時享盛名的兄弟倆，人稱睦樛為「大山」，安澗為「小山」。



圖八 朱安澗、朱睦樛交友示意圖。

在文人生活方面，如新蔡縣藏書家張九一：「巴陵至武昌，風帆頃刻可至，嘗乘月汛舟往來巫山、西陵間，得詩多奇句。」⁴¹⁰藉由出門遠遊也可獲得許多文學感想，並將其轉化為詩詞呈現。在那之前，他與太倉名士王世貞相得甚歡，彼此交情甚好，甚至在王世貞之父獲罪入獄時，他亦不擔心恐會遭受波及，對王世貞不離不棄，一直陪伴著對方與他一同高歌、哭泣。如《新蔡縣志》中所載記：

三年，擢吏部郎，是時諸曹郎如王、李諸人多結社談藝，九一心好之，比入都，與王世貞相得甚歡，時世貞父（王忬）忤分宜（嚴嵩），詔獄，門生故吏皆匿跡，九一從世貞遊，日夕招尋，時歌時泣，候世貞父於獄。會有欲封妾者，行千金賄分宜，九一為司封郎，持不可，分宜恚甚，九一請就散秩，遷南尚寶卿，未至，謫廣平府同知，稍遷湖廣僉事。⁴¹¹

此外，張九一更與張佳胤（1527-1588）、余日德（1514-1583），號稱「三甫」，皆以撰寫文章成名。如史料中所載述：

⁴¹⁰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7，〈人物·張九一〉，頁13上。

⁴¹¹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7，〈人物·張九一〉，頁12下-14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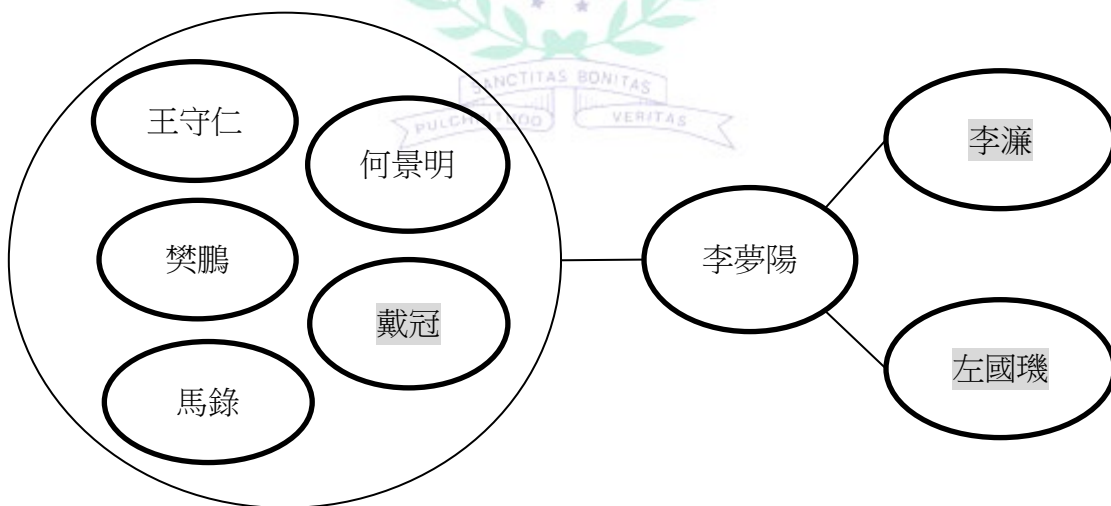
九一家居無厚藏，性好施，邑大飢，盡捐粟食之。宏覽博物，尤善章草書，飲可五斗。與銅陽張肖甫（張佳胤）、豫章余得甫（余日德），俱以文章名郎署，世號「三甫」。⁴¹²

最後談到信陽縣藏書家戴冠的交友關係，這是一群喜好寫詩的文人，他們的交友關係被稱作為「詩文氣節」之交。據《河南通志》中所載記：

（戴冠）平生喜聚書，與王守仁、李夢陽及同里何景明、馬錄、樊鵬為詩文氣節之交，所著有《邃谷集》十二卷。⁴¹³仲鷗（戴冠）與仲默（何景明）同鄉里，詩亦同調，謂之具體可爾。或言其五言律勝於仲默，論豈篤論乎？

414

而戴冠與何景明更是同鄉，互為詩友，兩人頻率相輔。周右梅曰：『仲鷗五言律詩，勝於仲默。』而樊鵬「嘗師事何仲默（何景明），為詩文，有『樊氏集』。其論詩一以初唐為宗，亦原本於仲默也。」⁴¹⁵可見他們在詩壇上佔有很高的地位。



圖九 戴冠交友示意圖。

⁴¹²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7，〈人物·張九一〉，頁12下。

⁴¹³ 清·孫灝，《河南通志續通志》，卷65，〈文苑〉，頁47下。

⁴¹⁴ 清·朱竹垞、姚柳依，《靜志居詩話》，卷10，頁21上。

⁴¹⁵ 清·錢謙益、錢陸燾，《列朝詩集小傳》，卷81，〈丙集·樊僉事鵬〉，頁366。

在藏書家的交友上，我們可以看出，在藏書之餘，他們也有著豐富的生活，像是一同寫詩、飲酒賦詩、隨處從遊。此外，在明末清初之時，許多人也不幸家破人亡，因為好友的幫助才讓後嗣有個好的成長與歸宿、並藉由好友才得以延續自身的經典，如周亮工在張民表生後幫助他收集他一生所撰的詩典，雖然有些已經流離失所，他仍一一收集，並將其集結成冊。藉此感受到古人的一種「義氣」，願意不求回報的幫助他人。

第三節 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群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S) 對於日常接觸來說，社會網絡比較容易聯想到網絡、Instagram (IG) 或臉書等連結。然而，社會網絡泛指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關係，像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之社會性連結，例如友誼、實體的連結、交通路線圖……等。然而，若是將社會關係或連結轉變為一張「網絡圖」，其中的「點」代表著個體、我與他人，而「線」則代表不同的關係、連結。將社會關係視為這種點與線交織的網絡，並加以分析，便是社會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的製作方式有所不同，本文選用社群軟體中的 UCIN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 來進行明代文人社會關係的社群分析，藉由資訊科技來對明代河南藏書家的集團性進行深入地分析與探究。首先，透過蒐集、過濾、整理與輸入大量的史料紀錄，並經過資訊系統的分析、比對與交叉綜整，進而描繪出藏書家集團的社會關係網絡模組，縷列出藏書家之間的傳承性與關連性。此外，明代文人的集團性格特徵相當明顯，像是當時的詩社、文社、

酒會、抄書社……等團體，他們往往借著以文會友為題，從事文酒之宴、嗜癖之會，成為一時的風尚。⁴¹⁶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社會網絡分析」來分析社會關係網絡，並透過社會網絡問卷、訪談、觀察、文獻檢索等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蒐集不同個體間具備何種關係的資料，再將其製作成 $n \times n$ 的關係矩陣圖（ n 為網絡內節點的數量）後，並匯入至社群網絡分析軟體（UCINET）中，以用來計算出各種社會網絡的指標數據，並且描繪出各種關係類型的網絡圖彩。⁴¹⁷

在「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中，人們為了滿足各種需求與他人產生的互動，而在互動的過程中，往往會自然而然地選擇符合自己需要的對象來建立關係。因此，每個人在社會網絡中都為單一個體，而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會形成連結，由點對點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結構，也就構成了「社會網絡」。⁴¹⁸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為 UCINET 中的網絡指標與分析法，包括：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仲介中心性（freeman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密度（density）、派系（clique）。

此外，網絡中心性（centrality）為衡量方式之一，其基本概念即是指個人對外建立的直接（direct）及間接（indirect）關係的量，間接的關係指的是個人與另一人之間並無直接連結，而中間必須透過第三者作為橋梁，方能傳遞訊息或資源。在社會網絡分析法中，一般探討個體於社會網絡中位置時，所採用的指標可分為程度中心性（degree of centrality）、仲介中心性（betweenness of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of centrality）等數種。⁴¹⁹

⁴¹⁶ 陳冠至等，〈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018年1月，第55卷第3期），頁244-245。

⁴¹⁷ 陳榮德，《組織內部社會網絡的形成與影響：社會資本觀點》（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7月），頁134。

⁴¹⁸ 林琨華，《社會網路於合作學習上的應用》（桃園：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7月），頁9-10。

⁴¹⁹ 陳榮德，《組織內部社會網絡的形成與影響：社會資本觀點》，頁126。

一、程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衡量「程度中心性」的目的為了找出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即為節點在網絡關係中的涉入程度。在一個網絡當中，擁有高程度中心性的人，代表其在網絡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能夠與較多的節點有直接連結關係，所具有的影響力較高，也可能成為網絡結構中的領導者。將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會網絡關係（即前文所述之藏書家的社會關係）輸入至 UCINET 內，藉由 UCINET 進行節點程度中心性分析，可以得知當時藏書社群的核心人物。⁴²⁰

當程度中心的指標越高，則節點可能擁有的影響力範圍以及調節能力就越大。因此，當數值越高時，表示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凝聚程度也相對越高，而節點在當時的社群裡之程度中心性指數，也顯示出該藏書家的重要性。⁴²¹藉此，從數據結果可以得知，藏書家李夢陽的程度中心性最高，達 7 次，可見他為整個明代河南藏書社群裡最為核心的靈魂人物。

另外，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SD) 的作用是比较一個社群當中，每位成員地位的重要性之標準值。利用標準差可以反映出一個社群中，成員的中心性指數與平均值 (Mean) 的差異程度，例如：當某個成員的程度中心性指數與平均數的相差數值大過標準差時，則該成員在社群當中的地位就高於一般成員。尤其，當標準差高於平均數時，表示該社群內出現許多超高人氣的節點，結成社群的機會也相對較高。藉此，從表二中可以得知，藏書張民表、李夢陽、朱睦㮮、何景明、戴冠、王守仁、朱元璋、馬錄、樊鵬、王惟儉以上 10 位的中心性指數與平均數的差距數值皆大於標準差，可見他們都屬於高人氣的節點，同時也代表著他們之間結成社群的機會也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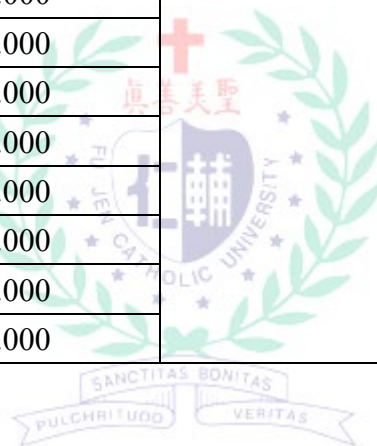
⁴²⁰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圖資與檔案學刊》，2021 年 6 月，第 98 期），頁 97-98。

⁴²¹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頁 99-100。

表二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分析

姓名	程度中心性 (Degree)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1. 張民表	7.000	1.818	1.879
2. 李夢陽	7.000		
3. 朱睦㮮	5.000		
4. 何景明	5.000		
5. 戴冠	5.000		
6. 王守仁	5.000		
7. 朱元璋	5.000		
8. 馬錄	5.000		
9. 樊鵬	5.000		
10. 王惟儉	4.000		
11. 張九一	3.000		
12. 秦京	3.000		
13. 阮太冲	3.000		
14. 朱勤羹	2.000		
15. 左國璣	2.000		
16. 耿震國	2.000		
17. 張孟男	2.000		
18. 朱安泐	2.000		
19. 李濂	2.000		
20. 余日德	2.000		
21. 周亮工	2.000		
22. 張允集	2.000		
23. 張佳胤	2.000		
24. 朱櫛	2.000		
25. 王世貞	1.000		
26. 劉黃裳	1.000		
27. 趙冢宰	1.000		
28. 周在浚	1.000		
29. 張九齡	1.000		
30. 王璇	1.000		
31. 朱見沛	1.000		
32. 李繼業	1.000		
33. 楊旦	1.000		
34. 李敏	1.000		

35. 張宏志	1.000		
36. 耿華國	1.000		
37. 王尚綱	1.000		
38. 李攀龍	1.000		
39. 王正誼	1.000		
40. 楊琳	1.000		
41. 李蓁	0.000		
42. 王鴻儒	0.000		
43. 耿介	0.000		
44. 賈詠	0.000		
45. 吳伯通	0.000		
46. 李和霖	0.000		
47. 張鑾	0.000		
48. 李呈秀	0.000		
49. 張子定	0.000		
50. 方庵	0.000		
51. 喬騰鳳	0.000		
52. 曹啟佑	0.000		
53. 呂維祺	0.000		
54. 賈壯	0.000		
55. 魏象樞	0.000		



二、仲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仲介中心性」是節點居於其他所有人最短溝通路徑的數量加總，也就是指他人會透過這個節點去認識到其他人，這個節點也就扮演著橋梁的角色。藉此，資訊系統將會計算出節點與其他節點交流時，所經過的某仲介節點的次數。當節點的指標越高，則代表在網絡中有較多成員將藉由此節點，才能與其他節點產生連結，類似於媒介者的角色。所謂媒介者，就像是一座橋梁，佔據著整個社會網絡，是節點與節點之間相互連接的重要人物，也同時擁有較高的控制能力，所以

在社會網絡的結構中，常扮演資訊交換者的角色。因此，在社會網絡關係中，任兩個成員的互動必須透過某個關鍵連結的程度來判斷，亦即衡量一個成員是否在其他兩個成員相互聯絡的通路上。可見，仲介者常扮演著傳遞資訊的中間角色，也同時為掌握了豐富資訊的人。⁴²²

總之，對於每個節點來說，當節點的仲介中心性指數越高，表示他們對藏書社群與社群間發生連結的控制程度越高，亦即在連結各藏書社群上所發揮出的權力與重要性也就越大。綜觀整個明代河南藏書家，藏書家張民表的絕對中心指數最高，也為最大仲介者，表示張民表是位於溝通橋樑的地位，該藏書家處在重要的中間位置，在交流書籍資訊的過程中，他人對他的依賴程度較大。⁴²³此外，從表三中可以得知張民表、朱睦㮮、朱元璋的中心性指數與平均數的差距數值皆大過於標準差，也就表示他們都位於重要的橋樑位置。

表三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仲介中心性分析

姓名	絕對中心指數 (Betweenness)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1. 張民表	68.000	3.055	11.222
2. 朱睦㮮	46.500		
3. 朱元璋	14.500		
4. 周亮工	13.000		
5. 王惟儉	13.000		
6. 李夢陽	10.000		
7. 張九一	2.000		
8. 耿震國	1.000		
9. 張允集	0.000		
10. 朱勤羹	0.000		
11. 朱櫛	0.000		
12. 朱安泐	0.000		
13. 王正誼	0.000		
14. 朱見沛	0.000		
15. 周在浚	0.000		

⁴²²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頁 99。

⁴²³ 陳冠至等，〈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頁 250-251。

16. 秦京	0.000		
17. 馬錄	0.000		
18. 何景明	0.000		
19. 樊鵬	0.000		
20. 王守仁	0.000		
21. 戴冠	0.000		
22. 左國璣	0.000		
23. 李濂	0.000		
24. 阮太冲	0.000		
25. 余日德	0.000		
26. 張佳胤	0.000		
27. 王世貞	0.000		
28. 張孟男	0.000		
29. 耿華國	0.000		
30. 李攀龍	0.000		
31. 趙冢宰	0.000		
32. 劉黃裳	0.000		
33. 王璇	0.000		
34. 李敏	0.000		
35. 張九齡	0.000		
36. 楊旦	0.000		
37. 王尚綱	0.000		
38. 張宏志	0.000		
39. 李繼業	0.000		
40. 楊琳	0.000		
41. 李葵	0.000		
42. 王鴻儒	0.000		
43. 耿介	0.000		
44. 賈詠	0.000		
45. 吳伯通	0.000		
46. 李和霖	0.000		
47. 張鑾	0.000		
48. 李呈秀	0.000		
49. 張子定	0.000		
50. 方庵	0.000		
51. 喬騰鳳	0.000		

52. 曹啟佑	0.000		
53. 呂維祺	0.000		
54. 賈壯	0.000		
55. 魏象樞	0.000		

三、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社會網路中的「接近中心性」著重在每一個節點到其他節點的距離，表示他們以最小的成本就能夠與大多數的人進行溝通。當一個節點的接近中心性越小，就表示他在訊息傳播中受到旁人控制的程度也就越小；相反的，如果接近中心性越大，則在資訊傳播受到他人控制的程度也就越大。倘若「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 (farness)」數值越小，表示節點越接近網絡的中心位置，必須透過的仲介者也就越少，即越不需要透過他人來與社群產生連結。具數據分析最不受他人控制的藏書家為張民表，也屬於最不需要透過他人便可與其他人做連結，屬於在社交上較為活躍的藏書家，⁴²⁴他單靠自己就可以認識到其他人。而透過標準差來看，數值跟平均數的相差大於標準差的有 15 位。可以得知，藉由他人來獲取資訊的人占大多數，或藉由他人來與其他人產生連結。

表四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接近中心性分析

姓名	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 (Farness)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1. 張民表	2222.000	2581.500	290.237
2. 朱睦㮮	2225.000		
3. 王惟儉	2231.000		
4. 秦京	2232.000		
5. 阮太冲	2232.000		
6. 周亮工	2233.000		

⁴²⁴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頁 101。

7.	朱元璋	2233.000		
8.	張孟男	2234.000		
9.	張允集	2234.000		
10.	朱勤羹	2236.000		
11.	朱櫛	2236.000		
12.	朱安澗	2236.000		
13.	王正誼	2244.000		
14.	朱見沛	2246.000		
15.	周在浚	2246.000		
16.	李夢陽	2592.000		
17.	馬錄	2594.000		
18.	何景明	2594.000		
19.	樊鵬	2594.000		
20.	王守仁	2594.000		
21.	戴冠	2594.000		
22.	左國璣	2597.000		
23.	李濂	2597.000		
24.	張九一	2808.000		
25.	余日德	2809.000		
26.	張佳胤	2809.000		
27.	王世貞	2810.000		
28.	耿震國	2862.000		
29.	耿華國	2863.000		
30.	李攀龍	2863.000		
31.	趙冢宰	2916.000		
32.	劉黃裳	2916.000		
33.	王璇	2916.000		
34.	李敏	2916.000		
35.	張九齡	2916.000		
36.	楊旦	2916.000		
37.	王尚綱	2916.000		
38.	張宏志	2916.000		
39.	李繼業	2916.000		
40.	楊琳	2916.000		

四、網絡密度（density）分析

「網絡密度」所指的是網絡節點之間互動的聯繫程度，亦即團隊成員彼此互動的平均程度。密度高，表示網絡中的任何個成員與其他成員的聯繫關係較多，藏書社群的數量也較多；密度低，則是每一個成員之間的聯繫較少，藏書社群的數量也較少。網絡密度將顯示社會網絡節點之間的緊密程度，也就是社網絡節點的聯繫程度。⁴²⁵網絡所有節點的聯程度密度越高，則彼此間的關係越複雜或重疊，其值介於 0 和 1 之間，越接近 1 則代表彼此間的關係益趨緊密。從數據來看，群體中的緊密程度為 0.0337，可以得知，他們之間的密度較低，且之間的關聯性較低。

表五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路密度分析

網絡密度 Density (matrix average)	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0.0337	0.1804

另外，標準差反映出每個社群與其他成員或社群之間的離散程度，亦即用來輔助檢視藏書家社群之間再結合成更大社群的可能性。較大的標準差，代表大部分的數值和其平均值之間差異較大，社群之間的離散性比較大，彼此結合成更大社群的可能性比較小。反之，較小的標準差，則代表這些數值較接近平均值，社群之間的離散性較小，彼此結合成更大社群的可能性當然就比較大。因此，利用網路密度可以得知有明一代河南藏書家社群的整體成長情況。依數據來看，網絡密度與標準差的數值相差較小，可見社群間的離散性也較小。

⁴²⁵ 陳冠至等，〈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頁 247。

五、派系 (clique)

「派系」是指高度凝聚力的小群體，三個（含）以上的個體任兩位間皆有直接且完全的連結，即可被視為一個派系。一個大型的社群網絡往往是由大大小小的子群體所組成，透過不同子群體之間的相互引涉，共同組成大型的社群網絡。透過各種社會關係的連結，當中的成員都有一定的群體感與親密性，並在社群內建起某些群體的行為規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許多派系的成員之一。這種派系成員的重疊，會進一步地擴大為相互關聯的網絡，整合成一個大型的派系。⁴²⁶就整個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群分類，可以得知一共分成 8 個派系（社群），其中一種派系為家族關係（例如：張民表一家、朱睦㮮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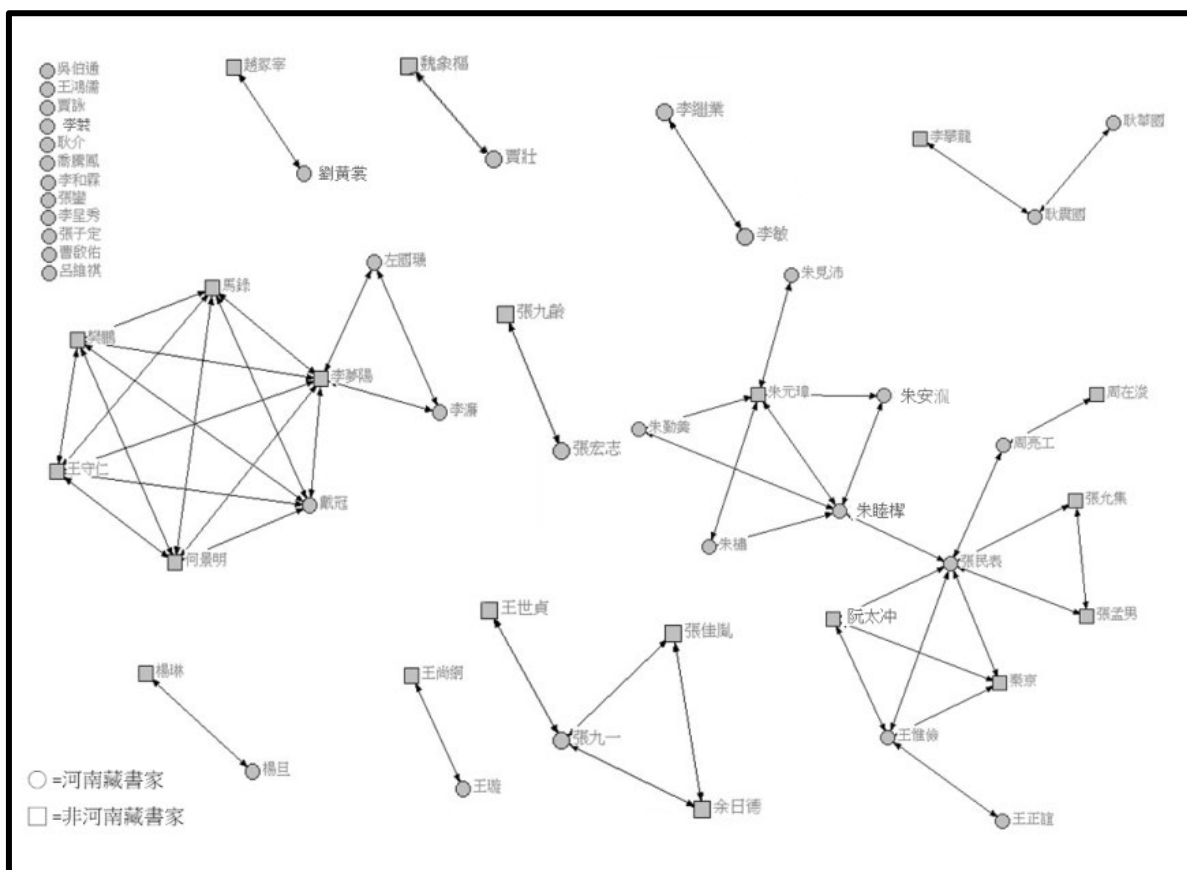
表六 明代河南藏書家派系

編號	群組	成員
1	李夢陽	何景明、戴冠、王守仁、樊鵬、馬錄
2	李濂	李夢陽、左國璣
3	阮太冲	秦京、王惟儉、張民表
4	張民表	張孟男、張允集
5	朱睦㮮	朱勤羹、朱元璋
6	朱睦㮮	朱安泐、朱元璋
7	朱睦㮮	朱元璋、朱橚
8	張佳胤	余日德、張九一

⁴²⁶ 陳冠至等，〈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頁 253。

六、圖解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會網絡

將明代河南藏書家以 UCINET 分析，利用內建的社會網絡繪圖程式，得出以下明代時期河南藏書家的社會網絡圖。藉由圖表資訊，我們可以得知有些藏書家重複出現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網絡關係圖中，扮演著串聯二個不同時期藏書家社群的「橋梁」角色，例如：張民表、朱睦㮮、李夢陽、張九一。



圖十 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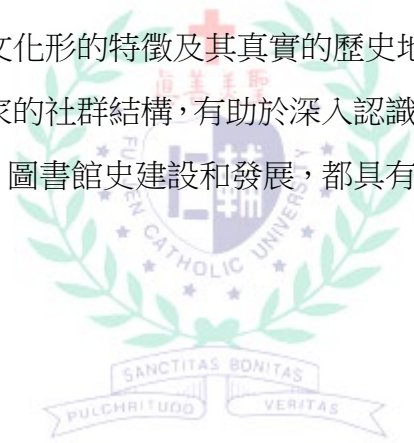
我們同時藉由圖中得知，藏書家往往必須透過彼此熟識的人擴大自己的交友圈。另外，藏書家之間的藏書社群並不會只侷限於家族或是較小範圍的社群，往往一個藏書大群體，藏書家之間互相連結，構成一個大型的藏書社群。⁴²⁷

⁴²⁷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頁 103-105。

此外，可以進一步地了解到，藏書家們往往必須透過彼此熟識的人，才能夠不斷擴大自己的人際交友圈。當然，難免出現因為時代的不同而無法連接的情況，進而產生所謂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所謂的「結構洞」是指在網絡結構中，若有兩個節點或群體之間缺少聯繫，彼此沒有互動往來，便會形成一個結構上的洞。不過，若此時有某第三方個體能在此結構洞上扮演「橋梁」的角色，仍然可將兩個不接觸、不往來的個體或群體連接起來，進而獲得更多交流。⁴²⁸例如以時間縱向來看，朱睦㮮（1520-1587）與周亮工（1612-1672）分屬不同時代的二個社群，即便兩者相差近 100 年，但這二個社群卻有機會能相互連結，就是因為張民表在這兩個社群之間，扮演著「橋梁」的角色。

歷來藏書史研究對於明代河南藏書家群體的研究議題仍不夠全面，以致無法完整地呈現出區域藏書文化形的特徵及其真實的歷史地位。但透過數位人文的方法來剖析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社群結構，有助於深入認識古代中國的區域傳統文化，對於今後的目錄版本學、圖書館史建設和發展，都具有一定的貢獻與參考意義。

429



⁴²⁸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頁 255-256。

⁴²⁹ 陳冠至等，〈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頁 258。

第七章 結論

私家藏書是中國古代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中國三千年的藏書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私家收藏對保存中國豐富的文獻典籍、傳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促進學術發展、開發文獻管理技術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藏書活動又推動了印刷業的興盛和圖書市場的繁榮發展。部分私家藏書者提倡藏書流通開放的思想並將其付諸實踐，創辦了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私家藏書樓，推動了藏書風氣由封閉式向開放式發展，並且在國家創辦公共圖書館時捐獻大量私家藏書，為近代公共圖書館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物質支持。⁴³⁰

一、樹立區域藏書家生活的典範

中國私家藏書的發展與文化發展相輔相成，促成了學術著作的產生。私家藏書的繁盛，為讀者讀書治學提供了堅定的物質保障。私家藏書被用於教育，可謂促進了文化與教育之發展。學術大盛則文化大盛，私家藏書保存古籍，對文化具有存古之功；而私家藏書被用於教育與借閱，不但能進行知識的流通，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傳播。⁴³¹

在刻書業與印刷業的快速發展下，改變了圖書收藏活動的走向，使得藏書家的藏書規模越來越大，藏書量也逐漸攀升。⁴³²而圖書也成為一種文化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販售，流通至全國各地，甚至遠銷海外。⁴³³商品經濟的發達、資本主義

⁴³⁰ 葛立輝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其文化貢獻〉，頁 103。

⁴³¹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4 月），頁 20。

⁴³²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頁 26。

⁴³³ 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新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 6 月），頁 18。

的萌芽，促使明代的社會文化有了新的面向。就文學創作而論，通俗文學大受市場歡迎，傳奇、小說、詞曲等作品都大量增加，筆記、方志等藝文創作的數量也大為提高，刺激了典籍的生產、收藏與繁榮。

明代文化事業的高度發達，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都大放異彩，各領域的專門著作不斷地湧現，亦促進了圖書事業的蓬勃興盛，進而使得藏書事業也隨之普及與旺盛，與藏書相關的學問如目錄學研究等，都跟著活躍起來。⁴³⁴此外，每當藏書家有大量藏書散出時，特別是珍貴稀有的圖書，更是激活圖書市場的重要契機。當時舊圖書散出的影響力，甚至遠大於新圖書出版的影響力。⁴³⁵

如此蓬勃發展的景象，卻也少不了戰亂天災所導致的傷害，各地的私人藏書事業接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與影響，使得許多珍貴的藏書，也因而散毀失傳。再加上藏書家自身的遭遇，譬如子孫們無法守住先世的珍貴收藏，使得圖籍亡佚的情況也相當嚴重。值得慶幸的是，仍有少部分藏書家族，憑藉著優質家庭傳統，以及後事的努力經營，才能夠倖免於難，將自家所藏完整地保存下來。⁴³⁶

像是藏書家張民表也是文化保存的典範者。他喜好撰寫草書，也非常推崇、提拔後學之士，因此，開始有數十位甚至上百位的從遊之士，遠從四面八方前來學習。如《中牟縣志》中載述張民表：

為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所與交，皆海內賢豪長者，尤好汲引後進，四方從遊之士，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⁴³⁷

祥符縣藏書家周亮工在他就學時期非常貧困，幸運地當張民表見到他時，直覺地評斷周亮工未來是會成大器之人。因此，張民表決定讓周亮工住在他家，並

⁴³⁴ 王維臨，《《文淵閣書目》與《內閣藏書目錄》研究》，頁 9。

⁴³⁵ 江慶柏，〈圖書與明清蘇南社會〉（《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第 3 期），頁 49。

⁴³⁶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104-105。

⁴³⁷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

請他擔任其三個兒子的老師，而這一住長達 8 年之久。之後，周亮工登上了進士，而辭去了老師一職，並離開了張民表一家。在那之後周亮工一路向上升官，最後更擔任到戶部侍郎的官位。張民表本身是一位高尚的文人，他以著書為樂，著作達數百卷之多。

民表雖生席華廡，而自幼不暱於聲色，惟以著述為事。尤精內典，了悟心性之學，著書數百卷，幾與身等。⁴³⁸

然而，如此高雅之文人，可惜最後死於人禍。當時因流寇李自成的多次入侵，上級長官決定利用河水灌入城裡的方式解決流寇，但也導致河水灌入城中，使得上萬戶居民牽連逃難，其中張民表也是受難者之一。如《中牟縣志》中所載記：

崇禎八年，寇躡大梁之西，民表時居中牟，以一身佐縣令拮据城頭，城乃克全。十四年寇圍汴，當事者議決河以自衛且以沒賊，民表亟趨當事，力言其不可者五，當事違之，民表退而歎曰：「吾族其魚矣。」明年寇復圍汴民表勸當事密檄左甯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庶幾通黃河一線，以為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民表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恐兵與民俱盡。」亦不聽。值寇暫却，有諷之去者。民表曰：「死則死耳，奈何以身為衆倡。」日率門人子弟，躬犯矢石，助官固守不少怠。⁴³⁹

直到 9 月 17 日當天，張民表一群人緊急逃難，張民表背著少保、公主，以及生平所選著詩文集，與張民表妹妹一家人，一同搭上木筏逃難。但當時仍有其他被大水沖入河中的人們，四處呼喊著救命，而張民表為了救河中的人們，將其拉上木筏。最終，因木筏太重無法支撐而沉入河中，導致全部人都被大水給淹死了，僅剩家族中最年幼的兒子允集，因努力抓住浮木而得以生還。從中可以感受

⁴³⁸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

⁴³⁹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61 下。

到，藏書家對於護書、惜書的心態，在性命都不保的狀態下，仍不放棄將自己所藏之書給一起救出。如文中所述：

九月十七日，寇決河灌城，居民溺死殆盡，民表同三子，負少保、公主及生平所選著詩文集，至其內弟和玉炙家，結木筏以登，有號呼求登筏者，皆命移以就之，人衆筏沈，俱淪於水，惟季子允集年尚幼，附浮木得生。

440

張民表的護書行為，實在令人驚嘆，雖然最後仍無法逃過當時的水患之災。然而，因水患所波及而損毀的藏書，除張民表外，仍有許多不幸之人。其中損害最為嚴重的為周藩朱睦㮮，他在開封「萬卷堂」所藏的 4 萬多卷藏書，在崇禎 15 年時，因黃河潰堤，使得所藏書籍被大水沖走，蕩然無存。⁴⁴¹除此之外，仍有許多明代藏書家所藏之書仍流傳至今。可見除了進行藏書之外，不可避免的事情仍然存在，那些不可預知的天災、人禍、蟲害，使得藏書家們感到極為畏懼與無奈，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護書形態來護佑他們自家藏書得以平安及傳承。有些藏書家會求神拜佛，或是在書中蓋上祈求平安的藏書章。然而，在災害來臨時，這些藏書家的護書行為更是令人驚嘆不已。

在樹立藏書家典範中，新鄉縣藏書家張應榮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敬佩、值得嚮往。他天生聰明，家中的藏書他無不批閱，此外他所撰寫文章高雅別緻，效法古人。另外，撰寫的內容有他一定的堅持，不撰寫時下的科舉文章、通俗性文章，也不撰寫僅追求名利的文章，可見他寫文章的目的並非為了追求名利，而是真正想傳達自己的閱讀後的經典。據《新鄉縣續志》中所載：

少穎悟，喜博覽，家中藏書，無不披閱。爲文章疎落高古，無俗墨行徑。……
識高才敏，談言微中，處大事，決大計，批隙導窾，無所疑碍。宗戚間有

⁴⁴⁰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 60 下-61 下。

⁴⁴¹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 219。

所爭執，排難解紛，無不服從；定家譜，程式甚詳；遷墳塋，栽樹木，立碑碣，不辭勞費。⁴⁴²

他因閱讀甚多知識廣大，使得他在訂定家譜的格式方面，能夠撰寫得非常詳盡。此外，他見識高、有才華，在談論事情、決定大事上都非常準確，如文中所述：「批隙導窾，無所疑碍。」凡事都能迎刃而解，沒有任何遲疑或阻礙。而他對於家庭事務方面也能順利解決，在他發言時，無人不聽從他的。

可見透過閱讀自身所藏之書，大大增進了他的知識與視野。天資聰穎的他，可謂先天優勢，再搭配上後天的閱讀，幫助他在處理任何事情方面都能夠順利。此外，他在地方醫療上也有很大的貢獻，據《新鄉縣續志》中載記：

以親老多疾，慨然曰：「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乃乘閒理岐黃術，久而益精，濟人全活甚衆。⁴⁴³

因為父母生病的關係，讓他感受到自己怎麼能不了解醫學，於是他開始利用空暇的時間，進行中醫的學習。在完成學習之後，他開始進行醫療之行，用中藥之術來幫助他人、醫治他人，且因他的治療而被救活的人非常多。另外，在教學方面，其兄長眉永設立了家塾，使得許多學生會在他們家逗留、飲食，而張應榮仍不厭其煩的樂於供給，他認為成就人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兄眉永設立家塾，生徒多就食，樂於供給不厭煩，曰：「成就人材，固美事也。」⁴⁴⁴

不僅如此，與他同里的邢某也極為孝順，張應榮甚至幫忙上報至朝廷，使得朝廷下旨旌其門，在邢家門前立牌坊。

⁴⁴²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5，〈人物·義行〉，頁57下-58上。

⁴⁴³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5，〈人物·義行〉，頁57下。

⁴⁴⁴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5，〈人物·義行〉，頁58上。

里中邢某有孝行，力爲舉報旌其門；荒年所得賑，推以與族之貧者，其餘除道路、補橋梁、修廟宇，及鄉黨親族婚喪諸事，捐貲成就者不可枚舉。子孫蕃衍，蓋厚德之報云。⁴⁴⁵

此外，在荒年時，所獲得的賑災金費，張應榮也皆轉手給與貧困之人，其餘經費拿去修改道路、房屋設施，或是用至祭事所需，藉由他幫助的事項已數不清了。因為他的積德甚高，旁人認爲因為他在世的熱心付出，所以他的後代才會子孫滿堂。

再來談到臨穎縣藏書家賈詠，家中藏書甚富。他從小就很有學問，20 歲時更是文有時名之人，寫作方面非常拿手。到了晚年時，他退隱家鄉。此外，他也是一位不喜名利之人，他個性光大聖明，正直不阿，廉潔自持。他常期閉關於家中閱讀藏書，不但不與外界同流合汙，也不曾與同舍宴飲遊樂。據《國朝獻徵錄》中載記：

少穎敏強記，既冠，爲文有時名，補縣學生。……晚年致仕，雖不究厥施，而脫屣榮名，田野詠歌，有洛社之風焉。詠性耿介，初在翰林，惟喫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⁴⁴⁶

話雖如此，他在科舉表現上可是相當有貢獻度。他在寫作上醇雅暢達，並無艱深難理解之詞彙，內容呈現極為優異。因此，每當考試結束之後，他在考試時所撰寫的文章總會被大家相互搶著去閱讀，如文中所曰：

爲文章醇雅暢達，無艱深險僻之語。嘗同考會試、主會試、主應天鄉試及武舉試各一；又主考會試，凡程文一出，天下誦之，所取士徧列中外，至今稱得人。⁴⁴⁷

⁴⁴⁵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 5，〈人物·義行〉，頁 58 上。

⁴⁴⁶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人傳記叢刊》109，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15，〈光祿人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襄席公書墓志銘〉，頁 105 下。

到了晚年，他人雖老，但依然耳聰目明，不但持續有人從四面八方而來就為了前來求取文章，當時的賈詠仍思緒清晰，回答如同以往。可見他在傳授知識上可謂佔了一席之地。就如同文中所述：

雖老，猶著作不倦，耳目益聰明，四方求文者踵至，揮毫運思，酬答如平時。居鄉謙抑真坦，若未嘗居顯者，人稱為篤行君子。歸 20 年，癸卯之冬，年八十，河南首臣以聞，詔遣官存問，加月廩，歲夫。又四年丁未秋，以疾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諡文靖。⁴⁴⁸

可見，他的個性謙虛，雖擔任過官員，卻無半點官威，讓人非常敬佩。如文中所述：「人稱篤行君子」，可見他是一位真正的讀書人，並非為了權威、名利才讀書。

再來談到尉氏縣藏書家左國璣，「博極群書，肆力著作，所著有《賦頌碑誄序》、《記諸體詩》，各累萬言行於世，人稱之曰：『中川先生』。」他為世上留下了許多有名的文獻。在他年輕時，拿到科舉之後，獲得了很高的名聲，許多來自各地之士都來向他學習。據《祥符縣志》所述：「正德 11 年舉於鄉，才名籍甚，四方好古之士，皆千里來從游。」他在地區教育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然而，在這災禍不斷的時代，生處於明朝末年的西華縣藏書家李呈秀，清朝又施行文字獄，什麼話都不能唯心所遇地闡述，使得他的內心感慨又傷心。因此，在李呈秀想與人滔滔不絕地敘述遇忠孝節義之事，但又對方興趣缺缺時，他就會非常生氣，關起門來，把自己關在家中，只能將他想說的這些事撰寫下來，寫完後便撫卷，並傷心的大聲嚎叫並大哭一場，也僅能藉由這個方式發洩自我。據《郟城縣記》中所述：

⁴⁴⁷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卷 12，〈內閣行實·賈詠〉，頁 69 上-下。

⁴⁴⁸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32，卷 12，〈內閣行實·賈詠〉，頁 69 上-下。

遇忠孝節義之事，足以厲世振俗者，與人言之切切，人顧不相應，則憤而閉戶手錄，錄一事畢，撫卷慷慨疾呼而泣焉。⁴⁴⁹

即便如此，他仍不放棄繼續藏書，在戰爭之前，他居住於西華，藏書豐富，但後來遭遇流寇之亂，他的藏書全部都被流寇所燒毀，於是他避居到召陵縣去，但在流離顛沛之際，他仍然很注重於古經秘笈，只要對方有書，他就會想盡辦法買到，並且沒晝沒夜的進行閱讀。雖然先前的藏書已被摧毀，但他在之後又慢慢地將藏書建立起來。也因他常撰寫忠孝節義之事，日積月累之下，著書甚多，這對地方文獻記載與保存流傳上有很大的貢獻。

最後，也是一位經歷到改朝換代的孟縣藏書家喬騰鳳，他「天資穎敏，幼時屬文有聲。既長，丰采俊偉，雅尚名節。為諸生，試輒冠其曹。崇禎壬午（15年，1642）舉於鄉，癸未（1643）一上春官，不第，因寇亂，奉母避王屋山。既歸，值甲申國變，痛哭不食者累日，誓以死殉，念母在，未果。」⁴⁵⁰藉此可以看出喬騰鳳是一位才華之人，只可惜遇上寇亂，毀壞了前途。

改朝換代之後世事難料，而喬騰鳳不願面對與遵守新規範，因而遭遇了許多性命不保之事，如《孟縣志》中所載記：

清既定鼎，一時故國遺臣，多應運興起。時騰鳳年二十有九，絕意仕進，薙髮令下，號哭不欲從。所居村後有竹數畝，建斗室，寢處其中，悲感悽愴，絕迹不出。歷十餘年，竟為怨家所脅，興大獄，必欲致之死，勢張甚。會劉公清秦（1742-1827）以滿州大司馬來為軍門，人益為鳳危，鳳處之怡如，而劉廉其故，顧獨推重鳳曰：「一孝廉隱居，各行其志，可相強耶？且高風勁節，因此具獄，非聖朝美事。」置不問，事乃已。於是，劉使人寓意鳳，鳳感其情，乃祝髮，時清主中國十有三年矣。方獄急時，或勸鳳

⁴⁴⁹ 周世臣，《鄆城縣記》，卷 24，〈耆舊篇七·李呈秀〉，頁 7 上-下。

⁴⁵⁰ 阮藩濟，《孟縣志》，卷 7，〈人物下·喬騰鳳〉，頁 45 上。

急投名吏部就職，事當解。鳳曰：「死者，吾之本志，何事此？」或勸鳳請人居間委曲，一詣怨家門，以紓其禍，鳳絕然曰：「乞憐求活，固不如一死。」卒不往。⁴⁵¹

當時為了方便統治，當時下達了薙髮令，清朝下令所有人都必須剃髮，更有一句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這個政策主要是針對漢族，為了區別服從者和反抗者的方式。而喬騰鳳不願遵從，而選擇隱逸的方式避開世間紛擾。沒想到被怨家針對，他們向朝廷告密，因此使喬騰鳳招惹一推禍害。有幸遇到有權有力的官員劉清秦的大力協助，才免於一死。在這過程中，他仍非常堅定自己，不願配合，而後為了感謝劉清秦的幫助，才同意了薙髮一事，而當時已經是建朝 13 年之後了。

在經歷了一連串的事件之後，他閉門著書，閉不見客，也因而讀遍了所有書籍。他一生持名節，清操刻勵，終身不易，享年 85 歲。就如同《孟縣志》中所述：

及獄解，乃福巾也服，冬夏不易，益謝絕人事，杜門著書。其學無所不窺，自六經、性理、子史、百氏，以及天文、地理、律曆、卜筮諸書，無不精澈淹貫。或有以隱僻事相質者，不假思索，即舉其顛末，歷歷如指諸掌，海內之士，聞其名者，往往羸糧徒步，造門請業。又時共孫徵君奇逢講學，至達官貴人，概不與通；臺使者及視學諸公修式廬禮，峻謝之，終不一見。康熙中，詔舉山林隱逸，當事以其名聞，鳳以死自矢，當事知不可強乃止。其執大義，持名節，清操刻勵，終身不易。歷五十七年，以毒終，年八十有五。⁴⁵²

⁴⁵¹ 阮藩濟，《孟縣志》，卷 7，〈人物下·喬騰鳳〉，頁 45 上-下。

⁴⁵² 阮藩濟，《孟縣志》，卷 7，〈人物下·喬騰鳳〉，頁 46 上。

藉由上述史料中，我們了解到許多藏書家為了保護藏書，在逃難時，仍不願放棄自身藏書；再者，如李呈秀的精神，雖然先前的藏書已毀，但仍不放棄，重新收集。也可從中看出大多數的藏書家不僅僅只為了藏書而藏書，也有許多藏書家將其在書中所學的知識，盡所能地傳承下去。這些藏書家們的個性多為清廉、正直，不隨意屈服；有些天資聰穎，在處事大多能迎刃而解。而他們閱讀量不亞於他人，加上他們「謙而不虛，驕而不傲」的個性，使其名聲流傳至今。

二、促進地方的文化教育事業

在推動地方文化教育方面，首先先談到這位正義之人四川藏書家吳伯通，他在河南建立五處書院。「優於吏治，惻怛（惻隱）愛人，興革利弊，如恐不及。」⁴⁵³磁州知州何至、鈞州的楊重等人，因未遵守法律規定、貪贓枉法，均被吳伯通依法嚴懲。據王質所撰〈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敘〉中記載：

凡徇私病衆，逞豪撓法者，嚴以繩之，未嘗輕貸。宦轍所歷，風裁凜然，多忤權貴，名讒名詆，往往由之，然終莫能害也。⁴⁵⁴

吳伯通在司法工作上，公正判案、清正廉潔、堅持原則、不畏權貴，勇敢舉報內外臣工的弊端，改革吏制。可見他做事仁義行事、胸懷磊落、行為坦然。

此外，藏書家張子定對地方教育上付出了很大的力量。他雖然個性潔癖，然而在兒時入邑庠後，在文學上的表現就非常亮眼，對於詩賦方面也非常擅長。以前文人的生活喜好聚會，常常不約而同地開始唱詩，起先會有人命題，接著每人說唱一句，最後集結成一首律詩或絕句。然而，每當張子定一說出其詩句後，其

⁴⁵³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卷6，〈藝文·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敘·王質〉，頁14上。

⁴⁵⁴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卷7，〈藝文·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敘·王質〉，頁12上-13上。

他人便不敢接下去。因為他的能力無人能比，同時也令所有人嘆為觀止。根據《新鄉縣續志》中所述：

早歲入邑庠，文名藉甚，尤長於詩賦，每同輩命題分咏，君詩一出，衆咸擱筆。長食廩餼，秋闈屢荐不售，乃設教以啟後學，四方來學者甚眾。祁寒酷暑，孜孜不倦；從之學者，類工詩賦，掇巍科、登顯仕者踵相接也。

455

在他漸漸長大之後，因為他的程度非同小可，因此仍然持續領取獎學金，可見他成績非常優良。然而，在秋天的科舉考試上的表現卻不盡理想，張子定考了多次皆未上榜。於是，他改變目標轉行擔任教師，改辦教席實行講學。也因如此，使得四面八方求學之人聽聞而來，都前來向他學習。而不管寒冷或炎熱的天氣，他都不曾懈怠。此外，被他所指導的學生多半對寫詩、寫賦皆精通，然後慢慢地成就出科舉考試名列前茅、當大官的學生且人數眾多。

另外，《新鄉縣續志》載曰：

晚歲屢主講滑台、東明諸望族家，士子請益者，問以業何經史，則以何經史相詰難，博聞強記，時共稱焉。⁴⁵⁶

到了晚年時，張子定也經常擔任講師，並在望族家中做講學。那些在場聆聽的學者都會前來請教講師。他的厲害之處在於每次在學者詢問之前，他都會先釐清對方是專攻哪些經史，再依照他們專攻的部分進行教學。由此可見，張子定的學問一定極為高深，也因此獲得當時所有人的一致讚賞。

⁴⁵⁵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5，〈人物·文苑〉，頁50下-51下。

⁴⁵⁶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5，〈人物·文苑〉，頁50下-51下。

以及，襄城縣藏書家李繼業，辭職後，搬離至西南山中，並興復「紫雲書院」，開始開班授課，也有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學者帶著書籍前來求學。據《襄城縣志》中所撰：

既歸，移家西南山中，興復紫雲書院，課授生徒，四方來學之士負笈如雲，識者以為有洛學之風焉。……李氏自祖宗來積累深厚，至恭靖公遂開理學之傳，遠紹程朱；三世而肖雲公，源流似續，益光而大之。今又三世，而禮山先生（李來章，1654-1721）研究經書，窺天人性命之奧，肩荷斯道甚力。⁴⁵⁷

此外，李家效法以前的程朱理學，並將其學術發揚光大，甚至傳承到第三代，除了傳承知識外，也傳承了李敏的作風。

接著，有一位藏書家他的藏書目的就是為了教學而藏，並將所藏提供給學生使用。這位藏書家名為曹啟佑，他從在 15 歲時就開始授課。此外，他還擔心自己的學生無經費買書，於是購買數百卷書籍，提供給他的學生讀書、閱覽，如同私人圖書館一般，藏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能被利用。但是不可外借，僅能在私塾中閱覽。主要原因，一方面能使學生皆能在塾中盡情閱讀；另一方面應該是避免書及遺失或損壞。據《河內縣志》中載述：

年十五，即設帳授徒，得束脩，市甘旨以奉親。親老患病，每藥必嘗，衣不解帶者數年。入庠後，文譽噪甚，因竭力事親，絕意進取，訓課諸生，勤懇如子弟。嘗患從學者無力購書，聞見不廣，乃市經史子集數百卷，貯之塾中，縱使瀏覽，由是多所造就，門人入邑庠、登鄉榜者，不下數十人，邑中百餘年來文教之盛，無有能及之者。⁴⁵⁸

⁴⁵⁷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 13，〈藝文·肖雲李先生墓表〉，頁 102 下。

⁴⁵⁸ 清·袁通、方履錢，《河內縣志》，卷 26，頁 41 上。

而被他所教導過的學生，那些具有生員身分者，考上舉人的學生，至少 10 人以上，他在歷史上的教學成就可說是無人能比。由此可知，他所收藏的藏書大大推動了地方教育事業，並造就出許多地方人才，可見曹啟佑在培育人才方面有很貢獻。

由科舉取士與區域文化事業的發展關係來看，科舉考試有一定的制度與規範，並按照考生成績的優劣，選拔人才。而在科舉考試中考進進士乃至狀元的文人，須具有深厚的經學、文學功底，並且對國家大政和制國治民方面有敏銳的觀察力，以及獨到的見解。因此，科舉考試對於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習俗，以及教育方面的成功與否有著緊密的關係。

此外，有一句話出自《河內縣志》一書中，書中記載：「古人欲入仕，必須先榜上有名；而要榜上有名，必須先讀書；至於要讀書，則必須先擁有書。」⁴⁵⁹這些文人通常嗜書如命，且往往對自己所擁有的書籍秘而不宣，多半是因書籍難得，或是負面地希望能減少競爭對手。相反的，也存在許多樂意供讀書人閱讀其藏書的藏書家。在考取科舉之前，每個人所接受的教育皆有所差異，以及多半都是為了改變身世，因此通常貧困的讀書人居多，這時那些願意付出的藏書家便成就了他們，有些甚至建立私塾授課，這大大推動了教育事業的發展。為此，雖說凡要讀書者，必需先購書或鈔書，在此可以看見人們相互幫助，以及那些真正的讀書人，並未枉費其才能，而是進一步教導那些需要幫助儒學生員。此外，一旦入仕後，若要想擴大藏書，那便更加輕而易舉。所以在科舉考試中不但產生了大批的官員外，同時也造就出了許多的藏書文人。

明代的文士崇尚古人，他們想要真正擺脫世間利祿競逐的萬般俗態，便徹底地投身於癖嗜當中，就如同光州縣藏書家劉黃裳的所做作為「泐石蠹簡，貴於百朋萬鎰」，這使他得到心靈上無比的快樂與滌淨。一般而言，癖好之延伸則為好

⁴⁵⁹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90。

事，尤其是多癖之人，往往更加能顯現其好事性格，也成為明代河南藏書家的精神表徵。⁴⁶⁰

不論在河南的文人生活圈當中，或是官場上，藏書家的特有性格無所不在，遍布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這些一生專注於藏書的藏書家們，漸漸地對方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更是推動起地方教育事業的指標之一。

明代私家藏書的發展亦與明代的時空背景和社會歷史原因習習相關，明代的藏書事業浸透著文化精神，而藏書活動也彰顯著社會的文明與發展態勢，同時珍藏人類所追求的文明足跡，保存人類文化的經驗，使得這些經典沒有在歷史煙塵中風乾。⁴⁶¹當今社會，也有不少私人藏書家收藏了數量可觀的珍貴書籍，私家藏書進入全新的階段，除了持續其傳統的收藏功能外，私家藏書和閱讀活動還有助於滋潤人生、撫慰心靈和成就夢想，成為建設和諧美好社會的潛在力量。⁴⁶²

此外，透過前人的著作，像是河南書院研究綜述、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等，經由文獻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專注於研究河南地區藏書家的人數較少，大多研究方向偏向於明代河南書院、明代河南的經濟、明代河南宗藩等類型。因此，本研究希望藉此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方向，更專精在藏書家的研究。

⁴⁶⁰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頁 182。

⁴⁶¹ 劉叢，〈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意蘊探微—基於文化視角的分析〉（《圖書館學刊》，2012 年第 10 期），頁 112。

⁴⁶² 葛立輝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其文化貢獻〉，頁 103。

最後，筆者透過文獻史料的分析與整理，輔以近人有關明代河南地區的相關議題研究，茲將明代河南地區藏書事業的發展趨勢，歸納整理如下：

1. 本研究透過仔細的爬梳史料後，發現明代河南地區具有藏書史蹟記載者，總共有 34 位。其中，以開封府為最多人數。另外，在明代河南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生活文化方面，如藏書家在藏書之餘，他們也有著豐富的生活，像是一同寫詩、飲酒賦詩、隨處從遊。在明末清初之時，也有很多人也不幸家破人亡，藉由好友的幫助使得後嗣有個好的成長與歸宿、並透過好友才得以延續自身的經典。除此之外，在藏書活動上，像是中牟縣藏書家張民表，他除了喜好藏書之外，更是勤於閱讀，生平著書甚多，經彙整之後將近上百卷。只可惜他所藏的圖書秘不示人，未與他人共享，此外，他也不願意出版。以及，像是光州縣藏書家劉黃裳，儘管家中的藏書已經非常豐富，但仍然可望那些自己尚未收藏到的書籍。
2. 對於明代河南藏書家透過親族、姻婭、師徒與賓朋等社會關係，所連結而成的社群及特徵，在藏書家的家庭方面，許多家庭紛紛以收羅圖書為主要事務，一開始大多為個人喜好，而後藏書家一生收集了龐大的藏書，慢慢的一代傳一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代河南藩王藏書家朱橚藏書甚富，而後傳承給六世孫朱睦㮮，他同樣繼續收藏、保存、維護著，接著再傳到朱睦㮮之子朱勤夔。除了藩王朱橚一家之外，開封府祥符縣周亮工也是藏書豐富，其子周在浚也延續著父親的藏書志願，繼續收藏圖書。此外，周亮工與明末清初的許多篆刻家交往甚密，嗜印成癖。我們透過藏書印可以了解一部書的遞藏經過，同時也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明代河南私人藏書事業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可說是非常有貢獻的，如開封府臨潁縣藏書家賈詠本身也是河南鄉試第一名舉人，他將自身所學傳承給他人，在推動地方教育與學術、培養區域人才上仕非常有貢獻以及影響力的。

3. 在社會網絡上本研究透過 UCINET 的程度中心性分析，得知當時藏書社群的核心人物，如藏書家張民表。在仲介中心性方面，也是藏書家張民表的絕對中心指數最高，也為最大仲介者，在資訊交流的過程中，他人對他的依賴程度也較大。以及，在社會網路中的「接近中心性」上，經研究結果顯示，最不受他人控制的藏書家為張民表，也屬於最不需要透過他人便可與其他人做連結，屬於在社交上較為活躍的藏書家，他單靠自己就可以認識到其他人。藉由以上結果可以得知，張民表有如一個社群的核心人物，他的社交範圍最廣。然而，因為藏書家之間的交集較少，則在「網絡密度」呈顯上，社群網路的密度較低，可以明顯看出他們之間的聯繫程度較為鬆散。



附錄

附錄一：明代河南藏書家知見表

編號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藏書事蹟	資料出處 (僅舉一種為例)
1.	朱櫛	1361-1425	開封 (開封府)	櫛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上之，即是書也。	明·朱櫛，《救荒本草》，目錄，〈救荒本草目錄〉，頁 2 下。
2.	李敏	1425-1491	襄城 (開封府)	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	清·張廷玉，《明史》，卷 185，〈列傳·李敏〉，頁 3 上。
3.	吳伯通	1441-1500	廣安 (四川)	居家建耳棠書院，教授百餘人。	明·虞懷忠，《四川總志》，卷 10，〈人物·吳伯通〉，頁 44 上。
4.	王鴻儒	1459-1519	南陽 (南陽府)	官至南京戶部主事，「家富藏書」。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頁 127。
5.	朱見沛	1462-1505	禹州 (開封府)	所藏《千頃堂書目》著錄有《徽府書目》一卷。	王琴林，《禹縣志》，卷 9，〈經籍志〉，頁 63。
6.	賈詠	1464-1547	臨潁 (開封府)	臨潁賈氏藏書目二卷。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 10，〈簿錄類〉，頁 69 上。
7.	戴冠	正德 3 年 (1508) 進士	信陽 (歸德府)	平生喜聚書。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5，〈文苑·戴冠〉，頁 34 上。
8.	朱睦㮮	1520-1587	開封 (開封府)	建『萬卷堂』五楹以藏之，有 42,560 卷。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 2 下，〈甲籤·朱睦㮮〉，頁 479。

9.	李濂	1488-1566	祥符 (開封府)	著述甚富，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志》、《汴京遺蹟志》、《醫史》，諸傳凡若干卷。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6，〈列傳·李濂〉，頁 23 下。
10.	楊旦	正德 16 年 (1521) 進士	鄆城 (開封府)	惟藏書千餘卷，子孫衣食僅足亦足以驗其所守矣。	明·楊邦梁，《鄆城縣志》，卷 7，〈宦蹟〉，頁 87 上。
11.	左國璣	1522-1566	尉氏 (開封府)	博極群書。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左國璣〉，頁 52 下。
12.	劉黃裳	1530-1595	光州 (汝寧府)	藏書故充棟。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 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 20 下。
13.	李蓂	1531-1608	內鄉 (南陽府)	蓂好學，家多藏書，注宋藝圃明藝圃，諸書援据該洽識者珍之。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5，〈文苑·李蓂〉，頁 31 上。
14.	張九一	1533-1598	新蔡 (汝寧府)	築綠波樓，積書萬卷。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 7，〈人物·張九一〉，頁 14 上。
15.	王璇	?-1526	新鄉 (衛輝府)	聚書若干卷。	清·姜篋，《邲縣志》，卷 11，〈藝文·符井書院記〉，頁 25 上。
16.	李繼業	嘉靖 34 年 (1555) 舉人	襄城 (開封府)	置學田、購書，集遠近多士講學，所謂「紫雲書院」者也。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 2，〈李尚雲繼業〉，頁 39 上。
17.	王惟儉	1567-?	祥符 (開封府)	家藏多古書、盡器物，人推其博雅。	清·陸應陽、蔡方炳，《增訂廣輿記》，卷 6，〈河南〉，頁 21 上。

18.	張民表	1570-1642	中牟 (開封府)	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4，〈張林宗先生傳〉，頁11上。
19.	耿華國	1578-1666	襄城 (開封府)	耿震國之兄。合先世所積三萬五百七十卷。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183。
20.	賈壯	1607-1663	襄城 (開封府)	購書數千卷。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12，〈賈僉憲公傳〉，頁25下。
21.	周亮工	1612-1672	祥符 (開封府)	藏書凡百種。	清·周亮工，《賴古堂集》，〈賴古堂集序〉，頁1上
22.	呂維祺	萬曆41年 (1613) 進士	新安 (河南府)	書室曰明德堂，有《明德堂文集》。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33。
23.	耿介	1623-1693	登封 (河南府)	耿先生興復嵩陽書院與都人士講學。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2，〈中州道學編序〉，頁2上。
24.	耿震國	?-1644	襄城 (開封府)	嘗購書於金陵，與先世書合三萬餘卷。建『富春軒』以貯之。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頁347。
25.	張宏志	崇禎10年 (1637) 進士	項城 (開封府)	以曲江之名者，因張九齡裔孫之意，九齡唐曲江人，為項，有大臣節，封曲江男，時稱曲江公，有《曲江集》。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20。
26.	喬騰鳳	崇禎15年 (1642) 舉人	孟縣 (懷慶府)	積圖書數千卷。	阮藩濟，《孟縣志》，卷10，〈藝文·耕樂堂集〉，頁15上。
27.	李和霖	順治8年 (1651)	歸德 (歸德府)	性喜儲書，建藏書樓，置經傳子	清·康基淵，《嵩縣志》，卷28，〈列傳藝

		舉人		史及漢唐宋諸集，後進貧無書者，賴之。	林》，頁4下。
28.	張鑾	順治15年 (1658) 進士	真陽 (汝寧府)	惟務聚書，經史百氏家所未有親自手錄。	明·何麟，《真陽縣志》，卷5，〈選舉志·貢士〉，頁3上。
29.	朱勤羹	不詳	開封 (開封府)	朱睦㮮之子。亦嗜書，收藏益富。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2下，〈甲籤·朱睦㮮〉，頁480。
30.	李呈秀	不詳	西華 (開封府)	居西華時，藏書至富。	周世臣，《鄆城縣記》，卷24，〈耆舊篇七·李呈秀〉，頁7上。
31.	朱安湜	不詳	鎮平 (南陽府)	鎮平府奉國將軍。邸第建青藜閣，藏書數千卷。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安湜〉，頁66上。
32.	張子定	不詳	新安 (河南府)	家藏書甚富。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5，〈人物·文苑〉，頁51下。
33.	王正誼	不詳	開封 (開封府)	辯喜涉羣書，薄排比，言非古也。家世獨富藏書。	明·曹履吉，《博望山人稿》，卷13，〈誌傳〉，頁2上。
34.	曹啟佑	不詳	河內縣 (懷慶府)	乃市經史子集數百卷，貯之塾中。	清·袁通，《河內縣志》，卷26，〈人物·曹啟佑〉，頁41上。

說明：

- 一、本表是方便第四章「明代河南的藏書家」之參照而製。
- 二、本表按藏書家之生年，由遠至近依序排列。
- 三、若藏書家之生年不詳，則依卒年由遠至近排列。
- 四、若藏書家之生卒年皆不詳，則依其科舉年代（以進士優先，而後舉人、監生、貢生、生員、薦舉等）由遠至近排列。
- 五、若生卒年、科舉年代皆無，則依其人活動之年代，或其親友、同時代人之生存年代約略加以判定，由遠至近排列。
- 六、其生卒年、生存年代皆無法判定者，則列於最後。

附錄二：明代河南藏書家家庭科舉仕籍簡表

編號	姓名	科舉仕宦	子科舉	孫科舉	資料出處 (僅舉一種為例)
1.	王惟儉	萬曆 23 年 (1959) 進士			清·陸應陽、蔡方炳,《增訂廣輿記》,卷 6,〈河南〉,頁 21 上。
2.	王璇	成化 17 年 (1481) 進士			明·張朝瑞,《皇明貢舉考》,〈辛丑成化十七年會試〉,頁 34 下。
3.	王鴻儒	成化 23 年 (1482) 進士		王汝魯,擢隆慶戊辰(2 年,1568)進士。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卷 91,《河南南陽府·王鴻儒》,頁 21 上。
4.	左國璣	正德 11 年 (1516) 舉於鄉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左國璣〉,頁 52 上。
5.	朱安澗	鎮平府 奉國將軍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朱安澗〉,頁 66 上。
6.	朱見沛	成化 17 年 (1481) 就藩禹州	子 6 人,皆封為郡王。		王琴林,《禹縣志》,卷 9,〈經籍志〉,頁 63。
7.	朱勤羹	封輔國中尉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 2 下,〈甲籤·朱睦㮮〉,頁 480。
8.	朱睦㮮	萬曆 5 年 (1577) 舉為周藩宗正	朱勤美,封輔國中尉。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 5,〈人物·朱睦㮮〉,頁 59 下。
9.	朱橚	洪武 14 年 (1381) 就藩開封府	子 15 人,皆封為郡王。		明·朱橚,《救荒本草》,目錄,〈救荒本草目錄〉,頁 2 下。
10.	吳伯通	天順 8 年 (1464) 進士			明·劉伯縉,《杭州府志》,卷 62,〈人物·吳伯通〉,頁 57 上。

11.	呂維祺	萬曆 41 年 (1613) 進士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 33。
12.	李和霖	順治 8 年 (1651) 舉人			清·康基淵,《嵩縣志》,卷 28,〈列傳藝林〉,頁 4 下。
13.	李敏	景泰 5 年 (1454) 進士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 13,〈藝文·尚雲李先生墓表〉,頁 101 上。
14.	李蓂	嘉靖 32 年 (1553) 進士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5,〈文苑·李蓂〉,頁 31 上。
15.	李濂	正德 8 年 (1513) 省試第一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卷 87,《河南開封府·李濂》,頁 22 下。
16.	李繼業	嘉靖 34 年 (1555) 舉人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 2,〈李尚雲繼業〉,頁 39 上。
17.	周亮工	崇禎 13 年 (1640) 進士			清·謝昌霖,《長汀縣志》,卷 24,〈人物文苑·李長日〉,頁 3 下。
18.	耿介	順治 9 年 (1652) 進士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1,〈河南府·耿介〉,頁 31 上。
19.	張九一	嘉靖 32 年 (1553) 進士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 7,〈人物·張九一〉,頁 12 下。
20.	張民表	萬曆 22 年 (1594) 舉人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 4,〈張林宗先生傳〉,頁 11 上。
21.	張宏志	崇禎 10 年 (1637) 進士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 20。
22.	張鑾	順治 15 年 (1658) 進士			明·何麟,《真陽縣志》,卷 5,〈選舉志·貢士〉,頁 3 上。

23.	楊旦	嘉靖 14 年 (1535) 進士			明·楊邦梁,《鄆城縣志》,卷 7,〈窟蹟〉,頁 87 上。
24.	賈壯	順治 3 年 (1646) 進士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 12,〈賈僉憲公傳〉,頁 25 下。
25.	賈詠	弘治 9 年 (1496) 進士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 10,〈簿錄類〉,頁 69 上。
26.	劉黃裳	萬曆 14 年 (1586) 進士			清·錢謙益、錢陸燦,《列朝詩集小傳》,卷 81,〈劉武庫黃裳〉,頁 655。
27.	戴冠	正德 3 年 (1508) 進士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5,〈文苑·戴冠〉,頁 34 上。

說明：

一、本表是方便第四章「明代河南的藏書家」之參照而製。

二、本表藏書家排列順序依姓氏筆畫做排序，然僅列史料上有記載家庭成員科或仕籍資料者。

附錄三：明代河南藏書家藏書樓（處）簡表

編號	姓名	藏書樓	資料出處 (僅舉一種為例)
1.	王璇	創書院	清·姜篴,《邲縣志》,卷11,〈藝文·符井書院記-王璇〉,頁25上。
2.	朱安澗	青藜閣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安澗〉,頁66上。
3.	朱勤羹	萬卷堂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2下,〈甲籤·朱睦㮮〉,頁480。
4.	朱睦㮮	萬卷堂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睦㮮〉,頁59下。
5.	吳伯通	居家建耳棠書院。於河南境內建立四大書院,開封大梁書院、輝縣百泉書院、洛陽伊洛書院、汝寧汝南書院。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卷6,〈藝文·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叙·王質〉,頁12下。
6.	李和霖	建藏書樓	清·康基淵,《嵩縣志》,卷28,〈列傳藝林〉,頁4下。
7.	李敏	紫雲書院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卷13,〈藝文·尚雲李先生墓表〉,頁101上。
8.	李繼業	紫雲書院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2,〈李尚雲繼業〉,頁39上。
9.	周亮工	賴古堂	清·謝昌霖,《長汀縣志》,卷24,〈人物文苑·李長日〉,頁3下。
10.	耿介	嵩陽書院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2,〈中州道學編序〉,頁2上。
11.	耿華國	富春軒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頁347。
12.	耿震國	富春軒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頁347。
13.	張九一	築綠波樓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7,〈人物·張九一〉,頁14上。

14.	劉黃裳	藏書故充棟	清·錢謙益、錢陸燦，《列朝詩集小傳》，卷 81，〈劉武庫黃裳〉，頁 655。
-----	-----	-------	--

說明：

一、本表是方便第四章「明代河南的藏書家」之參照而製。

二、本表之排列順序依姓氏筆畫做排序。

三、若無藏書樓（處）名，則酌錄史料所記載書場所或規模之敘述，或是文會賞場所之名稱，或依史藏書家所撰文集名稱加以判定。若史料未載藏書處所狀況者，則不錄。



附錄四：明代河南藏書家著作簡表

編號	姓名	著作	資料出處 (僅舉一種為例)
1.	左國璣	《賦頌碑誄序》、《記諸體詩》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左國璣〉，頁52下。
2.	朱安湏	《理學寤言》、《太極圖考》、《古本大學》、《續談藝錄》、《春草齋集》、《江山覽勝集》、《鷗丁漁唱集》、《叢桂莊詩集》、《宗臣志》、《寧夏定變錄》、《北地年表》、《叢桂莊品題詩》、《牡丹譜》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安湏〉，頁66上。
3.	朱見沛	《徽府書目》一卷	王琴林，《禹縣志》，卷9，〈經籍志〉，頁63。
4.	朱睦㮮	《中州人物誌》、《五經稽疑》、《大明帝系世表》、《遜國褒忠紀》、《陂上集》、《韻譜》、《河南通志》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睦㮮〉，頁61下。
5.	朱橚	《救荒本草》	明·朱橚，《救荒本草》，目錄，〈救荒本草目錄〉，頁2下。
6.	吳伯通	《達意稿》三十卷、《石谷韻語》十二卷、《策問答》七卷、《順慶府志》十五卷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卷6，〈藝文·吳石谷先生神道碑銘並敘〉，頁15上。
7.	呂維祺	《明德堂文集》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33。
8.	李葵	《明蓺圃集》、《于壩注筆》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65，〈文苑·李葵〉，頁31上。
9.	李濂	《嵩渚集》、《祥符文獻志》、《汴京遺蹟志》、《醫史》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卷87，《河南開封府·李濂》，頁22下。
10.	李繼業	《省身錄》四卷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卷13，〈李尚雲繼業〉，頁39上。
11.	周亮工	《同書》、《鹽書》、《相編》、《讀畫錄》、《詩人傳》、《印人傳》、《字觸》、《書影》、《閩小記》、《賴古堂詩文集》	清·魏方泰，《行年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231-232，臺南：莊嚴文化，1995年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清乾隆 17 年 (1752) 家刻本影印), 不分卷, 頁 17 上。
12.	耿介	《中州道學編》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
13.	耿華國	《蒙泉雜言》、《論語正意》、《周易解》	明·蕭元吉,《許州志》,卷 8,〈人物·耿震國〉,頁 67 下。
14.	耿震國	《山樵暇語》、《富春軒文集》	明·蕭元吉,《許州志》,卷 8,〈人物·耿震國〉,頁 67 下。
15.	張九一	《綠波樓集》、《朔方奏議》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 7,〈人物·張九一〉,頁 14 上。
16.	張子定	《溢香齋詩草》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卷 5,〈人物·文苑〉,頁 51 下。
17.	張民表	《原圃塞菴詩集》、《原圃集》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 4,〈張林宗先生傳〉,頁 11 上。
18.	張宏志	《曲江集》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頁 20。
19.	曹啟佑	《聯桂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	清·袁通,《河內縣志》,卷 26,〈人物·曹啟佑〉,頁 41 上。
20.	喬騰鳳	《耕樂堂詩文集》	阮藩濟,《孟縣志》,卷 7,〈人物下·喬騰鳳〉,頁 15 上。
21.	賈詠	《南塢集》、《臨潁賈氏藏書目》二卷	明·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卷 8,頁 2 上。
22.	劉黃裳	《藏徵館集》	清·錢謙益、錢陸燦,《列朝詩集小傳》,卷 81,〈劉武庫黃裳〉,頁 655。
23.	戴冠	《邃谷集》十二卷	清·孫灝,《河南通志》,卷 65,〈文苑·戴冠〉,頁 34 下。

說明：

- 一、本表是方便第四章「明代河南的藏書家」之參照而製，能更清楚了解著書類型。
- 二、本表之排列順序依姓氏筆畫做排序。
- 三、若史料未載著書狀況者，則不註錄。

附錄五：明代河南藏書家社會關係表

編號	姓名	姓名	社會關係	資料出處 (僅舉一種為例)
1.	朱睦㮮 (1518-1587)	朱元璋 (曾祖)	血親(曾祖孫)	明·朱橚,《救荒本草》,目錄,〈救荒本草目錄〉,頁2上-下。
		朱橚(爺)	血親(爺孫)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5,〈人物·朱睦㮮〉,頁60上-61下。
		朱勤羹(子)	血親(父子)	清·陳田,《明詩紀事》,卷2下,〈甲籤·朱睦㮮〉,頁480。
		朱安瀾	血親	清·張廷玉,《明史》,卷116,〈列傳·朱安瀾〉,頁14上。
2.	左國璣 (1522-1566)	李夢陽	血親(內弟)	清·張廷玉,《明史》,卷286,〈列傳·李濂〉,頁23下。
3.	劉黃裳 (1530-1595)	趙冢宰	朋友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82,〈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頁18下。
4.	張九一 (1533-1598)	張佳胤 余日德 王世貞	朋友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卷7,〈人物·張九一〉,頁12下。
5.	張民表 (1570-1642)	張孟男(父) 張允集(子)	血親(父子)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4,〈張林宗先生傳〉,頁11上-15上。
		秦京 王惟儉 阮太冲 朱睦㮮	朋友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卷4,〈張林宗先生傳〉,頁11上-15上。

6.	王惟儉	王正誼（子）	血親（父子）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卷4，〈人物·王正誼〉，頁51上。
7.	周亮工 （1612-1672）	周在浚（子）	血親（父子）	清·呂燕昭、姚鼎，《重刊江寧府志》，卷42，〈流寓·周在浚〉，頁5上。
		張民表（師）	師承	蕭德馨，《中牟縣志》，無卷數，〈鄉賢·張民表〉，頁60下-61下。
8.	戴冠（不詳）	李夢陽 王守仁 何景明 李濂 樊鵬 馬錄	朋友	清·孫灝，《河南通志續通志》，卷65，〈文苑·戴冠〉，頁34上-下。

說明：

一、本表是方便第六章「明代河南的藏書家的社會關係」之參照而製，能更清楚了解藏書家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二、本表按藏書家之生年，由遠至近依序排列。

三、若藏書家之生年不詳，則依卒年由遠至近排列。

四、其生卒年、生存年代皆無法判定者，則列於最後。

五、若史料未載社會關係者，則不註錄。



參考文獻

一、 古籍史料

1. 元·陶宗儀，《草莽私乘》，《叢書集成續編》257，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初版。
2. 明·朱橚，《救荒本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3.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歷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4. 明·何麟，《真陽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60，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12月第1版，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5.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0-153，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39年（1611）刻本（卷10卷81卷93配鈔本）影印。
6. 明·李賢，《大明一統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順5年（1461）內府刊本。
7.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8. 明·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11月第1版。
9. 明·胡正言，《印存玄覽》，《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0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順治17年胡氏蒂古堂刻後印本影印。
10. 明·茅坤，《茅坤集》，《兩浙作家文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1. 明·計成、陳植注，《園冶注釋》，《建築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6

月初版。

12. 明·徐燭，《徐氏筆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6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
13. 明·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16，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14. 明·張瀚，《松窗夢語》，《叢書集成續編》21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5. 明·曹履吉，《博望山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85-18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初版，據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 17 年（1644）曹臺望等刻本影印。
16. 明·陳治本，《皇明寶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53-54，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 9 月初版，明萬曆 30 年（1620）秣陵周氏大有堂刊本。
17. 明·陳善，《杭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52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年初版，明萬曆 7 年（1579）刊本。
18. 明·揚思善，《方初菴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浙江：浙江孫仰曾家藏本明萬曆 40 年（1612）方時化刻本。
19.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人傳記叢刊》綜錄類 26，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20. 明·楊邦梁，《鄞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59，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第 1 版，明嘉靖刻本。
21. 明·虞懷忠，《四川總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99-20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1573-1620）刻本影印。
22.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明人傳記叢刊》綜錄類 36，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23.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明人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24. 明·樂純，《雪菴清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111，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影印。
25. 明·蕭元吉，《許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1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第 1 版，道光 18 年（1838）刻本。
26. 清·王榮陞，《武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481，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初版，清道光 9 年（1829）刊本。
27. 清·呂燕昭、姚燾，《重刊江寧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 128，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年臺 1 版，據清光緒 6 年（1880）刊本影印。
28. 清·朱竹垞、姚柳依，《靜志居詩話》，《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8，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10 月初版。
29. 清·李瑤，《明季北略》，《明人傳記叢刊》綜錄類 13，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30. 清·汪運正，《襄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9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不注初版年，1976 年，據乾隆 11 年（1746）刊本影印。
31. 清·武念祖，《上元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 44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臺 1 版，據清道光 4 年（1824）刊本影印。
32. 清·阿思哈、嵩貴，《續河南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 32 年（1767）刻本。
33. 清·姜箎，《邳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 年臺 1 版，據民國 21 年（1932）石印本影印。
34. 清·凌錫祺，《德平縣志》，《中國方志叢書》35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臺 1 版，清光緒 19 年（1893）刊本。

35. 清·孫奇逢，《中州人物考》，《明人傳記叢刊》綜錄類 37，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36. 清·孫灝，《河南通志》，《中國省志彙編》14，臺北：華文書局，1967 年初版，清雍正 13 年（1735）刊本影印。
37. 清·耿介，《中州道學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21，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初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 30 年（1691）嵩陽書院刻補修本影印。
38. 清·袁通、方履錢，《河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7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初版，清道光 5 年（1825）刊本。
39. 清·康基淵，《嵩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8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第 1 版，據清乾隆 32 年（1767）刊本影印。
40. 清·張壯行、馬士鷺，《祥符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34，北京：中國書店，1992 年 12 月第 1 版，據清順治 18 年（1661）刻本影印。
41.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1 月臺 6 版。
42. 清·曹溶，《流通古書約》，《知不足齋叢書》2，臺北：興中書局，不注出版年。
43. 清·莫爾章，《新蔡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 年臺 1 版，據民國 22 年（1933）重刊清乾隆 60 年（1795）修纂本影印。
44. 清·陳田，《明詩紀事》，《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10，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45. 清·陳田，《明詩紀事》，《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 11，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 年 10 月初版。
46. 清·陸良瑜，《廣安州志》，四川：廣安市地方志辦公室刊印，2010 年 5 月第 1 版，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咸豐 9 年（1859）刊本。

47. 清·陸應陽、蔡方炳，《增訂廣輿記》，清康熙刻本。
48.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第1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49.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世紀文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50. 清·潘守廉，《南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年臺1版，據清光緒30年（1904）刊本影印。
51. 清·鄭澍若，《虞初續志》，《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7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藏清咸豐元年（1851）小嫻嬛山館刻本影印。
52. 清·錢謙益、錢陸燦，《列朝詩集小傳》，《明人傳記叢刊》學林類9，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年10月初版。
53. 清·謝昌霖，《長汀縣志》，《中國方志叢書》8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不注版本，1967年，據清光緒5年（1879）刊本影印。
54. 清·魏方泰，《行年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231-232，臺南：莊嚴文化，1995年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17年（1752）家刻本影印。
55.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國學基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4年9月初版。
56. 清·顧璜，《大梁書院藏書目》，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24年（1898）。
57. 王琴林，《禹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年臺1版，據民國20年（1931）刊本影印。
58. 田芸生，《新鄉縣續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47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版，據民國12年（1923）刊本影印。
59. 阮藩濟，《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44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版，據民國21年（1932）刊本影印。

60. 周世臣，《鄆城縣記》，《中國方志叢書》華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年第1版，據民國23年（1934）刊本。
61. 崔福坤，《訥河縣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東北，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民國20年（1931）鉛印本。
62. 梁伯蔭，《沙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23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1版，據民國17年（1928）鉛印本影印。
63. 蕭德馨，《中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9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第1版，據民國25年（1936）石印本影印。

二、 近人論著

(一)、 專書

1. Lawrence Stone, "Prosopography" in Felix Gilbert: Stephen Richards Graubard,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Norton, 1972, p.107-140.
2. 加·卜正民，《明代的社會與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6月第1版，327頁。
3. 石洪運等，《圖書收藏及鑒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535頁。
4.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85頁。
5.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11月，576頁。
6.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篇》，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363頁。
7. 余章瑞，《藏書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384頁。
8. 吳哲夫，《書的歷史》，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5年9月第3版，

- 64 頁。
9.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 年 1 月第 1 版，234 頁。
 10. 李致忠，《中國古代藏書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12 月第 1 版，197 頁。
 11.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9 月初版，359 頁。
 12.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 版，377 頁。
 13.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月第 1 版，435 頁。
 14.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4 月第 1 版，378 頁。
 15. 昌彼得，《中國圖書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 年 10 月再版，44 頁。
 16. 林利隆，《明人的舟遊生活—南方文人水上生活文化的開展》，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5 年 10 月初版，298 頁。
 17.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10 月再版，620 頁。
 18.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初版，411 頁。
 19. 美·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 1 版，280 頁。
 20.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736 頁。
 21. 徐良雄，《中國藏書文化研究》，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 546 頁。
22.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1 版，487 頁。
 23. 徐雁，《滄桑書城》，長沙：岳麓書社，1999 年 4 月第 1 版，344 頁。
 24. 袁立澤，《變革有成文化傳—中國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 10 月初版，205 頁。
 25. 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 1 版，410 頁。
 26. 張懋鎔，《書畫與文人風尚》，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8 月初版，196 頁。
 27.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年 1 月第 1 版，248 頁。
 28.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第 1 版，238 頁。
 29. 陳秀宏，《唐宋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0 月第 1 版，293 頁。
 30.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6 年 10 月初版，488 頁。
 31.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3 月初版，251 頁。
 32.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 8 月初版，215 頁。
 33. 陳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書家考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 4 月第 1 版，305 頁。
 34.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年 2 月第 1 版，1384 頁。

35. 馮曉霞，《浙江藏書史》，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216頁。
36. 黃玉淑、于鐵丘，《趣談中國藏書樓》，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285頁。
37.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文學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498頁。
38.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9月初版，頁498。
39. 廖寶秀，《茶的饗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年5月初版，23頁。
40.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7月初版，212頁。
41. 劉大軍等，《中國私家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355頁。
42. 劉兆佑，《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年6月初版，332頁。
43. 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11月第1版，376頁。
44. 蔡佩玲，《范氏天一閣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7月初版，263頁。
45. 蔡煜、曹培根，《常熟藏書家與藏書樓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249頁。
46.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277頁。
47. 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259頁。

48. 賴明德等，《華人社會與文化》，臺北：文鶴出版社，2009年2月初版，333頁。
49. 賴福順，《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1年6月初版，254頁。
50.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342頁。

(二)、 期刊

1.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頁98-102。
2. 牛紅亮、張小玲，〈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當代圖書館》，2009年第1期，頁33-37。
3. 王美英，〈試論明代的私人藏書〉，《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頁115-119。
4. 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2期，頁105-109。
5.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4期，頁20-24。
6. 任蒙，〈中國書院藏書事業考略〉，《圖書館學刊》，2018年第5期，頁111-116。
7. 江慶柏，〈圖書與明清蘇南社會〉，《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3期，頁45-51。
8. 余述淳，〈試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播的貢獻〉，《河南圖書館學刊》，第24卷第1期，2004年2月，頁78-81。
9. 吳宇凡、蔡孟軒，〈私人藏書脈絡初探〉，《大學圖書館》，第19卷第2期，

2015年9月，頁108-128。

10. 吳志遠，〈明清河南經濟史研究綜述〉，《中國城市經濟》，2011年第9期，頁204-205。
11. 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101-129。
12. 吳曉明，〈明代的上海藏書家〉，《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頁102-105。
13. 呂允在，〈明人書齋的命名，格局與佈置〉，《藝術學報》，第83期，2008年10月，頁261-294。
14.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生活的規劃與開展〉，《藝術學報》，第86期，2010年4月，頁299-330。
15. 呂允在，〈明代文人讀書志趣的樹立〉，《藝術學報》，第84期，2009年4月，頁311-329。
16.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藝術學報》，第85期，2009年10月，頁505-532。
17. 李小白，〈明代河南府進士區域分布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66-70；160。
18. 李小白，〈明代河南懷慶府進士區域分佈研究〉，《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頁53-55。
19. 李光生，〈宋代書院藏書論略〉，《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頁21-24。
20. 李亞梅、李雪玲，〈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下）〉，《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2期，頁81-88。
21. 李姝娟，〈明代藏書樓「天一閣」的藏書文化及其貢獻〉，《蘭臺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24期，頁109-110。

22. 汪如潤、馬偉，〈明代河南宗藩詩人考論〉，《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1 期，頁 82-84。
23.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文博》，1998 年第 1 期，頁 55；88-90。
24. 周飛越，〈明代藏書事業繁榮的政治因素探究〉，《新世紀圖書館》，2010 年第 3 期，頁 99-101。
25. 易凌等，〈明代內府藏書管理及其啟迪〉，《高校圖書館工作》，2018 年第 3 期，頁 91-96。
26. 祁琛雲，〈宋代私家藏書述略〉，《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 年第 7 期，頁 23-27。
27. 祁琛雲，〈宋代宗室藏書及其文化教育研究〉，《貴州文史叢刊》，2011 年第 4 期，頁 6-12。
28. 邱曉輝，〈古代藏書文化漫談〉，《圖書情報論壇》，2009 年第 4 期，頁 66-70。
29. 柳申林，〈古代藏書家在承傳民族文化典籍上的貢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1 期，頁 129-136。
30. 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圖書館學季刊》，1926 年第 1 期，頁 39-52。
31. 范鳳書，〈略論河南典藏在中國藏書史上的地位〉，《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 年第 6 期，頁 78-80。
32. 孫赫男、王璐，〈宋明以來河南私家藏書考述〉，《史學集刊》，2017 年第 2 期，頁 54-62。
33. 徐春燕，〈明清河南城市規模及相關性研究〉，《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6 年第 6 期，頁 81-86。
34. 徐凌志，〈中國古代藏書理念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4 年第 9 期，頁 121-127。
35. 徐壽芝，〈中國古代的藏書開放思想〉，《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1 期，頁 153-156。
36.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山東圖書館季刊》社會科學版，2004 年

第 4 期，頁 39-53。

37.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第 2 卷第 1 期，1927 年，頁 1-8。
38. 馬銀行、王現平，〈明代河南風俗的傳承與轉變初探〉，《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 期，頁 51-56。
39. 馬艷霞，〈古代私人藏書樓的開放實踐、思想與影響〉，《大學圖書館學報》，2011 年 10 月，第 6 期，頁 113-118。
40.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江西圖書館學刊》，2001 年第 4 期，頁 63-64。
41. 康芬、胡長春，〈明代道教藏書考略〉，《江西圖書館學刊》，2003 年第 4 期，頁 83-85。
42. 張民服、王新田，〈明代中後期中原商品經濟發展探析〉，《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1 期，頁 5-13。
43. 張圍東，〈古籍裡的風景—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印記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2018 年 12 月，第 2 期，頁 135-164。
44. 張萍、吳效華，〈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上）〉，《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 年第 1 期，頁 49-84。
45. 張雷、李艷秋，〈明代私家藏書目錄考略〉，《書目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頁 29-50。
46. 張維晏，〈以唐寅《琴士圖》為例，側寫明代繪畫中文人雅興的再現〉，《議藝份子》，第 20 期，2013 年 3 月，頁 5-31。
47. 梁建華，〈明代河南科舉的特點及歷史作用〉，《教育評論》，2010 年第 5 期，頁 131-134。
48. 莫燕紅，〈明代晚期藏書家藏書開放思想溯源〉，《圖書館學刊》，2013 年第 3 期，頁 116-117。

49. 逢麗東，〈古代私家藏書的文化意蘊〉，《河南圖書館學刊》，2013 年第 3 期，頁 129-130。
50. 連啟元，〈爐煙裊裊—明代文人書齋的焚香雅致〉，《藝術欣賞》，第 6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12-18。
51. 陳宏宙，〈試論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對現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和影響〉，《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7 年第 7 期，頁 98-103。
52. 陳冠至，〈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明代研究》，第 30 期，2018 年 6 月，頁 103-140。
53. 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2009 年 6 月，第 1 期，頁 115-143。
54.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8 卷第 1 期，2010 年秋，頁 119-144。
55. 陳冠至，「書能一人讀，不能一人藏」—明代江南私人藏書開放流通的心態與實踐，《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第 34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1-27。
56. 陳冠至等，〈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018 年 1 月，第 55 卷第 3 期，頁 243-284。
57. 陳柏溢等，〈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圖資與檔案學刊》，2021 年 6 月，第 98 期，頁 83-131。
58. 陳傑、楊雅君，〈古代書院藏書探析〉，《科技視界》，2016 年第 24 期，頁 218。
59. 傅衣凌，〈明代經濟史上的山東與河南〉，《社會科學戰線》，1984 年第 3 期，頁 119-127。
60. 湯蔓媛，《印象，方寸之間——記傅斯年圖書館古籍鑒藏章特展》，〈古今論衡〉，2016 年 12 月，第 29 期，頁 127-152。
61. 黃明理，〈「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34 期，1990 年 6 月，頁 943-1059。

62. 黃敬程、陳冠至，〈明代長洲名士文徵明的藏書生活〉，《圖書與資訊學刊》，2013年11月，第83期，頁73-84。
63. 楊虎，〈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活動文化特質初探〉，《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頁98-103。
64. 萬雷，〈簡論明代中期的學校藏書樓〉，《出版廣角》，2017年第304期，頁47-49。
65. 葉乃靜，〈我國古今圖書流通思想演變之研究〉，第4卷第1期，2000年3月，頁29-43。
66. 葛立輝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其文化貢獻〉，《邢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頁100-104。
67. 董文強，〈論明代藏書家的開放思想及其對私人圖書館的啟示〉，《圖書館研究》，2015年第6期，頁6-8。
68. 趙長林，〈中國當代私人藏書研究〉，《四川圖書館學報》，1999年第6期，頁68-72。
69. 劉水養，〈天一閣藏書及社會貢獻史考略〉，《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7年第5期，頁54-56；75。
70. 劉長清，〈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研究〉，《黑龍江史志》，2013年第19期，頁160。
71. 劉炳陽，〈明代河南府行政區劃沿革〉，《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頁104-106。
72. 劉嬌嬌、何朝暉，〈2000年以來中國藏書史研究的新進展〉，《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頁22-29。
73. 劉叢，〈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意蘊探微—基於文化視角的分析〉，《圖書館學刊》，2012年第10期，頁111-114。
74. 樓向英，〈中國寺院藏書研究述評〉，《圖書館》，2014年第1期，頁53-55。

75. 鄧洪波、樊志堅，〈明代書院的藏書事業〉，《江蘇圖書館學報》，1996 年第 5 期，頁 45-48。
76.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2008 年第 10 期，頁 189-191。
77. 蕭東發、袁逸，〈略論中國古代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館情報知識》，1999 年第 1 期，頁 2-6。
78. 蕭東發、鐘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圖書館》，2001 年第 1 期，頁 70-75。
79. 蕭東發等，〈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32 期，2000 年 2 月，頁 45-54。
80. 蕭慧媛，〈「養生」—明代文人的休閒生活〉，《南亞學報》，第 31 期，2011 年 12 月，頁 495-514。
81. 謝寶媛，〈歷史研究法及其在圖書資訊學之應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62 期，1999 年 6 月，頁 35-55。
82. 韓梅花、羅軍明，〈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沿岸私家藏書的流變〉，《山東圖書館學刊》，2012 年第 1 期，頁 103-105。
83. 羅竹蓮，〈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淺析〉，《時代文學》，2008 年第 4 期，頁 87-88。
84. 蘇晉予，〈河南藩府甲天下—明代河南藩王述論之一〉，《史學月刊》，1991 年第 5 期，頁 40-45。
85. 顧永時，〈古代官府藏書流通管理及影響〉，《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頁 100-103。

(三)、 學位論文

1. 王洪瑞，《河南書院地理初探》，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4月。
2. 王維臨，《《文淵閣書目》與《內閣藏書目錄》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4月。
3. 司恆斌，《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專門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5月。
4. 任民鋒，《中國古代文化價值觀與藏書特色之分析》，保定：河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5月。
5. 朱倩如，《明人的山居生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6月。
6. 呂昊青，《明清河南書院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5月。
7. 宋蕊，《私家藏書對學術研究影響分析》，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4月。
8. 林琨華，《社會網路於合作學習上的應用》，桃園：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7月，頁9-10。
9. 柯亞莉，《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6月。
10. 段兵，《明代河南宗藩與地方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5月。
11. 徐筱筱，《明代河南宗藩研究》，河南：鄧州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5月。
12. 張世瑩，《明代藩府刻書及其流傳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7月。

13.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7月。
14. 郭姿吟，《明代書籍出版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15. 閔繼昕，《明代河南賦役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5月。
16.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7月。
17. 陳娜，《明代河南人口問題探析》，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4月。
18. 陳榮德，《組織內部社會網絡的形成與影響：社會資本觀點》，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7月。
19. 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新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6月。
20. 趙國權、吳瑩，〈河南歷代書院藏書制度探微〉，《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31卷第1期，2010年2月。
21. 劉士嶺，《大河南北，斯民厥土：歷史時期的河南人口與土地（1368-1953）》，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4月。

三、 參考工具書

1. 王河，《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2.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3.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四、 網路資源

1. 印鑑，〈賴古堂〉，中國歷代人物印鑑數據庫，出處：

<http://diglweb.zjlib.cn:8081/zjtsg/zgjcj/cypicgl.jsp?channelid=91700&searchword=%C3%FB%C8%CB%B1%E0%BA%C5=84>

